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呂芳上 先生

戰爭記憶之形塑——
以 1937 年淞滬會戰為例

研究生：高宜宏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謝辭

碩士生涯以此論文畫下句點，首先必須向指導教授呂芳上先生致謝。呂老師總在百忙之中抽空指導，從最初的題目、架構以及資料蒐集，到內文的編排、邏輯與字句之修飾，均不厭其煩地指點。亦承蒙劉維開、李君山與邵銘煌先生，於擔任論文大綱與口試審查委員期間，提供相當多的寶貴意見並指正論文缺失，使本文得以更為完備。

回首研究所的四年光陰，相當感謝林麗月與陳登武老師，在我對學業徬徨無助之際，予以諸多幫助；博士班的淑惠學姊、范維學長與政哲學長，則曾引領我學習史料判讀與學界諸多重要理論，使我受益匪淺。母校國立中正大學的楊維真及張建侏老師，以及高中時期的蔡沛真老師，多年來對我諄諄教誨，並在有限的見面次數當中，仍針對我的論文方向提供建議，同樣在此致上最深的謝意。

再謝謝智誠、子正、文義、哲漢、育麒、宣頤、寧揚、哲翊、怡伶、芮吟、建德及國儲等多位學長與好友們，於資料蒐集及論文寫作之經驗分享等協助。更感謝讀書會的惠婷、秋均、珮文、佩蓉、君川、宗達與龍昇，儘管彼此領域不相同，卻反而激盪出更多撰寫論文的靈感與方向。而壘球隊則是使我能夠放鬆心情的去處，並在四年當中帶領我取得多次佳績，讓我體會不同於學業的另一份成就感。

最後，感謝我最摯愛的父母與家人們，沒有你們的支持、體諒與鼓勵，我很難無後顧之憂地完成學業。儘管遲至最後一刻才終於走完最後幾哩路，但總算沒有辜負你們對我的期望。

摘要

歷史記憶為近年相當熱門的研究議題之一，相關理論經 1980 年代以後的開展已漸趨完備，並逐漸地受到人文與社會學科的注意，而近現代史學者尤其關注戰爭記憶。

戰爭記憶與國家塑造及認同有相當大的關係，尤其近代民族國家的發展，使國家當權者相形重視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於是透過宣傳與教育手段，使人民對某個時期的歷史有共同的記憶，進而達到目的。1937 年爆發的淞滬會戰，即於中華民國政府的營造下，透過報刊與紀錄片等文字及非文字的宣傳，成為中國全面抗戰的象徵。儘管會戰本身以失敗坐收，然而會戰所出現的英雄人物卻並未在戰後消失，而是加諸於教科書、影像與紀念活動當中，使會戰本身的失利被淡化，並對臺灣民眾加以文化、教育灌輸，從中建立以中國國民黨為中國合法繼承者之史觀，並連結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

然而，戰爭記憶形塑的過程，因不同時期，面對不同敵人而有所波動。尤其到了 1980 年代以降，臺灣本土意識高漲，更是對過往以中國認同為軸心的戰爭記憶形成嚴峻挑戰。不過中國認同為主體的戰爭記憶並未因此消逝，而是與日籍臺灣兵等臺灣認同之記憶並存。至今，臺灣認同與中國認同對於戰爭記憶的詮釋，仍是學界內外各勢力的必爭戰場。

關鍵詞：戰爭記憶、集體記憶、文化記憶、淞滬會戰、宣傳、

國家認同

目錄

本文目錄：

謝辭	I
摘要	II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1
第二節 史料運用及研究方法	6
第三節 研究回顧	9
第四節 章節架構	26
第二章 戰爭宣傳與記憶形塑	28
第一節 歷史記憶源流與發展	28
第二節 國家塑造與認同	34
第三節 國家宣傳與媒體運用	42
第三章 淞滬會戰的集體記憶	72
第一節 淞滬會戰的背景與經過	72
第二節 淞滬會戰的新聞宣傳	79
第三節 淞滬會戰的影像宣傳	104
第四章 淞滬會戰的文化記憶	121
第一節 英雄形象之塑造與宣傳	121
第二節 歷史文本與紀念活動中的淞滬會戰	129
第三節 影視作品中的淞滬會戰	153

第五章 結論	172
徵引資料	177

圖表目錄：

表 2-2-1：1940 年重慶主要報紙使用中央社稿比例	55
表 4-2-1：國、高中學生認定對日抗戰相關事件於本國史重要性之比例	142
表 4-3-1：1970 年代以後中央電影公司攝製之抗日相關電影	161
圖 2-1-1：歷史記憶的轉化	32
圖 3-3-1：《戰時畫報》介紹空軍飛行員及其戰果	107
圖 3-3-2：《戰時畫報》以組圖呈現上海地區中外人士的避難情形	108
圖 3-3-3：《戰時畫報》呈現上海閘北地區房屋被毀之情形	109
圖 3-3-4：《戰時畫報》刊登平民遭砲擊身亡的慘狀	110
圖 3-3-5：《戰時畫報》刊登日本飛行員斧田卯之助其妻的信函	111
圖 3-3-6：《辛報戰情畫刊》介紹電影界的募款活動	112
圖 3-3-7：《戰時畫報》刊登暗夜砲火下的閘北	114
圖 3-3-8：《戰時畫報》登載民眾隔著拒馬遙望四行倉庫	114
圖 3-3-9：《世界畫報——日支大事變號》介紹日本最新的愛國電影	116
圖 4-3-1：楊惠敏與林青霞共同主持電影《八百壯士》開鏡儀式	16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及目的

近十餘年，民國史的研究發光發熱，許多的檔案史料陸續開放出土。也由於 1980 年代新文化史等新領域之推展，使民國史研究不再僅侷限於政治、軍事與經濟層面，而將探討層面擴及到人物的日常生活、物質文化、性別、語言，或某個時空下的集體記憶等，¹並以此重新建構政治、軍事的新看法。

其中探討集體記憶為近年的熱門議題之一，西方學界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經展開論述。記憶的概念自古希臘時期便已存在，但直到二十世紀初才明確出現「集體記憶」一詞，²正式地理論化則在 1920 至 30 年代，由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以及 Aby Warburg (1866-1929) 所奠基；³1980 年代以後又有 Pierre Nora (1931-)、Jan Assmann (1938-)、Aleida Assmann (1947-) 等學者相繼將歷史記憶系統化。臺灣學界對歷史記憶的研究起步較晚，約在 1900 年代開始引介 Halbwachs 的觀點，⁴同時報章雜誌也出現這個詞彙，並透過不同的主

¹ 王笛，〈新文化史、微觀史和大眾文化史——西方有關成果及其對中國史研究的影響〉，《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年 2 月），頁 126。蔣竹山，〈「文化轉向」的轉向或超越？——四本論著歐美新文化史著作的介紹〉，《新史學》第 12 卷第 1 期（臺北市：新史學雜誌社，2001 年 3 月），頁 233-242。

² Jeffrey K. Olick、Joyce Robbins 著，周雲水譯，〈社會記憶研究：從「集體記憶」到記憶實踐的歷史社會學〉，《思想戰線》第 37 卷第 3 期（昆明市：雲南大學思想戰線雜誌社，2011 年 5 月），頁 9。

³ Jan Assmann, translated by John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New York: The Department of Germ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Spring-Summer, 1995), pp. 125.

⁴ 臺灣學者引介集體記憶之概念與理論，如 Lewis Coser 著，邱澎生譯，〈阿伯瓦克

題進行討論。⁵至今，學界已有不少成果，從教科書、文學作品等文本資料或區域文化概念以探究歷史記憶或認同議題的著述有逐年增加之勢。⁶

不過整體而言，臺灣學界所出版或發表的歷史記憶相關著作，多趨向臺灣族群認同的視野，大多從二二八事件、黨外運動等戰後臺灣的議題切入，試圖區別「中國史觀」與「臺灣史觀」，材料來源也多半來自教科書之課綱與課文內容，或電影以及歌曲。⁷戰爭經驗則以 1990 年代以前的文學作品最為豐碩，然而往往屬於填補臺灣人戰時記憶之

（Maurice Halbwachs）與集體記憶》，《當代》第 91 期（臺北市：合志文化事業，1992 年 11 月），頁 20-39。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 35 卷第 1 期（臺北市：思與言雜誌社，1997 年 3 月），頁 247-296。夏春祥，〈媒介效果與集體記憶〉，《新聞學研究》第 58 期（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1999 年 1 月），頁 295-298。胡正光，〈從柏格森到阿布拉希：論集體記憶的本質〉，《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21 期（臺北市：巨流圖書，2007 年 6 月），頁 147-201。

⁵ 如晏山農，〈當黃絲帶自天而降，棒球——我們的集體記憶〉，《聯合報》，臺北市，1993 年 6 月 22 日，版 11。〈記憶對抗遺忘〉，《中國時報》，臺北市，1997 年 4 月 2 日，版 3。

⁶ 以文本資料為中心，探究歷史記憶的學術論著如邱坤良，〈重現臺灣文化史的集體記憶——拱樂社劇本的整理與出版〉，《表演藝術》第 84 期（臺北市：國立中正文化中心，1999 年 12 月），頁 95-98。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第 6 卷第 2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0 年 10 月），頁 77-138。柯喬文，〈殖民化與與集體記憶——以「三六九小報」（1930-35）古典小說為考察〉，《島語》第 3 期（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3 年），頁 66-73。蔡佩均，〈老作家與戰後臺灣文學研究的建構——從個人記憶、集體記憶到歷史記憶〉，《臺北文獻》第 190 期（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年 12 月），頁 63-86。區域研究如翁安雄，〈傳說、歷史與集體記憶：文化史的側寫——從澎湖七美故事及地名談起〉，《西瀛風物》第 8 期（2001 年 5 月），頁 38-59。溫采婕，〈從集體記憶看北投公園文化地景的變遷〉，《北市教大社教學報》（臺北市：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2012 年 12 月），頁 75-95。

⁷ 如夏鑄九，〈國族建構、歷史記憶與紀念空間：二二八紀念碑的建構〉，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吳乃德，〈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思想》第 8 期（臺北市：聯經出版，2008 年 1 月），頁 39-70。施正鋒，〈歷史教育、轉型正義及民族認同〉，施正鋒主編，《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各國歷史教育》（臺北市：臺灣國際研究學會，2014 年 7 月），頁 12-72。

空白，而刻意與外省族群區別的一種表現。⁸儘管這類研究成為近年史學界的顯學之一，卻忽略臺灣歷史的大背景：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將中國國土上重要的歷史事件，與臺灣的歷史連結，亦即「國家塑造」與「國家認同」的概念。

西方學界有很長一段時間重視國家塑造的討論，並對近代中國的國家塑造感到興趣，亦有豐碩的成果。然而，大多研究仍將國家塑造或認同放在制度、法令層面的探討，遲至近十餘年才有較多以戰爭本身，結合歷史記憶而與國家塑造交織探究的著述，且多能引據文學、歌曲、紀念碑、節慶以及歷史書籍等元素書寫，使歷史記憶研究蔚為風潮。⁹故吾人試圖探究歷史、集體記憶時，不僅可從教科書戰、文學作品、日記或回憶錄等文本為切入點，而亦能關注歌曲、儀式與紀念性產物，進而觸及國族建構、國家認同的議題。

較為特殊的是，過去對記憶的研究，較少從圖像、影像等「非文字史料」為切入點，甚至歷史研究本身，也大多僅將非文字史料作為各類研究的輔助史料。然而不僅歷史學界陸續體認影像對於歷史詮釋的重要性，攝影學界亦致力探討攝影如何成為歷史記憶的來源。¹⁰實

⁸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臺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 期（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05 年 4 月），頁 60、77。

⁹ 相關研究如宋佩芬，〈歷史教學與國家認同〉，《教育研究月刊》第 177 期（臺北市：高等教育文化，2009 年 1 月），頁 90-98。羅志平，〈民族主義、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 7 卷第 1 期（臺中：朝陽科技大學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編輯委員會，2009 年 6 月），頁 229-254。

¹⁰ 以兩岸而言，臺灣從 1996 年起便有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臺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蒐集 1960 年代以前的老照片，近年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及國立政治大學人文研究中心等也紛紛投入影像史料編纂與研究的行列。中國近年亦蒐羅諸多照片並爭相出版，如馮克力，《老照片裡的家國記憶》（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3 年 9 月 1 版 1 刷）。參閱馮爾康（Feng Erkang），〈關於建設中國社會史學科學的思考〉，

際上，中國一個多世紀以來的影像非常豐富，自從十九世紀中葉攝影技術傳入中國以後，外國攝影師相繼於中國拍攝人物、風景，中國便開始出現大量的動靜態影像。1920年代，中國有了本土的職業新聞記者，官方與民間的報社紛紛派駐「紀實攝影師」於各地進行採訪、拍攝，並有各種畫報刊登各類攝影作品，包含國家建設、社會事件、政府要員及娛樂名人動態，或是國民革命軍的動態等，在報紙內都有涉略。尤其1931年以降，中日雙方軍事衝突多有所聞，中國國內抗日情緒高漲，中外記者對戰爭的報導亦隨之增加，並於抗戰全面爆發以後攀向高峰，舉凡照片、紀錄片或劇情電影，在當時都為了滿足宣傳所需而大量出現。是以，既然民國時期有豐富的文字與影像史料，便能取材以供研究。

呼應歷史記憶，綜觀近現代中國史，能將單一事件訴諸於教育與生活當中，並且誘發國家認同議題者，對日抗戰之記憶乃一個可以探究的時段。尤其戰爭與革命又是當代中國重要的集體記憶，國家面臨動亂、衝突之際，必然發展一套屬於自己的歷史論述，且在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包裝下，所有誇大的敘事都顯得合情合理，並透過媒體宣傳，一步步地走進節慶、教育、娛樂等日常生活，於是「戰爭之框」便不斷地被加強與重塑。¹¹

《漢學研究通訊》第21卷第4期（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2002年11月），頁9-10。張美陵，〈攝影領域的擴展〉，發表於「刺點：博物館影像典藏之管理與賦權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13年5月10日。

¹¹ 汪宏倫，〈東亞戰爭之框與國族問題：對日本、中國、臺灣的考察〉，收錄於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市：聯經出版，2014年7月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臺灣學界對於對日抗戰（中日戰爭）中的著名戰役或英雄印象，往往集中於初期戰事，如蘆溝橋事變、淞滬會戰，或是後期的滇緬公路開發等。¹²此情形尤以教科書的敘述為然，¹³以某些特定戰役或英雄人物所拍攝的愛國電影及創作的歌曲、文學等藝文作品，亦同樣存在類似的現象。其中淞滬會戰屬於抗戰前期，儘管以失敗坐收，並因此損失大批精銳部隊，但這場會戰的失利卻往往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被賦予中國「全面抗戰」的象徵。期間所出現的八百壯士形象，或是高志航為代表的空軍與八一四空軍節的由來，更是很多國人共有的戰爭記憶。

本文所擬探討的，即是淞滬會戰如何在戰爭中被宣傳、被塑造，而成為當時中國人民的集體記憶。又為何這場損失慘重的會戰，會在戰後出現於臺灣土地上，透過文本、影視作品來塑造人民的戰爭記憶。另外，由於文字與非文字同等重要，彼此得以互為補證。因此試圖藉

初版），頁 195。羅志平，〈民族主義、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 7 卷第 1 期（臺中縣：朝陽科技大學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編輯委員會，2009 年 6 月），頁 245。

¹² 依據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 9 月初版），對日抗戰分為兩期，第一期為 1937 年蘆溝橋事變至 1938 年武漢會戰；第二期則自武漢會戰結束，直到 1945 年終戰為止。

¹³ 尤其 1980 年代以後的教科書，對於抗戰的敘述大為刪減，多半只以蘆溝橋事變為抗戰爆發起因，接著簡述淞滬會戰打破日本「三月亡華」的美夢，便跳至重慶時期的建設與後來美國參戰後，中國在國際地位的抬升，以及中緬印戰區的發展。參閱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89 年 8 月三版）。國立編譯館主編，《高級中學歷史教科書》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1 年 8 月七版）。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歷史》第二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2 年 1 月正式本三版）。許雪姬、劉妮玲著，《高級中學歷史》下冊（臺北市：三民書局，2000 年 2 月）。林能士主編，《高級中學歷史》下冊（臺南市：南一書局，2005 年 2 月修訂版）。

由影像、文字兩種對戰事的報導，乃至於戰事後的各項宣傳、教育與紀念標誌等，以說明政府、媒體與藝文界三個面向所建構的戰爭記憶。並進一步探討政府或黨派如何塑造戰爭記憶並尋求國家認同，以及此戰爭記憶與認同到何時面臨挑戰。

第二節 史料運用及研究方法

本文以對日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為主軸，探究國民政府在會戰期間如何運用媒體宣傳「全面抗戰」的開始，與媒體論述會戰過程的變化。另以淞滬會戰塑造的英雄，如空軍高志航事蹟、四行倉庫保衛戰為個案分析。全文撰寫將以新聞報導、教科書、歌曲、紀念活動與影像，多方面地探討抗日戰爭當時，媒體界以及政府對於戰事的記憶塑造。同時分析這項記憶如何在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進一步地塑造與強化，而從戰爭記憶當中建構國家認同。

戰爭期間的集體記憶探討，主要援引報紙中的戰地新聞與評論，如中國國民黨黨營的《中央日報》，其政治色彩鮮明，配合當時提供戰訊最主要的黨營新聞事業「中央通訊社」，使其刊載消息的速度在全國性的大報當中顯得最快，亦最符合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的宣傳要點。另外，吳鼎昌、張季鸞、胡政之於 1926 年所接辦的《大公報》，在全中國的閱報量一向予以《中央日報》相當程度的競爭壓力，¹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前後，該報上海版與漢口版的戰爭訊息與社論仍舊佔據

¹⁴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2 年 10 月初版），頁 14。

重要地位。而歷史更為悠久的《申報》，於上海戰事爆發之後也持續發刊，並依戰況需要，於 8 月 20 日起至 11 月 9 日之間增印「臨時夕刊」，以滿足大眾對戰況的需求。¹⁵除了大報以外，還有廣為上海地方大眾歡迎的《立報》，或因應戰情而出現的《抗戰三日刊》等，都對戰情有深入的報導與評述，可釐清當下戰事紀載與宣傳。

非文字史料方面，主要從各家畫報與雜誌當中的照片，以及因應不同需求，由各單位拍攝的紀錄片與電影著手，可較為理解戰時的宣傳與報導方式。淞滬會戰期間，有《戰時畫報》、《辛報戰時畫刊》等，以圖像為主的戰時刊物出現，其共通點都是為了宣傳抗日而創立，於會戰當時在發行地點提供戰事報導並介紹有功的英雄人物。另外，中央通訊社在淞滬會戰期間是唯一獲得官方認可的新聞機構，得以攜帶通訊器材隨軍採訪並發訊，戰後仍持續為黨喉舌，藏有相當龐大的影像資料。或有西方《生活》(Life) 等報刊雜誌社曾派駐或特約不少記者，當時刊登與中國有關的照片同樣豐富。動態影像方面，有些戰鬥過程在淞滬會戰結束後被拍成紀錄片與電影，如 1938 年的電影《八百壯士》、1942 至 1945 年的系列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Why We Fight) 及日本海軍省攝製的《支那事變海軍作戰記錄》(支那事變海軍作戰記錄)，都與淞滬會戰密切相關，前二者並在當時向國內外民眾傳達中國抗日的決心與激起國內民眾的愛國情緒。

探討戰後淞滬會戰英雄人物的塑造與愛國意識的宣揚，影視作品

¹⁵ 高郁雅，〈抗日戰爭時期上海《申報》之研究〉，《輔仁歷史學報》第 24 期（臺北縣：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2009 年 12 月），頁 123-124。

仍舊佔據重要地位，如 1970 年代由中央電影公司攝製的《八百壯士》、《笕橋英烈傳》等電影。1990 年代以後，隨著兩岸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轉變，對於抗戰的影視作品，幾由紀錄片取代了過往以愛國為核心的劇情片，如陳君山導演的《一寸山河一寸血》，有關淞滬會戰的紀錄片段內容便包含口述歷史、影像史料等綜合性內容，對於建構戰時記憶，具有高度的價值。在此期間，中共開始對國民革命軍於對日抗戰期間的表現有所論述，近年因此出品不少與國軍相關的電影及紀錄片，從中可再進一步探討、比較兩岸對抗日戰爭記憶之形構與宣傳。

另一方面，透過教育與紀念行為，亦為較易建構或重塑記憶的方式，因此探討中華民國政府在臺時期的宣傳與記憶形塑，得以自國小至高中的國文（語）、歷史與公民（社會）課本等教育文本，或中華民國政府或公家機關所設立的相關紀念碑、紀念館或紀念儀式，解析國家教育對戰爭記憶的塑造，同時注意戰爭記憶面臨挑戰之際，教育與紀念形式之變化。

而支撐本文戰爭記憶論述的架構素材，為西方學界近百年來所建構的「歷史記憶」理論。這項理論在 Maurice Halbwachs、Pierre Nora、Jan Assmann、Aleida Assmann、Paul Connerton 等人的著述之下已顯完備，並能與國家宣傳、歷史文本、影視作品與紀念儀式互為呼應。此外，歷史記憶在新聞傳播學、社會學與攝影學等領域亦有顯著成果，且彼此之間保有互動，相互徵引、比較，使相關研究的面向更為多元。透過跨領域的文獻爬梳，並配合歷史學門長期備受重視的「國家認同」、「國族建構」等論述，探討文字與非文字史料的權力運用，藉以釐清

其對記憶的主要作用與對國家認同產生的影響。

第三節 研究回顧

(一) 歷史記憶理論與國家認同

歷史記憶理論乃由 Maurice Halbwachs 以及 Aby Warburg 兩位學者，分別從社會文化以及藝術圖像的觀點而奠基，¹⁶尤其 Halbwachs 在 1920 年代末期，提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譯為「溝通記憶」、「社會記憶」，Communicative Memory) 的形構，必然經由社會互動而成，¹⁷至今仍有相當的影響力。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戰後未能立刻受到重視，直到社會科學界於 1980 年代的推展，才重新見於世人面前。期間 Eric J.E. Hobsbawn (1917-2012) 與 Terence O. Ranger (1929-) 以蘇格蘭與英格蘭的形式，說明「傳統」的樹立，是因應時局的需要，而不惜以人為方式創造歷史。¹⁸另 Pierre Nora 提出「記憶所繫之處」(lieux de memoire，或譯為「記憶場域」)，他以法國史為例，將歷史記憶的焦點放置在紀念碑與任何紀念性的物質上，並提出「記憶媒介」如何塑造國族認同的議題；又將記憶分成圖像、書籍與某一場活動的物質性記憶，及書籍、儀式或紀念碑等可以定期喚醒記憶的

¹⁶ Maurice Halbwachs,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中譯本見華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0 月 1 版 1 刷)。Aby Warburg, translation by David Britt, introduction by Kurt W. Forster, *The Renewal of Pagan Antiquity: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Los Angeles, CA: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rt and the Humanities, 1999.

¹⁷ Maurice Halbwachs 著，華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 73-314。

¹⁸ Eric Hobsbawn 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2 年 10 月初版一刷。

功能性記憶，還有功能性所包裝出的象徵性記憶等三個面向，¹⁹為當今歷史記憶研究立下範式。

與 Nora 幾乎同時期，德國的 Jan Assmann (1938-) 與 Aleida Assmann (1947-) 夫婦，特別提出「文化記憶」(Cultural Memory) 以區別集體記憶。集體記憶的特點是短時段，通常僅存在三到四代而已，且多經由口述傳統而習得；文化性記憶不同於此，具備長時段存在的特性，且透過文獻、儀式與紀念物等媒介，並經由祭司、巫師或檔案本身維繫一套固定的意義，而使人們從神話故事等集體認同當中建構出文化記憶。此外，Assmann 夫婦也針對「儲存性記憶」(Memory as ars) 與「功能性記憶」(Memory as vis) 進行闡述：前者是片段的記憶，它以權威式的文本存在於文學、藝術品等之中，是個人存在於集體當中的形式；而後者則具歷史連貫性，它透過慶典與儀式，並因應不同社會背景而有選擇性，乃是已經集體化的主體。²⁰

近十餘年，歷史記憶研究較常與國家或族群認同共同探討，但在此之前，國家塑造與認同的議題，西方學界早已有很深的認識，並在 1990 年代將研究對象擴展至歐美以外的其他區域。最初對中國國家塑造的研究，主要著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的敘述，²¹不過學界有感於對中國國家主權的變化認識不足，遂重新檢視國民黨統治時期的

¹⁹ Pierre Nora 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一～三冊)，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年 9 月初版一刷。

²⁰ Jan Assmann, translated by John Czaplicka "Collec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Cultural History / Cultural Studies (Spring - Summer, 1995), pp. 125-133. Astrid Erll, "The Invention of Cultural History: A Short History," *Memory in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27-37.

²¹ Joyce K. Kallgren ed., *Building a Nation-State: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國家態勢，其中 Lloyd E. Eastman 為代表人物之一，他將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失敗，歸因於 1927 年的清黨。此項重大決策，導致作風較為積極、開放的成員被掃出國民黨，加上抗戰期間黨內結構的諸多問題，造成最後的失敗。²²亦有學者不從國民黨本身著手，而以國民政府於制度層面的努力為視角，認為對日抗戰前的一系列財經、軍事等措施，實際上已是成功的國家塑造。²³其中以較為宏觀角度探查國民政府及國民黨本身制度變革者為 Morris L. Bian，他認為戰前諸多制度層面的變革，乃是受美國公共行政的影響，並進一步討論為戰爭所設立的機構或體制，是否真的發揮功效。²⁴

同時，有愈來愈多學者，開始將對日抗戰納入國家塑造的研究範疇。²⁵楊維真認為，中國從 1840 年至 1949 年，長達一世紀的諸多戰爭當中，對日抗戰無論是戰爭規模、傷亡情形，及其持續時間與後續

²² Lloyd E. Eastman ed.,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1991. Lloyd E. Eastman,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Lloyd E. Eastman 著，王建朗等譯，《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年一版）。

²³ 認同國民黨在內憂外患之際所做的改革之相關著作：Arthur N. Young,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Julia C. Strauss, "The Evolution of Republican Government,"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7. Paul K. T. Sih (薛光前) ed., *The Strenuous Decade: China's Nation-Building Efforts, 1927-1937*,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Hicksville, New York: Exposition Press, 1977. 中譯本見薛光前編，《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 年出版。

²⁴ Morris L. Bian,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Modern China*, Vol. 31, No. 1 (2005), pp. 35-71.

²⁵ Bruce D. Porter,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Michael Mann,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影響皆為近代中國戰爭之最，且與國家塑造之關係密不可分。²⁶即便對日抗戰對於國民政府政權的衝擊之研究開展較晚，但由於有助釐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政權聯繫，因此近來成果堪稱豐碩，舉凡戰爭動員到黨、政、軍體制的變革，都有學者投入研究，例如呂芳上〈政治轉型的挑戰——近代中國「黨國」體制的發展省思〉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一九二〇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²⁷，劉維開也有文章討論《國民政府組織法》之沿革。²⁸著述甚多，皆有助於建構抗戰前後中國國家塑造之論述。²⁹不過對於抗戰期間國家塑造的研究，汪榮祖曾表達擔憂，認為大多著作屬於記事、回憶性質，並牽扯政治敏感神經，而流於客觀性不足之弊。而戰爭期間的人民生活與心理狀態、國共關係以及各地區勢力的

²⁶ 楊維真，〈戰爭與國家塑造——以戰時中國（1931-1945）為中心的探討〉，《漢學研究通訊》第28卷第2期（總110期），2009年5月，頁5-14。

²⁷ 呂芳上，〈政治轉型的挑戰——近代中國「黨國」體制的發展省思〉，收錄於呂芳上，《民國史論》上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12月初版一刷），頁155-191；〈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一九二〇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收錄於呂芳上，《民國史論》上冊，頁31-101。

²⁸ 劉維開，〈訓政時期「國民政府組織法」制訂與修正之探討〉，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市：國史館，2013年6月初版一刷），頁489-518。

²⁹ 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6月），頁641-686；〈無聲的號角——侍從室的幕僚人員（1936-1945）〉，《近代中國》第156期（臺北市：近代中國雜誌社，2004年3月），頁141-166。陳立文，〈對軍隊動員之我見〉，《國防雜誌》第10卷第2期（桃園縣：國防大學，1994年12月），頁87-96。張力，〈足食與足兵：戰時陝西省的軍事動員〉，收錄於《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6年9月）。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初版）。呂芳上，〈抗戰前的中央與地方——以蔣介石先生與廣東陳濟棠關係為例（1929-1936）〉，《近代中國》第144期，2001年8月，頁170-198。楊維真，〈戰爭與國家塑造——以戰時中國（1931-1945）為中心的探討〉，《漢學研究通訊》第28卷第2期，2009年5月，頁5-14。

消長等議題則有更多的研究空間。³⁰對於這方面的欠缺，張瑞德受到新文化史思潮影響，為國內較早從大眾生活與心態角度，探析戰爭時期國家認同的學者。例如以量化的統計數據，解析抗戰時期中國本土非戰區的工人認同問題，³¹乃較有系統且完整地解析戰時記憶與認同的著述。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學者致力於國家認同與記憶的議題。Ching Kwan Lee 與 Guo Bin Yang 曾從婦女、知識青年來看中國革命以及政治所帶來的歷史記憶問題。³²Keith A Crawford 及 Stuart J Foster 則是聚焦在教科書對第二世界大戰的書寫，進行東西方共六個國家的跨文化比較研究，試圖解析教科書對於戰爭記憶及國家認同的影響。³³荷蘭學者 Ian Buruma 則以人類學角度，走訪日本與德國，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紀念碑、紀念館以及教科書，甚至人們的心態等角度，解構日、德兩國人民對於戰爭記憶的不同思維。³⁴臺灣學界雖亦有不少從教科書探討國家或族群認同的論述，不過較偏向日治與戰後臺灣為切入點，

³⁰ 汪榮祖，〈民國史研究若干議題的探討〉，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 1057-1058。

³¹ 張瑞德，〈戰爭與工人文化——抗戰時期大後方工人的認同問題〉，收錄於黃克武編，《軍事組織與戰爭：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年），頁 243-273；〈抗戰時期大後方工商業者的心態與行動〉，《歷史學報》第 27 期，1999 年 6 月，頁 121-146

³² Lee Ching Kwan and Yang Guob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³³ Keith A Crawford and Stuart J Foster, *War, Nation, Memor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World War II in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 2007.

³⁴ Ian Buruma 著，林錚顛譯，《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臺北市：博雅書屋，2010 年 4 月初版。）

而涉及以臺灣本身的認同議題。³⁵另也有學者以臺灣戰後社會、政治與文化的變遷，來探討族群或國家認同，³⁶尤其近年以日本學者若林正丈之著作最為詳盡，探討戰後臺灣面臨各種社會事件、外交困局，以及國民黨的困頓等，試圖解析臺灣地區的國家認同。³⁷

不過綜而觀之，學界對於中國國民黨為首的政府所塑造之認同問題，大致仍以 1945 至 1949 年之間為界，或以「中國認同」為首，探討對日抗戰的記憶；或有「臺灣認同」為核心，試探日籍臺灣兵、臺灣慰安婦之議題，鮮少有綜合性地評述。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面向，為當前歷史記憶理論已堪稱完備，可惜史學界對於歷史記憶的理論還是偏就 Halbwachs 的集體記憶為主，也就是重在回憶與社會群體的互動層面，並籠統地將理論套用於論述上。例如王明珂對於古代器物、文獻以及今人對祖先歷史的瞭解，是以集體記憶或社會記憶的概念探討之。³⁸實際上，諸多觀點已涉及後世闡揚的理論，如「文化記憶」或

³⁵ 杜正勝，〈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臺灣歷史教科書風波的分析〉，收錄於《臺灣心臺灣魂》（高雄市：河畔出版社，1998年），頁149-161。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州的「國史」教育〉，《臺灣史研究》第10卷第1期，2003年6月，頁33-83；〈當前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的幾點看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57期，2005年3月，頁247-254。

³⁶ 王明珂，〈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臺灣的族群經驗〉，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臺北市：編者印行，1994年），頁249-274。尹章義，〈「臺灣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歷史的觀點〉，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363-387。劉阿榮，〈全球在地化與文化認同：臺灣文化認同的轉化〉，收錄於《中山文化暨古典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臺灣學生，2007年）；〈族群記憶與國家認同〉，收錄於《多元文化與族群和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臺北教育大學，2007年11月）。

³⁷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5月初版二刷）。

³⁸ 王明珂，〈歷史事實、歷史記憶與歷史心性〉，《歷史研究》2001年第5期（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10月），頁136-147。

「記憶所繫之處」的概念。雖然集體記憶一詞，確實可以概括歷史文本撰寫之所需，不過 Pierre Nora 與 Assmann 夫婦等人提出的論點，更能將 Halbwachs 以社會學觀點出發的記憶理論發揮得更詳盡，尤其得以區別世代記憶的差異，以及形構記憶方式的不同。

（二）國家宣傳與記憶形塑

近年來學界紛紛注意到宣傳與記憶型塑之關聯，像是翟志成便以宣傳為分析角度之一，對中共長期以來塑造的「平型關大捷」提出論述，當中引述報紙對戰事的報導，認為這場戰役被扭曲為英雄史詩般的存在，並從抗戰期間，便一直被歌頌直到 1980 年代，成為中共唯一的抗戰戰爭記憶。³⁹在此之前，報刊業發展對於宣傳的重要性，則早已在學界有不少論述。社會科學領域討論新聞報業，多以西方的新聞學角度進行探悉，且幾乎皆以宣傳、說服與溝通等理論，來探討中西方戰爭傳播，以及國家、國軍的宣傳機構、傳播策略與公共關係。⁴⁰從這些著作當中，可以注意新聞在不同時期受到政府或軍隊決策的影響

³⁹ 翟志成，〈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1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年 3 月），頁 131-186。

⁴⁰ 相關期刊論文有：康力平，〈戰爭時期新聞處理與運用——美軍與媒體關係演進歷程對國軍之啟示〉，《復興崗學報》第 83 期（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5 年 6 月），頁 117-142。胡光夏，〈媒體與軍隊關係的演進：戰時新聞媒體管制與運用的發展〉，《復興崗學報》第 89 期（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7 年），頁 77-106。胡光夏·陳竹梅，〈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復興崗學報》，第 98 期（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7 年），頁 1-26。張瑀，〈軍事新聞記者的角色、功能與報導策略變遷研究〉，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另有專書：方鵬程，〈戰爭傳播：一個「傳播者」取向的研究〉（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7 年 5 月一版）。

而產生質變，並可能影響人們歷史記憶的塑造。可惜的是，新聞傳播學界截至目前仍主要探討西方新聞業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或是作者對史學之應用不足，文獻爬梳不夠充分，難以對晚近臺灣與中國的軍事傳播概念深入地解析。

歷史學界則多不套用西方的傳播理論，而以文獻與檔案探討國民政府在戰時的宣傳政策以及政府與報業間的互動關係。⁴¹臺灣長期以來皆有作者介紹民國時期以來的報業與報人，並加以論析閱報狀況；⁴²中國學界則對於抗日與國共內戰期間的中共新聞業之論述開展甚早，⁴³但受限於時空環境，對於戰時國民政府的傳播事業掌握並不深。對於第一線的記者，賴光臨在 1980 年代便具體地定義戰地記者，且運用記者的回憶錄，進一步探討記者或新聞從業者在戰時與國家的互動關係。⁴⁴王凌霄則是運用不少官方與民間的檔案，爬梳國民黨訓政時期，以及抗戰階段的新聞宣傳相關政策，⁴⁵為目前最有系統的專書，有助於學界瞭解宣傳背後的制度面向。近十年歸功於史料陸續開放，相關研

⁴¹ 陳順枝，〈抗戰時期宣傳政策之研究〉，臺北市：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年。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 年。

⁴² 賴光臨，《七十年中國報業史》（臺北市：中央日報社，1981 年 3 月初版）。蔡曉濱，《中國報人》（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0 年 12 月一版）。

⁴³ 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編，《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新聞界》（重慶市：重慶出版社，1987 年出版）。顧隸、方偉，《中國解放區攝影史略》（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7 月 1 版 1 刷）。穆欣，《抗日烽火中的中國報業》（重慶市：重慶出版社，1992 年 8 月 1 版 1 刷）。甘險峰，《中國新聞攝影史》（北京市：中國攝影出版社，2008 年 7 月 1 日一版）。方漢奇主編，〈抗日戰爭時期的新聞事業〉，《中國新聞傳播史》（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二版）。

⁴⁴ 賴光臨，〈抗戰時期軍事記者的角色與地位〉，收錄於《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1937-1945）》，頁 963-988。

⁴⁵ 王凌霄，《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臺北市：國民黨黨史會出版，1996 年初版）。

究更加多元。吳怡萍引用大量中國檔案館所保存的史料，研究國民黨與藝文界之互動，對於瞭解戰時政黨、政府對於藝文刊物或團體的管制與態度，具有很大的貢獻。⁴⁶

而臺灣人民與中國民眾對 1937 至 1945 年間的戰爭記憶因所屬國家不同而有極大的差異。對此，中華民國接收臺灣後，不僅是對中國人戰爭記憶的再形塑，也是重新形塑臺灣人之記憶。國民黨主要的方式，是廣泛地從藝文界之影視作品著手，學界已有不少戰後臺灣藝文制度與機構的討論。張宏維從中央政府的機構來看戰後臺灣的文化政策，著重探討「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教育部成立之文化局，以及 1981 年成立的文建會等三大組織為主，⁴⁷不過其目的在於分析文建會內部的政策問題，而非對於整體國家文化政策的研究，對於文建會實質的政策及其影響，仍有進一步探究的空間。另有從黨的角度來論析國民黨政權對文化之控制，如袁公瑜〈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之研究〉一文，以中國國民黨改組以來的多次組織修改為經，並以新聞學的角度為緯，試圖探究黨國體制國家與媒體的互動關係。⁴⁸隨後，學者進一步以個案分析，認為國民黨遷臺初期，中央改造委員會底下的「第四組」進行黨文化宣傳任務，但其控制成效並不如預期；後期因出版法的修訂，使國民黨得以展開大幅的收編和鎮壓政策，加上軍

⁴⁶ 吳怡萍，〈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其運作〉，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

⁴⁷ 張宏維，〈由文建會預算結構變化看臺灣文化政策演變〉，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⁴⁸ 袁公瑜，〈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之研究〉，宜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情、政工制度的配合而控制民間。⁴⁹另〈「國民黨國機器」操控媒介形勢的轉變(1924-1999)〉一文則是從1924年國民黨改組後的控制形式為引，並以「黨國機器」為核心，論述國民黨來臺後的文化控制政策，無論是媒體組織，或新聞從業人員的培養和控制都有涉及；⁵⁰然而，作者在論述的同時，卻過度強調國民黨的黨國機器運行，忽略了實際運作的成效。

藝文界與政府的互動方面，則早在1990代便有學者相繼探討電影事業與國民黨政府之間的聯繫。《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一書，以「國權體制」取代「黨國體制」及「威權體制」等詞，探討戰後國民黨與電影業界的互動，發現國民黨對於電影的「政治肅清」其實並不顯著，其分析當中因素，認為左派電影人大多留在上海，而臺灣本土文化界人士則普遍對電影產業不感興趣。⁵¹李天鐸則是進一步評析黨國體制下的電影發展，強調戰後以法制化的檢查系統以及樣板式的輔導獎勵，而樹立以反共抗俄為基準的機制，以及此機制在1960年代逐漸以後的崩解。⁵²李氏與盧氏都是將臺灣的電影發展扣緊黨國體制的運作，說明了國民黨在陌生的土地，為了穩定局勢、建立反攻基地，而對文化、思想制定政策，但兩位作者都認為

⁴⁹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年11月），頁221-262。

⁵⁰ 管中祥，〈「國民黨國機器」操控媒介形式的轉變(1924-1999)〉，《傳播文化》第9期（臺北縣：天主教輔仁大學傳播學院，2002年4月），頁164-201。

⁵¹ 盧非易，《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臺北市：遠流出版，2000年11月1日初版二刷）。

⁵² 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臺北縣：視覺傳播藝術學會，1997年10月初版）。

黨國之下的電影產業，即使政策限制多且廣泛，仍然能夠擺脫政府與政黨的控制。

鄭玩香在眾多臺灣電影史的相關研究之基礎上，進一步以《電影檢查法》、《電影檢查法施行細則》以及《電影檢查標準規則》來分析 195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代初期，政府對電影產業的控制。她認為電影檢查的標準雖然因應時代環境而變化，不過因為沒有客觀的標準，法令或第四組的審查機制皆憑靠「政治判斷」來施行，因此造成片商所呈現的電影，與國家政策之間微妙的關係。⁵³

音樂歌曲方面，李坤城於《再見！禁忌的年代》敘述戒嚴時期各個階段的禁歌。⁵⁴高仲恆則在《國家、市場與音樂——戒嚴時期臺灣愛國歌曲的流變(1949-1987)》進一步分析國民黨政權治下的愛國歌曲，也是在國民黨反共政策下推行的政策，以獎勵、輔導等政策使民間創作愛國歌曲。1970 年代以後因經濟與社會變遷，愛國歌曲反而回到國軍內部傳唱；而校園民歌出現以後，「國族認同」問題開始被省思。作者更是將「市場」需求視為愛國歌曲性質轉變的重要媒介，並以中小學音樂課本的歌曲為例，可證明在九年國民基本教育之下，愛國歌曲受到廣泛的流傳，⁵⁵不過是否真的受到市場歡迎，作者則未進一步探討。

綜觀學界目前所出版的專書與期刊論文，聚焦於戰爭新聞、圖像

⁵³ 鄭玩香，〈戰後臺灣電影管理體系之研究（1950-1970）〉，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⁵⁴ 李坤城，《再見！禁忌的年代》（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新聞處，2007 年出版）。

⁵⁵ 高仲恆，〈國家、市場與音樂——戒嚴時期臺灣愛國歌曲的流變（1949-1987）〉，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 年。

所觸發的記憶與認同議題之專文較少，但已有逐漸開展之勢，尤其近年國史館、各家新聞媒體以及民間單位，陸續出版紀錄片或舉辦展覽活動，勢必強化大眾對記憶與認同的關注。而為了塑造記憶與認同，國家推行的「紀念性標誌」所觸發的教育與藝文界議題，需要從機構、機制為首進行討論。在這方面，1990年代末以來，已有不少前輩學者之研究，得以使論述更為充備。

（三）紀實攝影與攝影詮釋

本文的記憶塑造與認同，主要從新聞與圖像為基。在這方面，必須從「紀實攝影」⁵⁶與文字報導二者著手進行研究：首先，紀實攝影在十九世紀中葉成為攝影界的一種表現方式後，於二十世紀末開始有學者探究其發展，如 Mike Weaver 曾撰寫十九世紀的英國攝影史，當中所列舉的世紀之交之作品，已有了紀實攝影的雛形。⁵⁷1960年代以

⁵⁶ 紀實攝影始於十九世紀末，主要受到現實主義（寫實主義）的影響，與當時的繪畫創作、文學表現相同，均起因於對資本主義下的現狀感到困惑、憂心與不滿，進而訴諸關懷。紀實攝影乃攝影學下的表現風格之一，理論上不得違反客觀現實的條件。臺灣作家陳映真認為紀實攝影具有新聞性、敘述性與批判性等三大特性，紀實攝影家的照片必須傳達時效，同時表達故事與情感。也因此，紀實攝影可以包含人們日常生活的動態，也能事工作中的表現，或戰場上的狀態以及各地風景，進一步促使後世瞭解人類的制度、環境與行為。而從紀實攝影家所拍攝的對象，可以區分為風景與人文攝影；若依活動範圍與其性質劃分，有戰地攝影、新聞攝影與社會風景攝影等。總而言之，無論拍攝者、被拍攝者或觀眾，紀實攝影都是以「人」為核心，因此也能藉以探究「歷史記憶」之形塑。參閱：〈漫談紀實攝影與藝術攝影的區別〉，《旅遊綜覽》第32期（秦皇島市，2010年5月），頁58-61；陳映真，〈紀實攝影·序〉，收錄於 Arthur Rothstein 著，李文吉譯，《紀實攝影》（臺北市：遠流出版，2012年4月三版），頁2-3；〈紀實的攝影概念特點及方法〉，收錄於「中國紀實攝影網」：<http://www.docph.com/detailed.php?id=2979>（2012年12月21日點閱）。

⁵⁷ Mike Weaver, *British Phot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後，歐美學界相繼出現專書或期刊，不僅介紹世界各地的攝影風格，亦收錄攝影史研究的文章，並對 1930 年代美國紀實攝影展開論述。⁵⁸

幾乎同一時間，華人圈也開始介紹歐美著名的人文紀實攝影師及其作品，並引入攝影理論，⁵⁹對於當時攝影界侷限於國內的眼界有開拓作用。其中《中國攝影史（1840-1937）》一書，從攝影技術在中國的萌芽，到民國以後的發展概況都有所論及，並進一步介紹重要的報刊、記者、攝影藝術家以及攝影團體等，更以大量的照片來說明紀實與藝術攝影，⁶⁰未偏廢任何一類的作品與成就，對於瞭解抗日戰爭前的中國攝影概況也有巨大貢獻。

1980 年代末，臺灣與中國學界各自因政治與社會環境的改變，而讓紀實攝影的概念與成果開始受到重視。⁶¹然而往後數年，隨著相機的普及，攝影界轉而著重攝影方法與技術，探討器材的工具書，強調美學、技巧的攝影藝術類書籍，以及名家的攝影集廣泛地在市面上出現，兩岸攝影史反倒乏人問津。期間蔣齊生等人雖出版《中國攝影史（1937-1949）》，自詡為《中國攝影史（1840-1937）》的續集，然而實際上此書出版時已距初稿完成約十年之久，且史料考據不盡理想，學

⁵⁸ Beaumont Newhall,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From 1839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2(1997 printing). William Stott, *Documentary expression and thirties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John Szarkowski, *Photography Until Now?*.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9. Arthur Rothstein, 著，李文吉譯，《紀實攝影》（臺北市：遠流出版，2012 年 4 月三版）。

⁵⁹ 曾恩波編，《世界攝影史》（臺北市：藝術出版，1973 年出版）。阮義忠，《當代攝影大師：二十位人性見證者》（臺北市：雄獅出版社，1985 年初版）；《當代攝影新銳：十七位影像新生代》（臺北市：雄獅出版社，1989 年初版）。

⁶⁰ 陳申等著，《中國攝影史（1884-1937）》（臺北市：攝影家出版社，1990 年 2 月初版）。

⁶¹ 〈在歷史、文化、政治、倫理中的中國紀實攝影〉，載於「中國紀實攝影網——紀實宣言」：<http://www.docph.com/detailed.php?id=175>（2013 年 1 月 2 日點閱）。

術價值並不高，唯全書分別將抗戰與內戰時期的國民黨、共產黨各自之攝影發展進行討論，可藉以比較二者的差異。⁶²即便近年以攝影史為主題的專書再起，但不僅歐美作者仍偏廢華人圈的攝影環境，⁶³臺灣及中國所出版的書籍，亦主要探討華人及亞洲以外的攝影發展史。⁶⁴唯鄭意萱另有專書介紹西方的紀實攝影發展，並以專章介紹新聞攝影、戰爭攝影等類型，乃較有系統化的論著。⁶⁵

對於紀實攝影，抑或其範疇之下的戰地圖像之詮釋，絕不能忽略 Susan Sontag (1933-2004)。她在 1977 年及 2003 年分別出版《論攝影》(*On Photography*) 與《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不但是反戰宣傳，也是人道關懷，更是對歷史記憶形塑的嚴厲警示。其主要論點，是對美國的紀實攝影，尤其是 1960 年代無論是數量或引發之議題皆具爆炸性的越戰照片進行強烈批判。認為紀實攝影師或戰地記者，總以自身的角度完成作品，以為作品就是「世界」；從另一角度視之，Sontag 以為檢視照片的觀眾，也是基於好奇心，或自我滿足的心理，卻往往無條件地接受照片拍攝者所加諸的想法，未能對經過刻意編排的照片加以檢視、批判。因此久而久之，人們也將變得麻木，對許多看似重要，牽涉社會關懷或道德層面的照片，再也無法被挑起

⁶² 蔣齊生等編，《中國攝影史：1937-1949》（北京市：中國攝影出版社，1998 年一版）。

⁶³ Reuel Golden 著，鍾聖雄·莊璧綺譯，《目擊的力量：新聞攝影 150 年》，臺北市：城邦文化，2012 年 9 月初版。

⁶⁴ 李文方，《世界攝影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 1 版 1 刷）。鄭意萱，《攝影藝術簡史》（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10 年 3 月再版）。

⁶⁵ 鄭意萱，《紀實攝影的故事》（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13 年 1 月初版）。

情緒；⁶⁶而唯一不讓自己變得麻木的方法，便是將人文關懷付諸行動。

67

藝術史學家 John Tagg 也對攝影本身提出評論。強調攝影在社交地點和其實踐都具有多重性，意即攝影行為的背後，早就與傳播和政治、社會行為互相牽連，因此研究攝影史，必須同時探討攝影的空間環境，才能突顯攝影動機、攝影用途、攝影對象等議題之意義。⁶⁸Mary Warner Marien 則以十九世紀的攝影名家與作品為例，探究攝影與大眾文化、教育和現代性的關聯，進一步反觀 1990 年代的攝影與社會互動。

69

受到歐美學界攝影理論批評家的影響，臺灣學界較有系統地定義並評論紀實攝影者為李昱宏。他從攝影批評者的論點歸納紀實攝影之特性，認定紀實攝影本身是由上層階級所發起，其視野建構於既有的意識形態上，因而紀實攝影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偽造。⁷⁰同一年，David Bate 的著作則意圖讓攝影者或讀者接受他對攝影的詮釋，並以當今的視角審視攝影圖像的傳播與全球化；他也喚起逐漸淪於藝術批評的攝影評論，希望能運用符號學、心理分析等學科重新思考攝影型式。更

⁶⁶ Susan Sontag, *On Photograph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77. 中譯本見黃燦然譯，《論攝影》，臺北市：麥田出版，2012 年 1 月初版六刷。

⁶⁷ Susan Sontag,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3. 中譯本見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臺北市：麥田出版，2011 年 12 月二版四刷。

⁶⁸ John Tagg,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London: Macmillan, 1988, p. 118

⁶⁹ Mary Warner Marien 著，郝紅尉·倪洋譯，《攝影與攝影批評家——1939 至 1900 年間的文化史》（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 年 10 月 1 版 1 刷）。

⁷⁰ 李昱宏，《灰色的隱喻：時間、機會、攝影與決定性瞬間》（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11 年初版三刷）。

重要的是，Bate 呼應 Tagg 的基調，希望攝影不能與歷史切割，無論是攝影當下所塑造的歷史意義，抑或相機發明前後的任何一切視覺感官，都與攝影本身密切聯繫。⁷¹面對攝影與歷史的結合，香港的攝影學界出現「觀念攝影」一詞，主張攝影只是攝影師或藝術家主觀思維的媒介，故除了承襲既有紀實攝影的影像真實感，也希望傳達更深遠的信念、思想。這項論點除了繼承歐美學者攝影批評家的論點，也是寄望在現代藝術之外，開拓另一條二十一世紀紀實攝影的道路。⁷²這也如同吳鼎武·瓦歷斯⁷³的數位創作，一系列看似平凡的原住民紀實攝影，其實是以數位影像拼湊而成，意圖告知世人文化邊陲的民族終究逃離不了被消音的命運，更要透過想像秩序喚起記憶深處的意識。⁷⁴

攝影理論應用上，受到傳播理論與宣傳效果之影響，開始有發揮於歷史記憶研究的趨勢。周俊雄直接以紀實攝影中的戰爭圖像探討對人們發生的作用，他舉出十九世紀以來各大戰爭的著名照片，強調各時期不同技術或科技扮演的媒介作用，讓戰場以外的人們獲取圖像資訊，並觸發一切的觀感。雖受限於篇幅，未能細緻地說明政府或媒體對整體社會層面的傳達，或人們反應的差異，但能關切「接收—反應」，對於探討紀實攝影的歷史記憶形塑具備開路先鋒的條件。⁷⁵近期國立

⁷¹ David Bate 著，林潔盈譯，《攝影的關鍵思維》（臺北市：城邦文化，2012年8月初版）。

⁷² 樊婉貞，《非關真相——一九〇年代至今華人觀念攝影》（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2008年7月初版）。

⁷³ 吳鼎武·瓦歷斯為現代藝術家，1960年生，屬賽德克道澤族，全名為瓦歷斯·拉拜（Walis La-Bai）。

⁷⁴ 姚瑞中，《臺灣當代攝影新潮流》（臺北市：遠流，2003年6月初版一刷）。

⁷⁵ 周俊雄，〈新聞攝影與歷史圖像——以戰爭影像傳播為例〉，《宜蘭文獻雜誌》第85/86

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的「從影像看二十世紀中國」計畫，更是吸引國內外學者投入對照片、紀錄片與電影等影像的研究，使影像不再是文獻研究的附屬品，也讓影像的詮釋權不再被藝術領域完全把持。學界近年出現一種跨足傳播學與接受史的書寫，主張抗日戰爭對於中國而言有兩層意義：其一是擺脫帝國主義的殖民剝削；其二為對現代性蘊藏的暴力之批判，呼應中國長期以來反帝、反封建的思維，並以《南京！南京！》等抗戰影像，分析中國對於現代性批判的過程中，「我者」與「他者」的相對位置。⁷⁶另也有以歷史敘述為本位的影像分析，如羅國儲據引淞滬會戰當時的影像史料，並以部分篇幅探究、比較中日雙方所出版的畫報之主題。⁷⁷蕭李居則從日本的《日支事變寫真實記》，研究日方於戰爭期間的宣傳手法，並試圖瞭解日本人對戰爭的感受。⁷⁸

整體而言，隨著記憶理論的定型，及長期以來對國家塑造與認同的研究，史學界已能將二者契合，不過應用的史料方面，大多還是侷限於教科書、文學作品與報刊等文本，對於影像的運用算是研究的新形態，其發展空間勢必相當地大。

期（宜蘭縣：宜蘭縣文化局，2010年6月），頁95-111。

⁷⁶ 張慧瑜，〈抗戰影像中歷史記憶的改寫〉，《二十一世紀》第123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1年2月），頁106-114。

⁷⁷ 羅國儲，〈淞滬會戰的影像與實像〉，收錄於劉維開編，《影像近代中國》（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初版一刷），頁71-90。其他尚有不少與紀實攝影相關但未出版的文章：蕭李居，〈戰爭宣傳——日本《日支事變寫真實記》的圖像敘事〉、張力，〈影像裡的中華民國新海軍〉、李學通，〈美國在華的軍事存在——美軍駐天津第15步兵團歷史影像〉、楊善堯〈戰後中華民國陸軍衛生勤務的圖像敘事〉、林佳樺，〈影像中的精神傳遞：蔣夫人文化外交初探〉等，均收錄於《影像與史料——影像中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

⁷⁸ 蕭李居，〈戰爭宣傳——日本《日支事變寫真實記》的圖像敘事〉，發表於「影像與史料——影像中的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2014年10月11-12日。

第四節 章節架構

本文除了緒論及結論之外，全文分為三章，每章各三節。

第二章主要探究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前後，對於國家認同的建構方式及其宣傳運用。第一節概述歷史記憶的源流，並從學者的觀點，綜合歷史記憶、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之別及特徵，藉以理出本文所需的記憶架構。第二節則著重民國以來的國家塑造，尤其探討國民黨在歷經革命挫敗之後，如何建立黨國體制，而逐步塑造認同，同時釐清中華民國在 1930 年代以後，分別於中國與臺灣訂定的文化宣傳措施及成立之機構。第三節探討國家與媒體的關係，以及新聞事業如何在戰前與戰爭期間運行，特別針對黨政系統新聞事業的成立與發展進一步討論。另外，當國民政府與國民黨注意到新興宣傳武器——「影像」的力量時，又是成立哪些機構，提供國家在抗戰階段得以有效地對內外宣傳；同時，將界定戰爭影像之類別，藉以清楚地界定戰時的新聞業概況與國家對之的掌控。

第三章探究淞滬會戰期間的集體記憶，主要探查對象為當時的報刊與影像之宣傳內容。第一節概要地交代淞滬會戰的背景與過程，瞭解國軍在會戰中的盛衰，有助於後續章節討論宣傳策略與成果。第二節彙集《中央日報》、《申報》、《大公報》、《立報》等中央與地方大報，及《國聞週報》、《抗戰三日刊》等文字刊物，爬梳報導戰役的過程、後續追蹤或對民眾宣傳抗戰意旨之相關新聞及評述，並進一步探究是否與國家新聞政策及宣傳策略相互呼應，以瞭解對日抗戰期間文字新聞對戰爭記憶的影響。第三節轉以「影像」進行敘述，援引中國的《戰

時畫報》、《辛報戰情畫刊》等雜誌刊物所出現的戰爭照片，以及會戰後所出現的紀錄片，詳究照片或動態影像本身拍攝的背景、過程與宣傳方式。這些影像不但可彌補文字對戰役描述的不足，更可進一步探究戰役本身與戰事宣傳、紀念之狀況。

第四章的主軸是「文化記憶」，亦即國家或特定單位組織，透過慶典、儀式以及文本等媒介，將戰事本身帶給不曾親身經歷某場戰役的人民，使人們長時間擁有對日抗戰的記憶。為了釐清戰後不同時代潮流所觸動具有差異的記憶與宣傳模式，因此本章將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區分為兩個時期來探討，以區別在中國大陸時期的記憶形塑與宣傳特徵。由於戰爭宣傳在不同時期，會因應不同目的而有變化，因此第一節將對戰後宣傳進行分期，並探討淞滬會戰塑造出的英雄、英雌，如高志航、謝晉元、楊惠敏在戰後宣傳與文化記憶上的意義。第二節著重討論歷史文本與紀念儀式中的淞滬會戰，網羅中小學的國文、社會、歷史教科書，或民間出版的文本與圖錄，以及報章雜誌及紀念儀式當中對於會戰本身或名將的紀念標誌。第三節則轉從藝文界的電影、紀錄片著手。二、三兩節透過不同形式，探討國家對戰役的內容敘述討論戰後臺灣各個時期對淞滬會戰及英雄形象所呈現內容之不同，以研究不同時空背景與觀念波動下，對於同樣戰役所呈現的敘述差異。

第二章 戰爭宣傳與記憶理論

第一節 歷史記憶源流與發展

本文「戰爭記憶」，指的是「歷史記憶」架構下的一支。歷史記憶源自於「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它之所以受到關注，源於1960至1970年代，當時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認為歷史編纂為文化支配之根源，於是挑戰主流的歷史敘述手法；同時，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也抨擊線性的歷史所帶來的認同；再者，文化霸權理論(Cultural Hegemony)論述以階級為觀念為基礎，強調大眾通俗記憶及記憶的爭論與制度化。¹於是1980年代以後，集體記憶成為諸多學科重視的議題之一。

當前各領域主要講述的集體記憶理論，是由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在1920年代透過社會學概念所提出，他撰寫的《記憶的社會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又譯為《論集體記憶》)，強調人們對於某個時代、某個人或某件事的記憶，都依賴於「社會結構」。人不可能單憑自身的力量，便重現意圖呈現的過去，而必須依附於有同樣共識的社會群體當中。²學者認為，Halbwachs 所謂的集體記憶，是透過小型的社會團體或更為龐大的文化群體為媒介，彼此交流互動，而對某一段歷史有「共同的認知」。³也就說，團體的動力加諸

¹ Jeffrey K. Olick、Joyce Robbins 著，周雲水譯，〈社會記憶研究：從「集體記憶」到記憶實踐的歷史社會學〉，《思想戰線》第37卷第3期（昆明市：雲南大學思想戰線雜誌社，2011年5月），頁10。

² Maurice Halbwachs 著，華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1版1刷），頁73-314。

³ Jan Assmann, translated by John Czaplicka, “Colle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於個人記憶之上，便能形構集體記憶，小從家庭內部成員共有的記憶，大到全國、全族人民共同之記憶，都能稱為集體記憶。其體現的對象包含某個時代的事件、建築、流行文化與用字遣詞等，由於與社會互動極為密切，因此也有人稱之為「社會記憶」或「溝通記憶」。⁴

不過，「歷史」與「記憶」在後世學者的研究當中，認為必須分開探討。Pierre Nora 主張歷史尋求「真相」，而記憶則是講求「忠實」，不過二者的共通點都是對於過去的一種管理與操作，並因此常改變現今的認知以及對於未來運行的方向。⁵李紀祥則將歷史分為 A、B 來解釋。歷史 A 是時間的流逝，屬於不可逆；歷史 B 則為對過去的回溯與回憶，透過歷史 B 的回憶，可以將歷史 A 的自然時間序列呈現於歷史文本上，並且透過選擇回溯之內容，使得歷史書寫出現「可斷性」。再藉由「轉述」，將時間序列中的「情節」具體呈現，便能塑造人物、事件交織的多元歷史敘述。⁶意即唯有經過重新整理的回憶，或化記憶而成的歷史文本，才會讓歷史與記憶產生交集，塑造集體記憶並誘發認同。⁷換言之，人們對某個特定時間所發生的事情之概念與認知，都是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New York: The Department of Germ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Spring-Summer, 1995), pp. 125-133.

⁴ Aleida Assmann、Jan Assmann 著，陳玲玲譯，〈昨日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收錄於 Astrid Erll、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 月 1 版 1 刷），頁 20-24。

⁵ 戴麗娟，〈譯者導言〉、Pierre Nora，〈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收錄於 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第 1 冊（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年 9 月初版一刷），頁 7-36。

⁶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新北市：華藝學術，2013 年 5 月初版），頁 37-58。

⁷ 戴麗娟，〈譯者導言〉、Pierre Nora，〈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收錄於 Pierre Nora 著，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第 1 冊（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年 9 月初版一刷），頁 7-36。

後天社會環境所發展而來。以「國家認同」為例，青年學子並非天生便有愛國意識並對國家的今昔有所認同，必然經過教育、媒體及學校內教師與同學建構的群體等媒介，傳達國家某一特殊背景下的回憶而成為學生之間的集體記憶，最後進一步地塑造認同。

歷史除了有時間意涵，也包含空間概念。Pierre Nora 研究歷史記憶，最重要的論點便是將歷史的時間與空間特性合而為一，他發明「記憶所繫之處」(Les Lieux de memoire) 一詞，認為存在於特定空間的紀念碑、紀念儀式等，屬於一般性的歷史沿革，稱之為「處所」。但當這個處所極為混雜且具變動性，並且與時間概念密切相關時，便是記憶所繫之處。⁸這個概念至少有三項共同存在的特性：(一) 物質性。例如檔案館為象徵意義，但當想像力賦予光環時，便成為記憶所繫之處。(二) 象徵性。例如默哀儀式，卻能用週期性的方式讓它反覆發生，藉由集中精神召回記憶，如此便是記憶所繫之處。(三) 功能性。例如教科書，要發揮其功能，則必須有對象，方能成為記憶所繫之處。⁹而且由於能夠不斷地變化，故記憶所繫之處不會消逝，而會一直蔓延至人們無法想像的地步。

Jan Assmann 對類似的概念，稱之為「文化記憶」(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 Cultural Memory)。「文化」是為不斷循環接收某些訊息或機制的總體，它的範圍相當廣大，也因此具有時間性及空間性，使

⁸ Pierre Nora, 〈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 收錄於 Pierre Nora 著, 戴麗娟譯, 《記憶所繫之處》第 1 冊, 頁 27-28。

⁹ Pierre Nora, 〈記憶與歷史之間——如何書寫法國史〉, 收錄於 Pierre Nora 著, 戴麗娟譯, 《記憶所繫之處》第 1 冊, 頁 27。

得「過去」仍然存在於「現在」，並以特有的形式予以留存。¹⁰只要憑藉著文化記憶，無論數十、數百，甚至上千年的回憶空間都得以展現。Jan 與 Aleida Assmann 夫婦進一步比較文化記憶與 Halbwachs 的集體記憶：以為集體記憶是藉著虛擬的框架，賦予回憶有某些特殊意義，並屬於當代人共享的回憶；然而當人們遺忘某項回憶時，該框架便消失，並再補進其他的回憶而重建框架。不過，集體記憶因為當代人必然隨著時間而凋零，因此很常在不經意的情形下消逝，唯有賦予媒介而重新連繫，集體記憶才能延續，此時的歷史記憶才具有意義，即為「文化記憶」。¹¹換言之，集體記憶主要是個體在生平所發生或聽來的歷史經驗與回憶，透過時代的見證者傳承，因此通常會在三至四代之間流傳；文化記憶則是更久遠以前的事件，透過文字、影像、儀式承載記憶。¹²當然，記憶傳承的媒介於各個歷史時期有所不同，如史前時代至上古時期，透過檔案的紀錄與紀念日；文藝復興以降則有印刷術、雕像、圖書館與博物館等；二十世紀以後則出現影像。¹³

透過上述各學者的觀點，可以將歷史記憶歸納為個體回憶、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三個面向。個體回憶屬於社會群體中個人的記憶，它並未經過整理，若未與社會其他個體互動，這些記憶並沒有太大的意

¹⁰ Jan Assmann 著，甄飛譯，〈文化記憶〉，收錄於 Astrid Erll、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頁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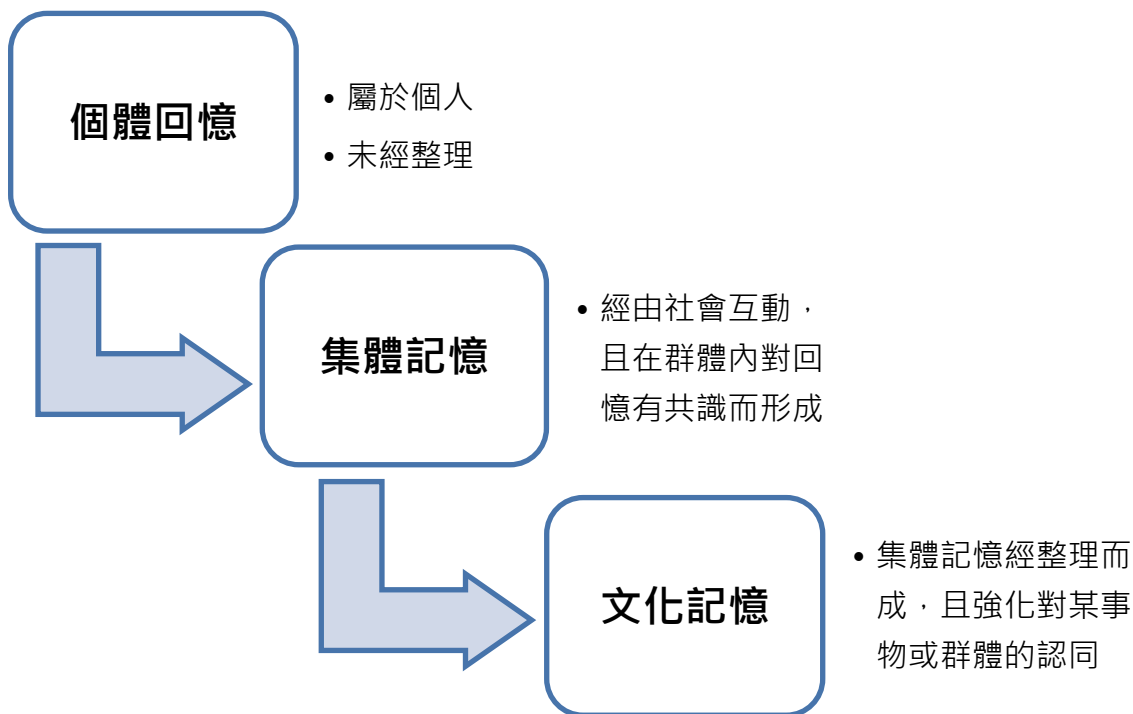
¹¹ Aleida Assmann、Jan Assmann 著，陳玲玲譯，〈昨日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收錄於 Astrid Erll、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頁 23-26。

¹² Aleida Assmann、Jan Assmann 著，陳玲玲譯，〈昨日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收錄於 Astrid Erll、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頁 25。

¹³ Jeffrey K. Olick、Joyce Robbins 著，周雲水譯，〈社會記憶研究：從「集體記憶」到記憶實踐的歷史社會學〉，《思想戰線》第 37 卷第 3 期（昆明市：雲南大學思想戰線雜誌社，2011 年 5 月），頁 11-14。

義，且可能很快地被遺忘。若個體之間彼此交際，真實經驗與聽聞而來的內容成為同時代的人們之共識，便稱為集體記憶，且促使人們在各個群體之間，找到各自集體記憶的相似處與身分認同。¹⁴然而集體記憶仍可能因時間與空間的轉移而逐漸被遺忘，為了不使集體記憶產生斷裂，透過紀念碑、紀念儀式、節慶、圖像、影像與整理過的歷史文本，便能重新賦予意義，即是文化記憶。(圖 2-1-1)

圖 2-1-1：歷史記憶的轉化



¹⁴ Maurice Halbwachs 著，丁佳寧譯，〈集體記憶與歷史記憶〉，收錄於 Astrid Erll、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頁 91。

近期有學者針對歷史記憶與國家政權的互動進行研究，認為歷史重構可以透過記憶獲得指導，也能反過來塑造人們的記憶。然而，若有政權有意地透過國家機器剝奪國民或其所統治的某地人民之記憶時，這項互動性便會產生質變。¹⁵意即，記憶與社會之間的互動具有高度複雜性，經常涉及權力重新分配、衝突調解、群體意識凝聚與社會秩序再造。¹⁶Assmann 夫婦對此認為國家或統治者往往不僅要塑造過去，更要掌握未來，於是透過合法化的方式，豎立銅像、雕像或紀念碑，甚至編纂教科書或制訂紀念節日，打造現實的記憶而篡奪過去之記憶；再者，歷史記憶若涉入政治愈深，則記憶在官方賦予的框架內之有效期限便會愈來愈短，¹⁷官方不但能隨時更動國家當前所需要記憶，也可能隨著政權的更迭而被塑造另一種記憶。Louis Althusser 亦言，政黨或某一群體會利用壓制性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限制人民行動，以及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控制人民思想，目的即是為了保有在國家的政治優勢。¹⁸Paul Connerton 舉出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在 1933 年以總理之姿奪權，

¹⁵ Paul Connerton 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2 月 1 版 1 刷），頁 11-12。

¹⁶ 李廣均，〈社群、民族國家和集體記憶——一九九五年臺北市「終戰事件」的初步思考〉，《社會文化學報》第 4 期（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1997 年 5 月），頁 254。

¹⁷ Aleida Assmann、Jan Assmann 著，陳玲玲譯，〈昨日重現——媒介與社會記憶〉，收錄於 Astrid Erll、馮亞琳主編，《文化記憶理論讀本》，頁 28-29。

¹⁸ Louis Althusser,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 1971), transcribed in "Louis Althusser 1970 -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althusser/1970/ideology.htm> (2015 年 4 月 6 日點閱)。

到 1939 年開啟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期間的歷史為例。希特勒制訂的紀念日與紀念儀式，每年重覆性地紀念他成立國家主義社會德國工人黨（National Socialist German Workers Party，一般稱為「納粹黨」Nazi Party，Nazis）及他奪權的日子，或他的生日，以及青年團宣誓效忠元首——希特勒的儀式等，都讓原本單純的歷史事件，被創造為國家社會主義的核心，希特勒及其成為元首的過程，更像是神話般存於當時德國人的心中，於是信任、效忠、服從、犧牲與奉獻，成為國民必須的基本觀念，並在週期性的操演延續下來。¹⁹

因此，即使回憶屬於個人，並能在社會組織中成為集體記憶，不過當國家有需要之際，政權便可能透過各種形式改變記憶，然後經過數年、數代的傳承，被塑造的集體記憶遂成文化記憶，且建構民眾對國家或政權的認同。戰爭記憶作為歷史記憶的其中一環，它的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的建構同樣面臨國家與政權的「選擇」。其過程則又與「國家塑造」有關。

第二節 民國以後的國家塑造與認同

當國家刻意地刪修、增補人民的記憶，集體與文化記憶便會產生變化，而這正是國家政治權力的展現。進一步來說，唯有「執政者」才有辦法操作政治。²⁰當執政者掌握國家的政治文化與體系，透過「國家塑造」，便能達成「闡明政府功能與社會制度的關係」、「專制國家權

¹⁹ Paul Connerton 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頁 46-49。

²⁰ 呂芳上，〈政治轉型的挑戰——近代中國「黨國」體制的發展省思〉，收錄於呂芳上，《民國史論》上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年 12 月初版一刷），頁 161-162。

力集中化」以及「國家制度理性化」等三個目標。²¹學者認為中國在明清時期便已建立成熟的國家體制，主要體現於對領土疆域及人口的掌控，以及對外關係兩方面。內政上，即便各民族之間的差異與矛盾仍在，但透過對人口的管理制度，與經濟、軍事措施，國家大體形成統一局勢。外交上則建立朝貢關係，並且允許或禁止與歐陸各國通商往來，顯見維繫了國家主權。²²

西方政治學者自十九世紀歐美民族國家發展以來便致力於國家塑造的研究，並在 1950 年代以後關注亞洲的代表國——中國。不過研究的動機在於發現中共建政後的強大國家主權現象，為探究原因，所以對民國初年，主權相對脆弱的北洋政府，乃至於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產生興趣。²³同時，有些學者不再承繼早期對國民黨內在結構缺失而導致失敗的說法，反倒認為中國在面臨內憂外患下，國民黨仍能在戰前對於政治、社會與經濟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該段時間的國家塑造之成功已令人感到訝異。²⁴

西方學界晚近的研究取向，在我國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也能證明國民黨對國家塑造有相當的規模。必須注意的是，當「帝制」與「共和」

²¹ David Waldner, *State-Building and Late Development*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1.

²² 張玉法，〈近代中國早期的國家建制（1500-1840）〉，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31-68。

²³ 楊維真，〈戰爭與國家塑造——以戰時中國（1931-1945）為中心的探討〉，《漢學研究通訊》第 28 卷第 2 期，總期第 110 期（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2009 年 5 月），頁 6-7。

²⁴ Julia C. Strauss, *Strong Institution in Weak Politic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4-19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184.

之爭因民國成立畫下句點之際，國家再度陷入「總統制」及「內閣制」的糾纏。²⁵國民黨也在民國初年幾次的革命運動都以失敗坐收，而孫中山的民族主義「五族共和」的理念，則被「五域統合」，以漢族為中心的架構所取代，將新疆、西藏與蒙古等邊疆透過開發以進行整合，延續了清朝對疆域的概念，並使往後中華民國歷任政府對疆域主權相當堅持，而對邊疆民族的離異及被列強干涉的情勢抱持著順應局勢之態度。²⁶但無論如何，透過國家對領土的重視，促使國家塑造得以延續。

1924（民國 13）年國民黨全面改組，仿效蘇聯「以黨治國」，建立黨國體制，且意識到全中國必須透過革命力量統合後，國家塑造便再進一步得到強化。北伐前後，國民黨不但成立國民革命軍，也將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改組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一般稱「北伐軍總政治部」），表面上受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軍人部與宣傳部指揮，實際上直接隸屬於總司令底下，利用政治工作以傳單、標語等，對北洋軍所在地的民眾進行大規模的宣傳。²⁷北伐成功後，國民黨根據孫中山晚年的理念，將國家帶入「訓政」階段。除了 1928（民國 17）

²⁵ 桑兵，〈民國開國的歧見、新說與本相〉，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83-104。

²⁶ 劉曉原，〈從「五族共和」到五域統合——辛亥革命和中國國家型態近代轉型〉，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107-138。陳謙平，〈辛亥革命後中國的國際化與多民族國民國家的整合（1912-1946）〉，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139-175。

²⁷ 呂芳上，〈近代中國制度的移植與異化——以一九二〇年代國民革命軍政工制度為例的討論〉，收錄於呂芳上，《民國史論》上冊，頁 47-100。

年 10 月頒布「訓政綱領」，並依綱領第六項公佈《國民政府組織法》，確立國民政府受中國國民黨指導、監督，²⁸同時以《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將黨徽視同國徽；1930（民國 19）年又將黨歌作為國歌，藉著政治符號強化黨國體制。不過，孫中山的以黨治國理念，是以「黨義」治國，國家發展至此成為中央有黨義領政，地方則由地方政府負責，黨的力量於是在地方難以開展。²⁹黨中央正視到這項問題，遂在黨務運作方面，注意宣傳手段與成效：

關於黨義政綱政策及對內對外之時事宣傳，甚為努力，而其成效，亦頗有可觀。惟過去偏重於應付時事之宣傳，而其力量尚不能深入於全國最優秀智識分子，下不能普及於不識字之大多數民眾，今後必須一方面注重高深而有科學根據之宣傳，一方面注重文字以外的各種通俗方法，使黨義普及於全國人民。³⁰

為了強化、健全國家發展，國民黨必須進一步建立國家的意識形態，認為一切宣傳應該以服務國民為出發點，灌輸正確的智識而提高

²⁸ 劉維開，〈訓政時期「國民政府組織法」制訂與修正之探討〉，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491-496。

²⁹ 呂芳上，〈政治轉型的挑戰——近代中國「黨國」體制的發展省思〉，收錄於呂芳上，《民國史論》上冊，頁 161-169。

³⁰ 「對於中央組織宣傳訓練三部工作報告之決議案」（1930 年 3 月 6 日），〈第三次全體會議（民國十九年三月一日至六日）重要決議案〉，《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收錄於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七十九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9 年 6 月出版），頁 154。

國民程度，並且應該認定宣傳工作是復興民族、建設國家的重要工作之一，於是擬定宣傳工作內容：

- 一、關於總理遺教之宣傳，黨員人人均有此義務（由中央及省市宣傳部制定各種方案，並準備相當材料分發應用）。
- 二、關於推進之政治宣傳（傳布建設成績，介紹地方自治情形，說明施政方針及政策，批評政策之設施），黨的出版機關並聯絡一般刊物任之。
- 三、關於培養民族力量之宣傳（文藝學術經濟產業各方面），聯絡或扶助各種文化學術團體任之。
- 四、關於應付特種事蹟及重要時事之宣傳（如水災匪禍外患之類），由各級黨部聯絡相當之人員或機關共同擔任之。
- 五、關於國際之宣傳，由中央特設機關辦理，並指導海外黨員，使領館人員及留學生等共同擔任之。³¹

而從 1931（民國 20）年起，國民黨不但得面對剿共事宜，同時也展開為期十四年與日本之間的軍事武力對峙，其中與日本的對立關係更能突顯國家塑造。楊維真認為，中日戰爭除了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傷亡之慘重以外，對國家塑造而言也同樣重要，其中便促進中國民族

³¹ 「改進宣傳方案（中央執行委員會提）」（1931年11月10日），〈第二次臨時全體會議重要決議案：（一）黨務〉，《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收錄於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七十九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頁 244-246。

主義的發展。³²國家塑造與民族認同在這十餘年間，又以 1937（民國 26）年對日抗戰全面爆發後尤為明顯，其因乃是 1928 年至 1937 年之間，國民黨仍在持續建構黨國體制，且如前文所述，黨國體制運行往往只在國家中央產生作用。然對日抗戰全面開打後，1937 年 8 月 12 日蔣中正被推為陸海空司令，並擴大軍事委員會的職權；³³翌年，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推舉蔣中正為國民黨「總裁」；³⁴1939（民國 27）年 1 月，又在中央執行委員會設置國防最高委員會，「統一黨政軍指揮權，並代行中央政治委員會之職權，中央執行委員會所屬之各部會，及國民政府五院軍事委員會及其所屬之各部會，兼受國防最高委員會之指揮。」並且設委員長一人，由本黨總裁擔任。³⁵黨國體制因此轉型為黨、政、軍一體化，中央以軍事為中心，地方以黨政聯合強化一元化領導。

儘管實際運作受限於國民政府各部門機構過於龐雜，國防最高委員會並無法有效地擴張權力，最後僅確立蔣中正的領袖地位而已。³⁶不

³² 楊維真，〈戰爭與國家塑造——以戰時中國（1931-1945）為中心的探討〉，《漢學研究通訊》第 28 卷第 2 期，總期第 110 期（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2009 年 5 月），頁 8。

³³ 呂芳上，〈政治轉型的挑戰——近代中國「黨國」體制的發展省思〉，收錄於呂芳上，《民國史論》上冊，頁 170。

³⁴ 「選舉蔣公中正為本黨總裁」（1938 年 4 月 1 日），〈選舉總裁〉《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收錄於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七十六輯：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上）》（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年 9 月出版），頁 307-309。

³⁵ 「國防最高委員會組織大綱」（1939 年 1 月 28 日），〈第五次全體會議（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重要決議案〉，《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收錄於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七十九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頁 482-483。

³⁶ 呂芳上，〈政治轉型的挑戰——近代中國「黨國」體制的發展省思〉，收錄於呂芳上，《民國史論》上冊，頁 172。

過對日抗戰期間的黨國運作仍有效地發揮於宣傳等業務上，透過新聞、電影等文字與影像，以黨義及民族情感，塑造人民對國家的認同。

戰後，1946（民國 35）年制憲國民大會召開，準備實行憲法。國民政府早在 1936（民國 25）5 月 5 日頒布《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又稱「五五憲草」），然三民主義為依歸的憲法草案，直到抗戰階段仍備受在野各黨派的批評，認為會造成行政權獨大，而總統又主導行政權的局面。不過這些對憲法草案的疑慮並未被採納。³⁷國民黨認為，當時尚屬訓政至憲政的過渡期，根據孫中山的理念，這項「還政於民」的作法，實際上不是真的要國民黨讓出政權，而是將政權給選民、治權給政黨。同時，人民必須暫行三民主義才能行憲，而服膺於三民主義的政黨又唯有國民黨，因此國民黨依舊與國家人民合而為一，³⁸黨國體制無疑僅是換了「民主政治」的包裝。且制憲結果未依照「政治協商會議」，導致中共順理成章地否定制憲持果。³⁹迨 1949（民國 38）年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幾無立足之地，證明了黨國組織與體制已經潰散，於是蔣中正著手推行黨務改造，並在臺灣落實。

其中國民黨改造後的宣傳策略，都是配合「反共抗俄」方針而運行，使得諸如軍中的「反共」思維，已經內化為「基本倫理」，而不再

³⁷ 薛化元，〈從民國建立到民國憲政——中國憲政發展的考察（1912-1949）〉，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 589-609。

³⁸ 呂芳上，〈走出「黨國體制」的陰影——中國國民黨的轉型（一九五〇～二〇一〇）〉，收錄於呂芳上，《民國史論》上冊，頁 203。

³⁹ 薛化元，〈從民國建立到民國憲政——中國憲政發展的考察（1912-1949）〉，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 608。

只是「意識形態」。1952（民國 41）年蔣中正發表《反共抗俄基本論》之後，「三民主義」被形塑為以武力反攻復國，而忽略民權、民生乃至於民主議題，使得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塑造面臨嚴峻的挑戰。⁴⁰江宜樺認為當時所訴諸的三民主義與孫中山提出的想法有所差距，也由於是以反共復國為目標，因此稱之為「革命民主主義」。⁴¹直到 1960 年代末開始面對外交困境，加上國內興起民主改革的聲浪，國民黨早已失去塑造黨國意識形態的機會，但為了強化統治的正當性與延續性，於是再度將對日抗戰等得以訴諸民族情感的事蹟加以宣傳、灌輸。

大體上，國民黨在臺灣最重要的宣傳單位為「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也就是後來的「文化工作會」，及今日「文化傳播委員會」的前身。遷臺初期，國民黨不將國內新聞的審核管理工作交由行政院新聞局負責，反而交給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主要是蔣中正希望國際宣傳方面由新聞局負責，而第四組則負責國內宣傳業務。第四組不但根據國民黨中央內部的分工進行黨文化宣傳任務，同時也是根據黨主席的意旨來進行。儘管 1950 年代前期，第四組對於新聞自由的重視與黨內意見產生矛盾，控制言論、擴大宣傳的成效並不如預期，然後期因出版法的修訂，使國民黨得以展開大幅的收編和鎮壓政策，加上軍情、政工制度的配合而控制民間。⁴²往後第四組便真正依循黨的原則，

⁴⁰ 石佳音，〈中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與組織特質〉（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 1 月），頁 75-109。

⁴¹ 江宜樺，〈臺灣戰後政治思想與民主運動〉，《臺灣社會研究》第 65 期（臺北市：世新大學臺灣社會研究國際學術中心，2007 年 3 月），頁 191-199。

⁴²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 32 期，2009 年 11 月，頁 221-262。

宣傳三民主義理論與反共政策，或是指導新聞媒體的言論以及審核出版刊物等。

1973（民國 61）年因應國情局勢演變，將第四組改為「文化工作會」，之後工作路線逐漸由「反共」轉移到「反臺獨」，不過由於對文化界的箝制，不但得不到民眾的支持，還被西方民主國家評斷為專制獨裁，之後隨著政治環境改變，文工會的職能便逐漸萎縮。李登輝執政後，有感於國家職能應大於黨，以及當時輿論對國民黨大為不利，因此將新聞指導、電影審查等事宜交由新聞局管理，更在 2000（民國 89）年因應國民黨在總統大選的失利而調整黨務組織與人事，文工會再改為「文化傳播委員會」，並將原本獨立的黨史委員會縮編為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其宣傳職能轉向強調黨史的蒐集與展覽及多面向的溝通。⁴³

第三節 國家宣傳與媒體運用

國家形塑的歷史記憶，並非單純透過官方公開的紀念儀式、物品或文本便能完成記憶的塑造，而是必須透過媒介，故牽涉至宣傳層面。二十世紀以降，新聞業的發展趨於穩定而蓬勃，雜誌、報紙或期刊紛紛成為國家、黨派團體或特定族群傳達意識形態的工具之一。然而上個世紀初，鄉村與城市間的教育程度仍有落差，文字訊息傳遞之效率依地域而異，而影像則直接刺激接受者的感官，其傳達訊息的有效性

⁴³ 袁公瑜，〈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之研究〉（宜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3。

並不亞於文字，於是配合照相機、錄影機提供動靜態影像，使得影像傳播躍升為宣傳手法上的新興利器。

戰爭中，許多的關鍵並非來自軍備、兵力等物質層面，而有更大部分屬於心理層面，必須依賴聯繫、溝通與傳播來完成。⁴⁴如此，必須先探究中國報社、通訊社之起源。

一、新聞通訊社與報社的發展

(一) 中外通訊社與報社的起源

新聞報紙起源甚早，大致可分為「口頭新聞」、「手寫新聞」及「印刷新聞」等三種。⁴⁵中國約於西元前 200 餘年便已有屬於手寫新聞的「邸報」，偏為官府公報性質；後來羅馬帝國亦有類似性質的新聞報紙出現，雙雙脫離史前時代口頭新聞時期。接著經由印刷術的發明，十六至十七世紀初，印刷新聞已逐漸普及，歐陸國家並出現非公報性質的新聞報紙。是以，「新聞」在全球歷史上至少已有上千年的歷史，不過報紙的制度化與「記者」(correspondent)的出現，至十九世紀中才開始。

1835 年，Charles-Louis Havas (1783-1858) 於巴黎成立新聞通訊社，最初以新聞翻譯及廣告代理為主，並以信鴿為傳遞消息的工具。1848 年至 1851 年間，原先在 Havas 旗下工作的員工 Bernhard Wolff (1811-1879) 及 Paul Reuter (1816-1899)，也分別於德國及英國成立

⁴⁴ 方鵬程，《戰爭傳播：一個「傳播者」取向的研究》(臺北市：威秀資訊科技，2007 年 5 月一版)，頁 28。

⁴⁵ 李瞻，《世界新聞史》(臺北市：三民書局，1983 年 2 月增訂七版)，頁 1。

通訊社，至此三間新聞通訊社彼此分庭抗禮，並開始使用電報傳遞訊息，使新聞傳播的效率大幅提高。⁴⁶由於報社必須透過通訊社得知訊息，不僅導致訊息傳遞較慢，同時也可能增加營運成本，於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各家報紙開始有隸屬於自家報社的記者，並派駐各地。到了戰爭期間，這些駐外記者顯得更為重要。其中半島戰爭（Peninsular War, 1808-1814）、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 1853-1856）及南北戰爭（American Civil War, 1861-1865）等戰事，都有記者的足跡。儘管目前學界對於首位職業戰地記者出現的時間仍有爭議，⁴⁷但仍可確定為了盡快傳遞第一手的新聞訊息，當時的新聞社與職業記者的樣貌已與當前相去不遠。

中國的近代報紙起源稍晚，據信第一份中文報刊為《察世俗每月統紀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1833（清道光 13）年首份中國境內的報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出刊，之後的報刊，都是介紹基督宗教為主，輔以各地時事、風土民情與科學新知的宗教性刊物。到了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所主導的《萬國公報》，對於宗教內容有所刪減，並加入時事評論、國際條約

⁴⁶ Havas 成立的通訊社為今法國新聞社（Agence France-Presse）之前身；Reuter 成立之通訊社則為今路透社（Reuters）。參見李瞻，《世界新聞史》（臺北市：三民書局，1983 年 2 月增訂七版），頁 32。

⁴⁷ 關於首位戰地記者，學界多半認為是《泰晤士報》（The Times）於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所派出的記者 William Howard Russell，但趙雪波認為該場戰役英國實際上是派出「記者團」，Russell 只是其中之一；再者，自十八世紀起，歐、美洲的多場革命或戰爭，都已有具備記者身分的人是以文字留下戰事或動亂之過程。當中 Henry Crabb Robinson（1775-1867）便能以他留存下來的日記與信函，證明他曾被派往採訪半島戰爭，作為一名戰地記者，其出現之時間點皆較 Russell 來得早。參見趙雪波，《戰地記者述論》（北京市：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 年 4 月 1 版 1 刷），頁 43-63。

等，甚至還對中國清朝政府提出建言。⁴⁸接著，中國人也開始自行辦報，如清 1873（清同治 12）年第一份自辦報紙《昭文新報》，以及容闈於隔年創辦的《匯報》。

記者方面，太平天國（1851-1872）動盪期間，各報社已開始雇用華人作為蒐集情報的「耳目」。隨著晚清其他國際戰事、國內動亂，華人逐步成為採訪者，如《申報》⁴⁹便曾數度派員前往採訪臺灣牡丹社事件、朝鮮壬午政變及中法戰爭。不過，趙雪波認為，當時中國本土的報紙尚在起步階段，報社亦受到清朝政府嚴格地管控，這些本土的記者是否起到「報導」之作用，仍有可議空間，可能頂多止於具有新聞通訊社之雛型。⁵⁰尤其甲午戰爭後，當時有感於自強運動的失敗及中國在國際地位的衰落，維新派與革命派分別創辦諸多報刊，訴諸主張，被統稱為「政論報」，⁵¹促使當時報紙形式走向政論，新聞採訪便更為零星。

1911（清宣統 3）年的辛亥革命，不但影響中國數千年政府體制的走向，亦是中國報紙發展的轉捩點。湖北革命黨人胡石庵不但於起

⁴⁸ 《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為倫敦佈道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於 1815 年所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則由普魯士的新教傳教士郭士力（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15）創辦；《萬國公報》前身為 1868 年成立的《中國教會新報》，1874 年更名為《萬國公報》之後開始以時事評論與西方知識為主，1895 年甚至發表〈新政策〉一文，對清朝政府提出國家建設相關之建議。參閱：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傳播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年 12 月 1 版 1 刷），頁 44-48。

⁴⁹ 《申報》原名《申江新報》，由英國商人 Ernest Major（1841-1908）於 1872 年所創辦，後經多次易手，並成為全國性的大型商業報紙。1949 年被中共停刊，為中國發行最久的報紙。

⁵⁰ 趙雪波，《戰地記者述論》，頁 73-78。

⁵¹ 李瞻，《世界新聞史》，頁 950-964。

義後四天便成立《大漢報》，並親自採訪戰事，有助於宣傳革命成果。

52

（二）抗戰前後黨、軍系統及民間新聞媒體的開展態勢

民國初期，中國的報紙多達五百多種，然經護法戰爭、軍閥割據、北伐革命、中原大戰等多次動盪而備受摧殘，至 1930 年代以後報業之發展才漸趨穩定。⁵³其中具有國民黨黨營色彩的通訊社與報社在軍政後期至訓政時期相形重要，更是對日抗戰重要的宣傳媒介。

1924(民國 13)年初，國民黨舉行改組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設立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最高黨務機關，轄下設有「中央宣傳部」(以下簡稱「中宣部」)⁵⁴等各部會，由戴季陶擔任首任部長，使得國民黨的宣傳手法與公共關係邁向制度化。⁵⁵4 月 1 日，中宣部在廣州正式成立「中央通訊社」(簡稱「中央社」)，為黨內第一個黨營文化事業，核心目的是報導「正確」的新聞，以完成宣傳任務。⁵⁶由於通訊社採訪

⁵² 趙雪波，《戰地記者述論》，頁 78；陳輝編輯，〈大漢報〉，收錄於「新華網湖北頻道——紀念辛亥武昌首義 100 週年：辛亥文物」：

http://www.hb.xinhuanet.com/zhuanti/2011-03/07/content_22222757.htm (2014 年 07 月 11 日點閱)。

⁵³ 李瞻，《世界新聞史》，頁 966。

⁵⁴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宣傳部成立於 1924 年，初期僅負責國民黨內之宣傳資料，後陸續調整組織工作，逐漸有能力掌握轄下各黨部之宣傳工作，包含 1928 (民國 17) 年 3 月通過〈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組織條例〉，確立宣傳部下轄普通宣傳科、特種宣傳科、國際宣傳科、徵審科、出版科、總務科，附設中央圖書館、中央通訊社及《中央日報》社。同年年底增加指導科，翌年增設新聞科，負責報紙登記與審查。參閱：王凌霄，《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 (1928-1945)》(臺北市：國民黨黨史會出版，1996 年初版)，頁 31-41。

⁵⁵ 郭達鴻，〈中國國民黨公眾關係政策與執行：民國 39 年-民國 78 年〉(臺中市：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頁 57。

⁵⁶ 民國初年，中國的通訊社多半是國外通訊社派駐之分社，往往無法如國民黨所願，精確的報導革命運動。而國內雖有民國五年 (1916) 在北京由邵飄萍創辦的新聞編譯社，以及民國十年 (1921) 胡政之在上海籌辦的國聞通訊社，但其業務範圍僅限

成本較高，因此也導致日後民營通訊社之競爭力不敵黨營的中央通訊社之現象。⁵⁷

中央社同時落實由中國本土的通訊社、報社記者進入戰地採訪。1926（民國 15）年國民政府於廣州成立，中央社受命編發國民政府各部會及國民黨中央黨部之文告或消息；隨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誓師北伐，中央社亦派遣記者隨軍採訪，不但按日發行軍報，凡是攻克一地，也會立即急電回廣州總社，即便翌年 5 月中央社隨國民政府遷往南京，仍持續發布戰訊以及中國共產黨的最新動態。惟戰爭範圍擴大，中央社人力應接不暇，一度改由軍中政治作戰人員派電廣州總社。⁵⁸

北伐完成後，國民政府旋即面對 1928（民國 17）年五三慘案（又稱濟南慘案）、1931（民國 20）年九一八事變及 1932（民國 21）年一二八松滬會戰等日本之武力侵逼，使黨、政單位不得不加強組織業務，以因應宣傳之必要。時中央社由蕭同茲⁵⁹接手，開始實行社長制，並

於地方。參閱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一：中央通訊社》（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2 年 10 月初版），頁 21-23。

⁵⁷ 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 年），頁 18。

⁵⁸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一：中央通訊社》，頁 25-27。

⁵⁹ 蕭同茲（1895-1973），原名異，字同茲，出生湖南常寧，學歷至湖南公立學校機械科畢業。民國十二年（1923）受譚延闓之聘，擔任湖南討賊軍總司令部行政委員，翌年加入中國國民黨；民國十六年（1927）起，陸續擔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部組織科長、中央宣傳部徵集科科長及秘書職務。民國二十一年（1932）起，任職中央通訊社社長，並於對日抗戰期間曾任重慶臨時政府全國新聞聯合會主席。民國三十九年（1950）中央社在臺改組，蕭同茲改任中央社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直至民國五十三年（1964）中央社再次改組方退休。參閱秦孝儀總編，《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分》（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 年 6 月出版），頁 594-595。

提出三項改革方針：(1) 為了成為專業性的新聞事業機構，將社址獨立於中央黨部之外，獨立經營，以便與新聞界和社會各方廣泛接觸；(2) 新聞發表力求正確迅速，且自行決定，不受干涉；(3) 用人唯才，由社內自主。於是底定「工作專業化」、「業務社會化」、「經營企業化」之基礎。⁶⁰中央社在此時的實際運作，除了與英國路透通訊社(Reuters)、美國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法國哈瓦斯通訊社(Agence Havas)及蘇聯塔斯通訊社(Telegraph Agency of the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分別訂定新聞合約，同時增設國內外各分社或辦事處，快速增長採訪數量與範圍，包含1936(民國25)年陳博生以中央社駐東京特派員名義赴日採訪，對於抗戰前的中日關係有詳盡報導。另外，中央社接收外國通訊社在中國的電台設備，也設立專用的新聞電台，到抗戰爆發前，業已完成南京、上海、漢口、北平、天津、西安與香港七大都市的電訊網絡，並持續籌設重慶、成都、廣州、貴陽等城市電台。⁶¹再者，原本較具規模的「國聞通訊社」⁶²、「申時電訊社」⁶³在抗戰爆發前後陸續停辦。中央社又在政府的支持下，原本政府各機關逕行交給

⁶⁰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一：中央通訊社》，頁28。

⁶¹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一：中央通訊社》，頁31-40、42。

⁶² 國聞通訊社由胡政之創於民國十年(1921)，初設於上海，一度於北平等八處擁有分社，後因經營困難，1926(民國15)年遷社天津，改隸屬於《大公報》，1936年再遷回上海。《國聞週報》為其出版之重要刊物，屬於綜合時事性質之週報，每卷五十期，發刊至1937年12月27日止。

⁶³ 申時通訊社起源民國十三年(1924)，由《申報》與《時事新報》編輯部員工編譯各方專電，並拍發給上海數家有關係的報社使用。後因訂稿量大增，民國十七年(1928)擴充資本，另聘職員；民國二十一年(1932)成為《時事新報》、《大晚報》、《大陸報》之外，由張竹平主持的第四社；民國二十三年(1934)組織董事會，在南京、漢口、天津、香港等地設立分社。最後止於抗戰初期。

各大報館刊登之宣傳事項事務，在戰前便已擬定統一交由中央通訊社發布，⁶⁴使中央通訊社蔚為國民政府時期最重要的新聞傳播事業。

由於通訊社服務的對象是報社，其宣傳影響力較為間接，因此 1927（民國 16）年當國民革命軍底定武漢後，便有籌辦黨報之議，不過其創刊過程卻有些波折。先是 3 月 22 日，《中央日報》於漢口出刊，由時任中宣部部長顧孟餘兼任社長，楊綿仲擔任總編輯，不過因正逢寧漢分裂，報社經營困難，僅出版一百五十八號便於 9 月停刊。⁶⁵翌年國民革命軍底定東南，《中央日報》於 2 月 1 日在上海復刊，旋即因黨中央頒布〈設置黨報辦法〉，規定首都設一中心黨報，由中央直接監督指揮，加以上海的《民國日報》⁶⁶早已是上海地方為黨喉舌的報刊，故無增設另一黨報之必要，於是該年 11 月 1 日又停刊。終於，1929（民國 18）年 2 月 1 日在南京出刊，被視為《中央日報》正式出刊，⁶⁷與中央通訊社共同奠定黨報系統的基礎。在此期間，地方上也有宣傳部直接管轄，或由省、市、縣級黨部自行管轄的黨報兩種，數量龐雜。⁶⁸整體而言，以中宣部為核心，配合黨報及通訊社架構為黨政一體的宣傳系統，在戰前幾已完成，⁶⁹此網絡也持續到抗戰結束，發揮

⁶⁴ 〈中國國民黨宣傳工作案（一）〉（1933 年 4 月 11 日至 4 月 18 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14130-0002。

⁶⁵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頁 2-3。

⁶⁶ 《民國日報》於民國五年（1916）在上海創刊，陳其美為總編。時正逢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之際，辦報目的即是反袁、反軍閥。新文化運動期間曾在副刊介紹社會主義及馬克思主義。民國二十一年（1932）因報導標題觸怒日方，最後公共租界工部局迫使停刊。

⁶⁷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頁 3。

⁶⁸ 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頁 19。

⁶⁹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核心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 年 11 月），頁 223。

不小的宣傳功效。

《中央日報》初以中央社稿訊為其新聞版面來源，然而成立初期，南京方興未艾，物資缺乏，廣告亦少，尤其新聞稿件的源頭中央社，在蕭同茲推動改革前，發稿量也不多，導致《中央日報》版面較少，甚至常有稿荒，經營備感艱困。1932（民國 21）年程滄波⁷⁰成為首任社長，一改先前由中宣部部長兼任社長之情形，使《中央日報》業務推動終上軌道。先有社長帶頭勤跑新聞，逐漸擴大報紙篇幅與銷路，並加強報導國際新聞，每週固定有「本報外交記者」之評述，對於搶得新聞先機有重要幫助，至抗戰前已經有近三萬份的發行量。⁷¹

為了新聞採訪業務，勢必要有更多的記者加入。1935（民國 24）年，中央政治學校⁷²經中國國民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決議成立新聞系，先後由程天放、馬星野擔任系主任。⁷³以黨校透過新聞

⁷⁰ 程滄波（1903-1984），原名中行，曾任國民黨多項要職。民國十四年（1925）畢業於復旦大學，一度擔任上海《時事報》主筆，民國十六年（1927）再赴英國倫敦大學修習政治與歷史。民國二十年（1931）回國後，翌年擔任《中央日報》社長兼重慶《世界日報》總主筆，並與蕭同茲等人合資創辦上海《立報》。後返倫敦大學進修，抗戰時期回國，續任《中央日報》社長，之後則陸續擔任香港《星島日報》總主筆、上海《新聞報》社長等新聞業界職位。民國四十年（1951）從香港來臺，轉以任教及專研書法為主。參閱〈世界報系人物——程滄波（1903-1984）〉，「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

http://192.192.155.229/PUBLIC/view_01.php3?main=people%20of%20world%20news&id=346（2015年2月23日點閱）。

⁷¹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頁 4-8、12。

⁷² 中央政治學校為今國立政治大學前身。1927（民國 16）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中央黨務學校，由蔣中正擔任校長，負責軍政時期黨政幹部的教育訓練。1929年改組為中央政治學校，抗戰爆發後隨國民政府遷校至重慶。1946（民國 35）年，與 1944（民國 33）年為訓練三民主義青年團青年幹部的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名國立政治大學。1949年國民政府遷臺，1954（民國 43）年政治大學於臺灣復校。

⁷³ 早期新聞系系主任來源多半來自國民黨、《中央日報》報社及政府官員。參閱：林照真，〈政大新聞走過從前：從「黨意」到「民意」反映時代六十年〉，《中國時報》，

教育，而培養堪用的新聞人才。

除此之外，中宣部在抗戰前也有進一步的組織調整。1936（民國 25）年，成立新聞事業處，負責管理新聞媒介。於是，中宣部與新聞管理有關的單位大致有：宣傳指導處編審科，負責編纂、審查文告及各類宣傳品；新聞事業處指導科，指導並考核黨報、通訊社及一般新聞事業；徵審科，負責徵集與審查各類報紙與通訊社稿件；登記科，負責登記、調查全國新聞事業。⁷⁴夏春祥認為，中宣部統合文化工作體系以後，以黨的角色代替國家機關之工作，並控管民營媒體，顯見黨對國家的掌控已超越政府。再者，中宣部還扮演了輔導、規劃黨營媒體的經營策略與言論方向，有助於統一言論與意識形態宣傳。⁷⁵

雖然 1930 年代以後，中國的報刊受到黨政系統報及新聞制度的壓縮，使報刊發展進入黨國體制的軌道當中，不過上海依舊有不少民間創辦的報刊，呼應了上海作為首個中國近代城市的地位。

上海自元代開始設縣，並因手工棉紡織業的興盛，以及鄰近港口的淤塞等因素，成為對內貿易的樞紐港口。明清時期，上海的商業盛況帶動市鎮的發展，民眾的消費能力亦日趨提升；⁷⁶1843（清道光 23）年上海開埠，為位處最北的通商口岸，又陸續受英、美、法三國開發

臺北市，1995 年 8 月 3 日，版 23；〈系所歷史〉，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認識新聞系」：<http://www.jschool.nccu.edu.tw/index.asp?id=12>（2015 年 2 月 23 日點閱）；〈系所簡介〉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認識新聞系」：<http://www.jschool.nccu.edu.tw/index.asp?id=11>（2015 年 2 月 23 日點閱）。

⁷⁴ 王凌霄，《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頁 31-41。

⁷⁵ 管中祥，〈「國民黨國機器」操控媒介形成的轉變（1924-1999）〉，《傳播文化》第 9 期（臺北市：輔仁大學傳播學院，2002 年 4 月），頁 6。

⁷⁶ 羅蘇文，〈都市文化的商業化與女性社會形象〉，葉文心等著，《上海百年風華》（臺北市：躍昇文化，2001 年 6 月初版），頁 57-67。

租界區。此後外國人不斷地增加，西學亦在此城市廣為傳播，並吸引鄰近省份諸多富紳文人進入，使上海在民國以前，便具有文化及資本主義商業的優勢，尤以租界區最為明顯。⁷⁷1927年以後，國民黨漸有餘力試圖控制上海，冀圖展現中國人有能力管制自己的城市，並進一步設法收回租界區的主權。都市發展上成立上海特別市，曾提出「大上海計畫」，試圖發展公共租界以外的區域；對市民則推動一系列傳統道德的重整運動，並成立公安局以法治方式糾舉紊亂的城市生活。不過國民政府的作法，在娛樂方面的成效不彰，文化產業上更無法阻止左翼份子為中心的電影、出版等事業推動救國運動的企圖。⁷⁸

總而言之，上海儘管設縣、建城較晚，但由於國外勢力的因素，使上海比起其他中國直接管轄的城市束縛較小；再者，地理位置之便，使上海的經濟發展可觀，鄰近地區的人口往來又頻繁，因而減少封閉性，使上海的報業發展相當可觀。⁷⁹在戰前，上海地方的報紙已有《申報》、《大公報》、《大美晚報》、《立報》等報刊，雖彼此辦報宗旨與背後對國家政治的意識形態不盡相同，⁸⁰但大致上已經都統一口徑，走向抗日存亡的論述，也讓國民政府在1937年決心抗日後，不必費太大的心思要求報刊的言論。

⁷⁷ 熊月之，〈開埠初期的西學傳播〉，葉文心等著，《上海百年風華》，頁147-203。
鄭祖安，〈近代城市變遷中的中西面貌〉，頁文新等著，《上海百年風華》，頁215-243。

⁷⁸ 鄭祖安，〈近代城市變遷中的中西面貌〉，頁文新等著，《上海百年風華》，頁243。
魏斐德，〈給娛樂發執照——中國國民黨對上海的管制〉，葉文心等著，《上海百年風華》，頁253-278。

⁷⁹ 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4月2版1刷），頁8。

⁸⁰ 例如《立報》主打抗日救亡之重要性，意圖讓全民背負民族責任，確立「大眾化」的方針。參閱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頁771。

（三）抗戰以後主要新聞報業動態

1937 年抗戰爆發前，《中央日報》便派員隨蔣中正及國民政府要員赴廬山牯嶺召開會議，並首度在該地創辦廬山暑期版，⁸¹當時透過收音機得知蘆溝橋事變消息而立即予以刊登，⁸²不過主要的南京版，則直到中央社透過北平、天津分社發送戰訊後，方於 7 月 9 日刊登蘆溝橋事變的消息，且僅置於報紙第一張的第三版。⁸³實際上，《中央日報》在抗戰最初，與日軍的軍事衝突消息主要皆置於第一張第三版，而第一、二版則分別為廣告以及國民黨為主的訊息。此狀況隨著 7 月底平、津兩地相繼淪陷，《中央日報》又因報訊及紙張不足等因素，自 8 月 6 日起取消第三張，⁸⁴並將戰訊往前編排。隨淞滬會戰開打，戰訊編整任務轉由上海分社負責，並派駐同仁至前線，以電話及信鴿方式傳遞稿件，但 8 月 18 日起，因南京、上海之間交通更為不易，《中央日報》改為僅發行一大張。⁸⁵至於戰訊從刊登蘆溝橋事變以來皆維持在第三版，迄 8 月 29 日起才挪至第二版，也可想見報社對於抗戰更為重視。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其他報社，如《申報》從 8 月 15 日起縮減為一張半、8 月 18 日更減為一張，第一版則以新聞取代廣告，並配合民眾需求發行《申報——臨時夕刊》。⁸⁶

⁸¹ 〈本報發刊廬山暑期版啟示〉，《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7 月 1 日，版 1。

⁸²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頁 8。

⁸³ 〈平郊演習日軍昨晨突然砲擊我軍——蘆溝橋日軍包圍宛平縣城，我軍為正當防衛起而抵抗〉，《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7 月 9 日，版 3。

⁸⁴ 〈本報特別啟示〉，《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8 月 6 日，版 3。

⁸⁵ 〈本報特別啟示（一）〉，《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8 月 13 日，版 3。

⁸⁶ 高郁雅，〈抗日戰爭時期上海《申報》之研究〉，《輔仁歷史學報》第 24 期（臺北

整體而言，抗戰時期《中央日報》等報社，主要著重於「編輯」與「發行」，採訪之任務則落在通訊社的記者身上，尤其黨營的中央社為了配合國家戰時政策，統一言論並加強宣傳，中央社是軍方以外唯一得以深入前線，並可自帶通訊設備，掌握新聞發佈權的通訊社記者。各報社雖然也能透過電報局發拍戰訊，然而電報局並非廣設於各地，迨新聞稿發出後，戰情很可能已有變化，⁸⁷故抗戰時期各報紙所報導之戰況，幾乎都是來自中央社稿，且國民政府明令一般報社報導的內容與中央社有出入者，必須以中央社稿為主。⁸⁸這樣的狀況從抗戰中期的統計資料來看便相當明顯（下頁表 2-2-1）：

表 2-2-1：1940 年重慶主要報紙使用中央社稿比例⁸⁹

各報刊稿數	掃蕩報	大公報	時事新報	新華日報
-------	-----	-----	------	------

縣：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2009 年 12 月），頁 123-124。

⁸⁷ 周海萍，〈隨軍採訪論〉，羊汝德主編，《採訪與報導》（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4 年 4 月初版），頁 30-31。

⁸⁸ 管中祥，〈「國民黨國機器」操控媒介形成的轉變（1924-1999）〉，《傳播文化》第 9 期（臺北市：輔仁大學傳播學院，2002 年 4 月），頁 7。

⁸⁹ 根據馬星野校訂，程其恆編著，《戰時中國報業》（桂林：銘真出版社，1944 年 3 月初版；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 年 8 月影印再版），頁 16 改編製表。

中央社稿與專電	2230	1909	1869	1743
中央社稿數	2151	1840	1841	1547
中央社 特訊專電	79	109	28	196
社稿 占全報比例	96.5%	88%	98.5%	88.7%

而抗戰前期中央社是由各分社依據情形，偶爾派遣記者至第一線，其他各報社派出的戰地記者也不多，幾乎都是間歇性的。賴光臨將戰地記者分為三種：（一）馳騁於兩軍對抗的戰地，或深入敵後的「流動性採訪」；（二）派往國外各盟軍將領總部的「駐外採訪」；（三）派駐戰區「隨軍採訪」。⁹⁰對日抗戰期間的中國戰地記者，即屬於第三種。後來中央社總社於 1938（民國 27）年 10 月武漢會戰後期負責統籌，開始大規模地派遣戰地記者，稱之為「隨軍組」：

所謂「隨軍組」，是由採訪記者一人，以「戰地特派員」名義偕同電務人員一至三人，攜帶小型無線電收發報機所組成，派駐各戰區國軍重要的指揮中心採訪戰訊，每天按時發電向總

⁹⁰ 賴光臨，〈抗戰時期我國戰地記者的角色及其貢獻〉，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1937-1945）》下冊，頁 967。

社報導。分社所派的隨軍組，則與分社聯繫。綜計在抗戰期間，總社與分社先後所派遣的隨軍組，總數在三十個以上。⁹¹

至於通訊社以外的各報社，抗戰時期幾乎長達六、七年都在重慶及西南方立足，使「大後方」的報業相對地蓬勃發展，尤其黨報系統為了強化宣傳更是迅速擴大。「自中央西遷以後，本黨直轄黨報，僅於五處。嗣以新聞宣傳，極關重要，不得不增加單位，以擴大效能，……目前直轄黨報，計有重慶中央日報、成都中央日報、……恩施武漢日報及其漢口分社(黃岡)、西京日報及其南鄭分社、湖南中央日報(安江)、青海民國日報、……共十七處。」⁹²淞滬會戰開打後，南京《中央日報》雖然發行量大增，但為避免受戰火波及，於是一部分續留南京出報，另一部分則西撤長沙；直至年底南京淪陷，《中央日報》才正式由南京與長沙隨政府撤至重慶。另有原先設址於漢口的軍報《掃蕩報》，著重於穩定軍心、鼓舞人民的任務，除了延續抗戰前報導軍務以及國內外各類消息，也適時刊登各界足以振奮人心的信件，成為軍民聯繫的媒體。⁹³而《掃蕩報》也配合國民政府全面抗戰的決定，早就開始將人員與設備分批循長江運往四川，籌備重慶《掃蕩報》事宜。⁹⁴1938(民國27)年6月武漢會戰開打，《掃蕩報》報社始受戰火影響，並

⁹¹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一：中央通訊社》，頁41。

⁹² 〈六全大會中央宣傳部工作報告〉(1945年4月30日)，《會議記錄》，臺北市：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藏，檔號：6.1/36.2。

⁹³ 鄭炯兒，〈從「掃蕩」到「和平」：《掃蕩報》研究(1931—1950)〉，頁61-62。

⁹⁴ 劉詠堯，〈我創辦掃蕩日報的回憶〉，中國文化基金會編，《掃蕩二十年》，頁84。

提前在 10 月 1 日出刊重慶版，12 月 25 日另出桂林版。⁹⁵並在 1940 年《戰時新聞初步統制實施辦法》，與《中央日報》、《大公報》共同被令為黨、政、軍機關報，以促使戰時宣傳統一化、標準化。⁹⁶

值得一提的是，黨、軍系統報均遷至重慶後，淪陷區的新聞工作則並未中斷，有些無法隨政府西遷的報社直到日本完全控制前仍持續經營；而中央社則有編輯、採訪與電務等人員潛伏，以地下電台與總社聯繫，都使得新聞報刊發揮敵後宣傳之功效。例如中央社天津分社在平津會戰結束後，持續作業到 1942（民國 31）年才遭日方查抄。⁹⁷其中上海在抗戰的當下因報刊發行量多，抗日言論亦多，可謂全國抗日的宣傳中心。⁹⁸迨國軍撤守，淞滬會戰結束後，日方曾要求上海工部局（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⁹⁹取締所有反日宣傳活動，並強佔租界區內國民黨中宣部的上海新聞檢查所。¹⁰⁰各國表面上維持中立，

⁹⁵ 鄭炯兒，〈從「掃蕩」到「和平」：《掃蕩報》研究（1931—1950）〉，頁 58-59。

⁹⁶ 〈全曼抗戰（二十二）〉（1940 年），《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3-00055-002。

⁹⁷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一：中央通訊社》，頁 42-43。

⁹⁸ 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頁 821-822。

⁹⁹ 1843（清道光 23）年，英國與中國劃定上海租界，1846（清道光 26）年英國在租界成立「道路頭委員會」（Committee on Roads and Jetties）。隔年起，美國與法國相繼劃分租界區域。為了管理租界，1854（清咸豐 4）年 7 月英法美三國聯合成立「市政委員會」（Municipal Council），不過當時中國並無市政的用法與事實，於是便被中方以較類似的機構，譯為「公局」。由於該單位主要從事建設工作，因此後來才改稱工部局。1863（清同治 6）年，英美在法國退出上海工部局後，合併成立「上海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並仍將工部局訂為最高市政管理機構，日後仍持續扮演中國與上海租界區的聯繫窗口角色。參閱吳志偉，《上海租界研究》（上海市：上海世紀出版，2012 年 9 月 1 版 1 刷），頁 61；戴峰、周明，《淞滬會戰——1937 年中日 813 戰役始末》（臺北市：知兵堂出版，2013 年 5 月初版一刷），頁 276-277。

¹⁰⁰ 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頁 822-823。

但實際上仍經常配合日方的態度，如 1940 年各報曾「受敵方壓迫，檢扣報紙刊載中央文告」，經中宣部駐滬專員斡旋後，改成文告公布三日前，必須透過中宣部拍電到上海，屆期再設法發表。¹⁰¹大致上，上海各報刊社都在 11 月以後陸續停刊或遷往內陸及香港等地繼續發刊，不過與其他淪陷區相同，報刊多半轉往地下發展，如中央社分社持續在上海租界區傳遞訊息，中共及其他黨派團體也將抗日宣傳的重心，移往合法的外商報刊，如《大美晚報》。不過，比起上海淪陷前的報業局勢，此時的抗日宣傳力道很難成氣候，被認為只具有上海地區「抗日宣傳旗幟不倒」的意義。¹⁰²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前後，該地報業已現窘態，人力、物力更加吃緊，但大致上各新聞社仍各有根據地，如《掃蕩報》、《中央日報》及中央社除了以重慶為總社，其中《中央日報》又有邵陽、昆明分社，並陸續在西南方成都、貴陽等地設立地方版；中央社亦廣設桂林、昆明、福州、洛陽等分社。¹⁰³

在重慶的各報自 1939 年(民國 28)5 月 6 日起，開始出版聯合版。推動聯合版的原因大致有四：其一是各社隨著抗戰時間愈來愈長，皆面臨物價抬升而導致印報成本增加之；其二為中央社記者掌握新聞發佈權，各報必須使用中央社稿，導致彼此內容大同小異，於是便有聯

¹⁰¹ 〈中國國民黨宣傳工作案(一)〉(1940 年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18 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14130-0002。

¹⁰² 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頁 827-830。

¹⁰³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一：中央通訊社》，頁 44；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頁 9-10。

合出版報紙的想法；¹⁰⁴其三，國民黨冀求統制報業，擴大宣傳；其四，日軍從前一年年底開始對重慶展開轟炸，導致中央社發報台、《中央日報》設施及其他各報社紛紛遭炸毀，記者也多有死傷，辦報更顯不易。終在「五四大轟炸」¹⁰⁵以後，國民黨中宣部策動組織「重慶各報聯合版委員會」，商議 5 月 5 日各報停刊一天，並推舉《中央日報》社長程滄波為總負責人，《時事新報》經理黃天鵬為經理委員會主任委員，各報總編輯則分別擔任各版編輯工作，¹⁰⁶正式出版各報聯合版。

參加聯合版的報社多達十家，官方、半官方、民營皆有，以黨派立場而言，亦融入國民黨、共產黨、三青團及其他政黨立場不明顯的報社，它們同為相同敵人而合作，被視為創舉。¹⁰⁷然就現實而言，原本辦報理念、基本思想不同的人，在辦報上本來就會面臨困難，甚至也造成猜疑，如《新華日報》被認為是中國共產黨趁勢宣傳，¹⁰⁸但他們則以為聯合版是國民黨企圖藉機併吞各報。¹⁰⁹總之，在無法順利整合之下，聯合版歷經九十九天，於 8 月 12 日出版最後一號，翌日起除了《西南日報》因設備損毀暫緩出刊，其餘各報皆以復刊，使國民黨

¹⁰⁴ 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5 年 12 月初版），頁 21-24。

¹⁰⁵ 對日抗戰 1938 至 1943 年間，日軍對重慶進行戰略轟炸。初期因重慶地形與氣候導致轟炸目標難以掌握，且陸軍的九三式轟炸機（九三式重爆擊機）負重與可飛行里程不足，又缺乏護航戰鬥機，因此成效不彰。1939 年海軍接手轟炸任務，改採九六式轟炸機（九六式陸上攻擊機），5 月 3 日及 4 日自漢口機場起飛，大量使用燃燒彈，導致上千人與上千幢房舍遭毀，中國分別稱之為「五三大轟炸」、「五四大轟炸」。

¹⁰⁶ 劉光炎，〈重慶各報之聯合版〉，李瞻主編，《中國新聞史》（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 9 月初版），頁 417。

¹⁰⁷ 重慶抗戰叢書編輯委員會，《抗戰時期重慶的新聞界》（重慶市：重慶出版社，1995 年 8 月 1 版）。

¹⁰⁸ 劉光炎，〈重慶各報之聯合版〉，李瞻主編，《中國新聞史》，頁 418-419。

¹⁰⁹ 李龍牧，《中國新聞事業史稿》（上海市：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 版 1 刷），頁 253。

在新聞事業方面的宣傳策略失效。不過因空襲仍舊不斷，黨報系統員工被迫依部門分別在不同城區工作，甚至必須躲在防空洞裡發訊辦報。直至 1943（民國 32）年以後，重慶不再被空襲，各報狀況始好轉，例如《中央日報》設立新的辦公大樓，並加強採訪工作，不再完全依賴中央社。¹¹⁰不過由於新聞來源反而轉向國外通訊社，造成國際新聞篇幅比例大為攀升，引起國防最高委員會注意，認為會造成民眾逐漸輕內重外，遂要求各機關注意宣傳重要性並經常與中宣部聯繫，除了工礦交通事業、西北建設與國防機密不得公開之外，其餘政令、政績應隨時在報刊發表，以便對內外之宣傳。¹¹¹另外被視為戰時國民黨最高言論機關的「中央黨報社論委員會」，為了統一宣傳口徑，皆負責撰寫社論，且可免受新聞檢查。其社論經中央通訊社的電台播發後，再由《中央日報》各分社刊登，使得社論在全國往往都是受到矚目的焦點。

112

整體而言，宣傳抗日活動最猛烈的時期，當屬淞滬會戰之間，無論是報刊數量，或是相應的各項資源，以及全面抗戰的新興意識下，都使上海地區向人民傳達抗日決心的最佳根據地。尤其諸多民間報刊在戰前紛紛走向抗日的言論，因此淞滬會戰開打後，對於戰爭的宣傳有過之而無不及。到了重慶時期，該地因長期欠缺新聞事業之資源，

¹¹⁰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一：中央通訊社》，頁 49-50；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頁 10-11、14。

¹¹¹ 〈中國國民黨宣傳工作案（一）〉（1943 年 12 月 10 日至 22 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14130-0002。

¹¹² 管中祥，〈「國民黨國機器」操控媒介形成的轉變（1924-1999）〉，《傳播文化》第 9 期（臺北市：輔仁大學傳播學院，2002 年 4 月），頁 8。

又受到日軍之侵擾，迫使國民黨趁勢推動聯合版，一方面集中資源，二方面又能統一宣傳口徑，不過結果顯然並不成功，更顯見上海在淞滬會戰開打之際，新聞宣傳之重要性。

二、 影像宣傳與歷史記憶

再論影像 (image) 的力量，足以補償文字力量的不足，而達宣傳之效。它有別於圖像，無論手法或是形式，都是真實的紀錄世界。相較之下，圖像即使在寫實主義思潮下出現，終究是一幅畫作。

(一) 攝影影像的起源與發展

「影像」是透過器材而將肉眼所看到的事物捕捉並呈現，其過程稱之為「攝影」(photography)¹¹³。這項技術在短短兩個世紀不到的時間，便成功地在各領域被運用，甚至在近年受到史學領域的重視，是因人們可以藉由影像瞭解過去或喚醒記憶，並提供反思與想像。¹¹⁴而攝影依據使用方式與呈現結果的不同，可分為「靜態」與「動態」攝影，前者即以「照相機」而得出照片，後者則主要指「攝影機」而製成紀錄片、電影、電視等。不過在英文詞彙裡，由於照相機、攝影機

¹¹³ 攝影的英文 photography 一詞源自希臘，photo 是「光」，graphy 則是「描繪」之意，兩者合為「用光線描繪」之意。而中文「攝影」一詞是指「攝取人和事物的光影」，雖與此項技術源頭的詞彙意思不盡相同，但也已傳神地道出其意。參閱甘險峰，《中國新聞攝影史》(北京市：中國攝影出版社，2008年1版1刷)，頁2。

¹¹⁴ Gerry Badger 著，施昶佑、黃一凱譯，《攝影的精神：攝影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新北市：大家出版社，2011年12月初版)，頁8。Val Williams 著，洪人傑譯，《這才是攝影：跨越百年歷史的不朽影像剖析》(臺北市：城邦文化，2012年9月初版)，頁14-15。

最初都是以底片進行紀錄，因此皆以「camera」稱之。¹¹⁵

攝影技術可追溯至西元前四世紀，希臘人注意到光線照到物體後，再透過洞口可在黑暗的房間之牆面上呈現物體的倒影，而孔愈小則倒影映像愈清晰。同樣的現象在中國《墨經》中亦有記載：「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¹¹⁶「景，光之人，煦若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足蔽下光，故成景於上；首蔽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內也。」¹¹⁶這項自然原理經過科學家的解釋與研究，中國與歐洲不約而同地在西元十六至十七世紀發展出「暗箱」（camera obscura），其中在歐陸成為文藝復興後期繪畫「仿真」藝術的工具之一，並經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等人以光學原理逐漸建構照相機的雛型。1826年，法國人 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1765-1833）首度將暗箱的成像映在白蠟版上；隨後 Louis Jacques Mandé Daguerre（1787-1851）與 Niépce 合作，並以「銀版攝影法」（Daguerreotype，又稱「達蓋爾法」）大幅將成像曝光時間從六十至一百小時，縮短為三十分鐘。Daguerre 的攝影技術於 1839 年獲得法國政府收購，並製作出第一台市售相機。

在此之後，攝影方式推陳出新，感光成像時間愈加縮短也更為方便。中國也有鄒伯奇（1819-1869）在十九世紀中葉以木製照相箱搭配

¹¹⁵ 朱則剛，〈照相機與攝影機的種類（Camera Format）〉，收錄於「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2310>（2015年2月14日點閱）。

¹¹⁶ 梨健強，〈暗箱和攝影術在中國的早期歷史〉，郭傑偉（Jeffrey W. Cody）、范德珍（Frances Terpak）編著，葉娃譯，《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國攝影》（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1日出版），頁19。

鏡頭，並成功地以玻璃版攝製人物影像。不過使攝影技術走向全球，最關鍵的即為 1888 年伊斯曼乾版公司（Eastman Dry Plate Company）的柯達照相機（Kodak Camera）¹¹⁷問世，主打相機輕便，為第一代攜帶式相機，且底片（film）感光快、解析度高，一時之間不僅取代了其他攝影技術，至二十世紀中葉以前也保有在全球攝影一半以上的市場佔有率。¹¹⁸

當攝影技術蔚為風潮後，開始出現手杖型、手槍型、鐘錶型等各式各樣的相機，其中「連動攝影」（Chronophotography）¹¹⁹的概念，後來為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 1847-1931）運用，他與助手採用伊斯曼乾版公司所出產的十九釐米（19mm）底片，於 1891 年發明「活動電影放映機」（Kinetoscope，亦被稱「西洋鏡」），以每秒四十六格的速度放映每一張圖像；¹²⁰之後再經改良，轉而使用三十五釐米（35mm）的底片，亦使此規格的底片成為專業電影攝製的標準尺寸

¹¹⁷ 伊斯曼乾版公司（Eastman Dry Plate Company）為 George Eastman（1854-1932）在美國紐約創辦。Eastman 於 1879 年順利量產乾版底片，1881 年正式成立公司，1886 年研發捲式感光底片，同時研發新式照相機，1888 年小型照相機——柯達一號（Kodak No.1）問世，1892 年公司易名為伊斯曼柯達公司（Eastman Kodak Company）。其最著名口號為「你只需要按下快門，剩下的我們來做」（“you press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參閱 “History of Kodak : George Eastman”, Kodak : http://www.kodak.com/ek/US/en/George_Eastman.htm（2015 年 2 月 14 日點閱）。

¹¹⁸ 甘險峰，《中國新聞攝影史》（北京市：中國攝影出版社，2008 年 1 版 1 刷），頁 2。鄭意萱，《攝影藝術簡史》（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10 年 3 月再版），頁 10-12。“History of Kodak : 1878-1929”, Kodak : http://www.kodak.com/ek/US/en/Our_Company/History_of_Kodak/Milestones_-_chronology/1878-1929.htm（2015 年 2 月 14 日點閱）。

¹¹⁹ 連動攝影始於十九世紀中，是由多部攝影器材捕捉一系列身體運動的過程，使之成為多張有連貫性的照片，或是利用快速轉動的方式，透過視覺暫留之特性，達到動態圖像的效果。參閱鄭意萱，《攝影藝術簡史》，頁 12。

¹²⁰ David Robinson, *From Peepshow to Palace: The Birth of American Fil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9-31.

而沿用至今。¹²¹1895年，法國盧米埃兄弟（Auguste Marie Louis Nicolas Lumière，1862-1954、Louis Jean Lumière，1864-1948）再改進愛迪生發明的器材，成為更為輕便，易於帶出戶外使用的「活動電影機」（Cinematograph）。1923年，又有十六釐米（16mm）電影底片問世，由於設備輕便，底片及沖印費用都相當低廉，相當受業餘電影家的歡迎，除了用於預算較低的電影劇情片與前衛電影，更重要的是廣泛運用於後來的新聞影片、紀錄片及教育性質影片之攝製。¹²²

從十九世紀以降至二十世紀初攝影技術之發展可知電影技術乃奠基於照相技術而來，二者表現型態固然不同，但都是以底片為獵取成像的來源。而電影每個畫格都可單獨擷取，成為獨立的照片。故可推論二十世紀以降，乃至於抗戰時期，中國的新聞、戰爭影像來源大致有三：由相機所拍攝的單張照片，或有十六釐米攝影機拍攝的紀錄短片或抽出而成的照片，以及三十五釐米底片所拍攝的電影。

（二）中國與臺灣的攝影發展與抗戰前的攝影工作

相機與攝影機問世後便很快地傳往中國，外國軍方、政府單位的攝影師以及傳教士紛紛以香港、廣州、上海等沿海城市為據點，在中

¹²¹ 三十五毫米的底片稱為標準規格底片（standard gauge），每個畫格有四個排孔，每呎有十六畫格。參閱〈35 釐米底片（35mm）〉，收錄於「藝術與建築索引典」：<http://aat.teldap.tw/AATFullDisplay/300263816>（2015年3月1日點閱）；〈生態攝影學數位典藏計畫介紹〉，收錄於「元智電子報——產學焦點」http://web2.yzu.edu.tw/e_news/674/10_new01.html（2015年3月1日點閱）。

¹²² 十六釐米底片又可分為無聲及有聲電影兩種：前者畫格雙邊都有排孔；後者排孔只有單邊，另一邊則作為音軌使用。參閱〈16 釐米底片（16mm）〉，收錄於「藝術與建築索引典」：<http://aat.teldap.tw/AATFullDisplay/300263815>（2015年3月1日點閱）；〈生態攝影學數位典藏計畫介紹〉，收錄於「元智電子報——產學焦點」：http://web2.yzu.edu.tw/e_news/674/10_new01.html（2015年3月1日點閱）。

國留下攝影紀錄，並往往將照片帶回歐美販售。隨後，約於清同治年間（1862-1874）中國也有了本土攝影師，在往後的數十年逐漸將攝影技術發展出中西方文化融合的特色。¹²³

大致而言，二十世紀以前以「中國」為主體的照片，多以中國的民俗文化、風景、建築、人物以及外國僑民的生活為主，並因此塑造了「中國形象」，¹²⁴從今日看來，這些紀實攝影作品也起了對外國人「宣傳」中國之作用。其中戰地新聞攝影在英法聯軍之役（1856-1860，又稱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便已從 Felice Beato（1832-1909）等人開始，可惜當時相機笨重，同時底片感光度低而無法拍攝移動的目標，加上沖印設備等物資也相當缺乏，故當今鮮少流傳當時隨軍攝影師所拍下的作品，但仍展露征服者的心態，並藉此娛樂國外大眾。後來《點石齋畫報》¹²⁵出現，雖然尚未結合照片，但以圖畫為主，介紹中外新聞時事，仍開啟中國的圖畫時代。¹²⁶在往後庚子事變（1900，又稱義和團運動）、日俄戰爭（1904）、辛亥革命（1911）、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等重大政治事件或戰爭，中國的報刊雜誌都普遍地刊登暴力血腥的照片，藉由戰爭攝影所留下、刊登的影像，激發中國人救

¹²³ 梨健強，〈暗箱和攝影術在中國的早期歷史〉；郭傑偉、范德珍，〈洋鏡頭裡：晚清攝影的藝術與科學〉，郭傑偉（Jeffrey W. Cody）、范德珍（Frances Terpak）編著，葉娃譯，《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國攝影》，頁 20-27；郭傑偉、范德珍，〈洋鏡頭裡：晚清攝影的藝術與科學〉，郭傑偉（Jeffrey W. Cody）、范德珍（Frances Terpak）編著，葉娃譯，《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國攝影》，頁 33-62。

¹²⁴ 郭傑偉、范德珍，〈洋鏡頭裡：晚清攝影的藝術與科學〉，郭傑偉（Jeffrey W. Cody）、范德珍（Frances Terpak）編著，葉娃譯，《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國攝影》，頁 52-54。

¹²⁵ 《點石齋畫報》由《申報》館申昌畫室發售、點石齋石印書局印刷，於 1884 年至 1898 年間出刊，為中國第一份新聞畫報。

¹²⁶ 郭傑偉（Jeffrey W. Cody）、范德珍（Frances Terpak）編著，葉娃譯，《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國攝影》，頁 47。

亡圖存的意識，推動了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¹²⁷

進入民國以後，國民黨中宣部除了分別成立中央通訊社及《中央日報》，1933（民國 22）年 10 月又特別設立「國際新聞攝影社」（簡稱「國際社」），首任社長為黃英，主要任務是負責拍攝政界重要人物及與國家密切相關之活動。¹²⁸並明示凡全國各省市舉辦軍事、政治、教育、生產建設等事業，具有偉大之意義，足資宣傳紀念者，經通知便會派國際社攝影人員前往取景。¹²⁹而中央社在對日抗戰前原先設有編輯、採訪、英文編輯、徵集、電務與事務共六個部門；國民政府遷至武漢後，1938（民國 27）年 5 月，中宣部裁撤國際社，中央社也將徵集部縮編為徵集室，並接收國際社的照片資料，進一步增設攝影部，與後來再增設的編譯部，成為到抗戰結束前中央社的七個部門之一。¹³⁰且將攝影獨立為部門，亦顯見對於影像的重視。

電影與紀錄片方面，約在 1896（清光緒 22、日明治 29）年，便已有歐美人士在香港與上海，以及日本人在臺北放映電影的紀錄，當時中國人稱之為「西洋影戲」，並於隔年首度在上海嘗試電影放映的商業化運作。1903（清光緒 29、日明治 36）年中國有商人林祝三，臺灣有廖煌，皆自行從海外帶回放映機與影片並放映，為華人在本土自行

¹²⁷ 巫鴻，〈序：解讀早期中國攝影〉，郭傑偉（Jeffrey W. Cody）、范德珍（Frances Terpak）編著，葉娃譯，《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國攝影》，頁 15；胡素馨，〈以中國人為主題：19 世紀的攝影體裁〉，郭傑偉（Jeffrey W. Cody）、范德珍（Frances Terpak）編著，葉娃譯，《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國攝影》，頁 103。

¹²⁸ 甘險峰，《中國新聞攝影史》，頁 38。

¹²⁹ 〈中國國民黨宣傳工作案（一）〉（1934 年 12 月 21 日至 1935 年 1 月 9 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14130-0002。

¹³⁰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一：中央通訊社》，頁 44。

放映電影的開端。¹³¹中國上海、香港等重要城市的動態影像也藉由西方人之手而留下，且同靜態攝影，這些西方攝影師紛紛拍下庚子事變，作為他們瞭解中國的元素之一。臺灣的紀錄片之首，為高松豐次郎（1872-1952）拍攝的《臺灣實況紹介》，紀錄當時的臺北、基隆港、鐵路旅行及日軍討伐原住民過程等臺灣風俗民情。¹³²

此後兩岸的電影事業都開始興盛，不但有設有電影館，也紛紛拍攝影片。同時上海商務印書館及 1919（民國 8）年成立的中國影片製造有限公司，陸續體認到電影、紀錄片對於宣傳與教育的作用，分別記錄新文化運動、五九國恥等時事紀錄片。¹³³國民黨也開官方電影宣

¹³¹ 民國八十九年(2000)，美國華裔女導演胡安，執導電影《西洋鏡》(Shadow Magic)，即是以清朝末年電影傳入中國的概況為背景。參閱魏時煜，《東西方電影》(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頁21-27。

¹³² 高松豐次郎，日本福島縣人，早年在紡織廠工作因故而斷臂，卻因法律不周全而僅獲得微薄的慰問金，故辭去工作，立志鑽研法律以改善勞工生活。1897（日明治30）年自明治法律學校（今明治大學）畢業，以單口相聲與說書的方式向勞工演講。1900（明治33）年以後，因政府頒布對資本家有利的《治安警察法》，使勞工運動陷入困境，於是改用不受該法限制的電影放映手法對勞工宣講，被視為日本社會啟蒙電影的先驅。1901（日明治34）年據說受伊藤博文之請，曾來臺放映電影以宣撫民眾，並因在以電影宣傳勞工運動的方式受到注意，於是1903（日明治36）至1904（日明治37）年間又受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邀請來臺。1907（明治40）年佐久間左馬太任總督期間，受總督府委託投入《臺灣實況紹介》的攝製工作，目的是參加日本東京博覽會。全片使用共兩萬呎的底片，兩百零六個分鏡，有交通建設、風土民情、教化成果等共一百二十項事物，包含臺北二十項、蕃界五項、日本當局討發生蕃與蕃人的狀態十九巷、鐵路旅行與地方漫遊六十七項、基隆港與金山九項。高松豐次郎在攝製此紀錄片後，便一直留在臺灣並經營八家電影館，直到1918（日大正7）年才回到日本。參閱石婉舜，〈高松豐次郎與臺灣現代劇場的揭幕〉，《戲劇研究》第10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戲劇研究編輯委員會，2012年7月），頁35-41；〈臺灣人物小傳——高松豐次郎（1872-1952）〉，收錄於「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臺灣人物誌（1895-1945）」：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toolbox_figure_detail.hpg&project_id=twpeop&dtd_id=15&subject_name=%E8%87%BA%E7%81%A3%E4%BA%BA%E7%89%A9%E8%AA%8C%281895-1945%29&subject_url=toolbox_figure.hpg&xml_id=0000294319&who=%E9%AB%98%E6%9D%BE%E8%B1%90%E6%AC%A1%E9%83%8E（2015年3月2日點閱）。

¹³³ 高維進，《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北京市：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3

傳風氣，¹³⁴透過香港民新影片有限公司的創辦人黎民偉與其他民間電影公司，以孫中山為中心，紀錄國民黨在廣州的諸多活動及國民革命軍的北伐過程，並在各地播放。至 1927（民國 16）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改組為止，相關紀錄片已有十多部，顯見國民黨當時亟於以孫中山作為宣傳與號召。¹³⁵

1930 年代以後的動態影像，在世界各國都成為政治動員與宣傳的工具，¹³⁶中日雙方也不例外。九一八事變後，臺灣隨著日本本土政策，進入了備戰時期，總督府進行文化控制，電影作品多以日本愛國事蹟為主，¹³⁷臺灣製片工業陷入停滯，多是透過官方與日本人穩定的電影配給，輸出到臺灣放映。¹³⁸同一時間，中國左翼電影工作者因應輿論，拍攝抗日相關紀錄片，例如《上海之戰》紀錄一二八淞滬會戰，上海閘北地區遭日本轟炸後的慘況。¹³⁹國軍在東北、華北地區的軍事行動也紛紛成為紀錄片的素材，國民黨亦於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推動下，以黨的力量積極推進電影宣傳，¹⁴⁰除了前述中宣部國際社也有攝製紀錄

年 2 月 1 版 1 刷)，頁 9-12。

¹³⁴ 陳佑慎，〈抗戰時期的國軍電影事業〉，《國史館館刊》第 34 期（臺北市：國史館，2012 年 12 月），頁 75。

¹³⁵ 高維進，《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頁 14。

¹³⁶ 李道明，《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臺北市：三民書局，2013 年 9 月初版一刷），頁 5。

¹³⁷ 魏時煜，《東西方電影》，頁 284。

¹³⁸ 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臺北縣：視覺傳播藝術學會，1997 年 10 月初版），頁 39-50。

¹³⁹ 高維進，《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頁 21-23。

¹⁴⁰ 「改進宣傳方案（中央執行委員會提）」（1931 年 11 月 10 日），〈第二次臨時全體會議重要決議案：（一）黨務〉，《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時期》，收錄於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七十九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頁 247。

影片之業務外，1933（民國 22）年，蔣中正也曾命陳果夫與賀衷寒籌備電影事業。¹⁴¹同年，國民政府成立第一個國營電影單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政治訓練處電影股」，負責該單位者正是賀衷寒，主要拍攝剿共短片並放映電影，旗下有設計組、編審組、中央電影攝影場與前述的國際攝影新聞社。¹⁴²1934 年，電影股首拍反共劇情片《光明》，並在各部隊與城鎮巡迴放映。¹⁴³1935（民國 24）年南昌行營撤銷，電影股改隸於湘鄂贛剿匪總部政治訓練處，並藉此遷廠武昌，擴充設備及片廠，更名「武漢電影製片廠」。1937 年再隨國民政府遷往重慶，由國防部管轄，定名「中國電影製片廠」，¹⁴⁴成為對日抗戰期間，中國最重要的電影製片單位。

高維進指出，1931 年以降的紀錄片已經更為成熟，不再侷限於某一項人、事、物，而是以更為多元的材料攝製為綜合性的影片，並且會以「重拍」、「搬演」的方式，試圖重現戰事，顯見當時對於紀錄片的要求，已有講求劇情與氣氛的電影美學觀念。¹⁴⁵

¹⁴¹ 陳果夫的 CC 系此後一路主導電影事業至 1950 年，而賀衷寒所代表的軍隊政工系統，則較經波折而不如陳果夫一系。參閱「蔣中正致陳果夫、賀衷寒電」（1933 年 5 月 27 日），〈籌筆——統一時期（八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0084-049。陳佑慎，〈抗戰時期的國軍電影事業〉，《國史館館刊》第 34 期（臺北市：國史館，2012 年 12 月），頁 75。

¹⁴² 楊燕、徐成兵著，《民國時期官營電影發展史》（北京市：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 年 2 月 1 版 1 刷），頁 36-48。

¹⁴³ 陳佑慎，〈抗戰時期的國軍電影事業〉，《國史館館刊》第 34 期（臺北市：國史館，2012 年 12 月），頁 79。

¹⁴⁴ 參閱：〈臺灣電影 50 年（三）〉，收錄於「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archive/392904.htm>（2014 年 12 月 30 日點閱）；唐明珠，〈中國電影製片廠〉，收錄於「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nrch.cca.gov.tw/twpedia.php?id=20926>（2014 年 12 月 30 日點閱）。

¹⁴⁵ 高維進，《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頁 27-28。

抗戰開打後，中國電影製片廠自然而然都是拍攝抗日相關的電影與紀錄片，主要的作品有《電影新聞》，以個別的新聞影像體現，而《抗戰特輯》則是針對抗戰階段重要會戰或戰役進行編製。整體而言，抗戰時期電影持續被視為國家宣傳的利器，時人也呼籲各電影公司應抽調人力至前線攝影，並闡述日軍之殘暴與國軍將士之忠勇，以有效地在國內與國際上達到宣傳之效。¹⁴⁶到了重慶時期，軍事委員會有權提供戰地記者證與軍用證明書，獲得授權的記者得以在公開集會拍攝任何與軍事、政治、經濟或建設相關的照片，並公開於國外報刊雜誌。¹⁴⁷

同時，中宣部也提供抗戰相關照片予國外通訊社，內容除了各戰線的國軍狀況與黨、政、軍要員的動態，並涉及敵後游擊兵與童軍，甚至抗戰時期平民的教育、各類儀式與生產活動的比例也不少。從近年被整理的攝影集，能發現當時的照片不會有任何敵軍出現於畫面中，且除了移防、佈署過程之外，大多拍攝下的人物及其動作，都是利用戰鬥空檔，重新演示而拍下。¹⁴⁸當然，這個現象並非中國獨有，交戰方日本所留下的影像，特色也一模一樣。即便歐美國家在第二次戰爭期間，攝錄影像的方式亦同，例如美軍於太平洋戰爭（Pacific War，1941-1945）的硫磺島之役（Battle of Iwo Jima），美軍於折鉢山（Mount Suribachi）豎起美國國旗的著名照片，並非攻佔山頭的那一刻便拍下，而是為了替換更大幅的國旗，才讓美聯社記者 Joe Rosenthal

¹⁴⁶ 陸銘之，〈戰時電影的準備〉，《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7月31日，版9。

¹⁴⁷ 唐與羣，〈從事攝影工作的回憶〉，《傳記文學》第19卷第3期，總113號（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9月），頁68。

¹⁴⁸ 參閱秦風老照片館編，《抗戰中國國際通訊照片》（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1版1刷）。

(1911-2006) 有機會攝影。¹⁴⁹經由重新演示的影像，對國家而言，顯然更能達到對國內外宣傳效果。當時在硫磺島豎起國旗的其中三名士兵，便被徵召回國販賣軍事債券，而約有三百五十萬張戰爭債券印刷宣傳品使用這張照片，¹⁵⁰顯然成為重要的宣傳象徵。

是以，當國家意識到影像的重要性時，透過不同機構或黨營、國營媒體的影像宣傳工作變顯得更為重要。無論中外同樣如此，中國抗戰期間更是需要影像，不僅有助於提升中國在國際上的受關注程度，也能對內尋求愛國意識與國家認同。

¹⁴⁹ James Bradley, *Flags of Our Fathers* (New York: Bantam Books, 2001), pp. 205-207.

¹⁵⁰ Mitchell Landsberg, "Fifty Years Later, Iwo Jima Photographer Fights His Own Battle", archived from Associated Press : <http://web.archive.org/web/20040412081346/http://www.ap.org/pages/about/pulitzer/rosethal.html> (2015 年 4 月 10 日點閱)。

第三章 淞滬會戰的集體記憶形塑

第一節 淞滬會戰背景與經過

淞滬會戰為中國對日抗戰前期的代表性會戰。其名「淞滬」是以戰事爆發之地點而來：「淞」指吳淞，位於吳淞江、黃浦江匯流之口，有吳淞要塞，是長江第一門戶；「滬」則為上海市之簡稱。而為了區別1932（民國21）年同樣於上海爆發的淞滬會戰，遂以時間區分，1932年的會戰稱為「一二八淞滬會戰」（或稱「一二八事變」）；1937年的淞滬會戰則稱「八一三淞滬會戰」，但仍可視「八一三」為「一二八」之延續。

一二八淞滬會戰時，日本由租界北區向閘北區進攻，與國軍第十九路軍鏖戰一個多月後，經歐美各國調停，中日雙方才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亦稱〈上海停戰協定〉），內容規範國軍暫留現駐防地，日本軍隊則在協定生效後一星期內開始退回租界北區、東區以及虹口方面越界築路¹地帶，限時四週；撤退後由中國特別警察隊接管該區域，交戰區吳淞等地則劃為非武裝區，並設有英、美、法、義及中、日等國各派文武官員一名組成十二人的共同委員會負責監視。²然而，日軍在駐軍之處將原先的上海陸戰隊升格為「上海海軍特別陸戰隊」，成為正式駐紮中國的常設武力軍隊，另以楊樹浦公大紗廠、滬西豐田紗廠設

¹ 越界築路係指公共租界外修築之道路，並由租界國家取得一定程度的管轄權，可謂「準租界」。上海越界築路始於十九世紀中葉，越界築路逐漸被併入租界後，又陸續在外圍地區越界築路，直至1925（民國14）年五卅慘案後才停止越界築路。

²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續編（一）》（臺北市：中國國民黨黨史委員會，1981年9月初版），頁539-542。

為軍事據點，形成作戰兩翼。租界內的日僑商民區，所有的建築都必須構築掩體，至蘆溝橋事變前，已經設有八十多個軍事設備，與三千多名的陸戰隊兵力。³日軍在上海的一切軍事行為，皆是為東北地區成立「滿州國」以外，為入侵中國開拓第二條戰線，冀圖將上海匯山碼頭一帶設為登陸的首要位置。⁴

1937(民國 26)年蘆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在華北之作戰勢如破竹，國民政府雖曾藉義、英等國的外交調停冀求和平，然而日軍為了不擴大戰事，希望速戰速決，在南抵河北省保定市之際，就要讓中國被迫談和，⁵因此仍不斷增兵華北，總兵力從蘆溝橋事變前的五萬六千名，⁶至 8 月初已達數十萬。在華北受到日軍侵略的同時，華中與華南亦動盪不安，民眾反日情緒高張。實際上，蔣中正在一二八淞滬會戰後，便因應日軍在滬的動向，主張國軍應特別提防吳淞一帶之日軍。⁷國民政府在 1935 (民國 24) 年，完成河南北部到徐州、海州及京、滬、杭一帶的防衛計畫，京滬杭又分為南京、滬杭與京滬三區。⁸其中京滬的負責人張治中擬定《上海圍攻計畫》，修築蘇州到福山的「吳福線」，無錫到江陰的「錫澄線」與嘉興到乍浦的「乍嘉線」等工事；同時接

³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臺北市：麥田出版，1997 年 9 月初版一刷)，頁 38。

⁴ 張其昀主編，《抗日戰史》(臺北市：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出版，1966 年 6 月出版)，頁 49。

⁵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初期陸軍作戰(一)——從蘆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 年 6 月出版)，頁 312。

⁶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初期陸軍作戰(一)——從蘆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 188。

⁷ 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 年 10 月出版)，頁 445。

⁸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頁 38。

受國外軍事顧問之建議，避免日軍利用中國境內租界區作為軍事據點，遂採取第三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師協同空軍先發制人的作戰計畫。⁹ 國軍在會戰開打前，於上海之軍力包含淞滬警備總司令部下轄之上海市保安總團、上海市保衛團及上海市公安總隊；¹⁰另於對日抗戰爆發後，派遣第二師補充旅移防蘇州（抵達蘇州後改稱獨立第二十旅），又將該旅其中兩團分別偽裝為上海保安總團第三團及憲兵第十三團進入上海。¹¹相較之下，日軍為了盡速將勢力推進到黃河以北的區域，忽略了上海的兵源問題，雖然駐上海的日軍第三艦隊早已發現國民政府早就開始違反〈淞滬停戰協定〉，不斷派駐兵力進入非武裝區，且進行空中偵察任務，然而日本政府基於不擴大戰爭的方針仍採保留態度，僅先行撤離上海的日本僑民。¹²

讓局勢急轉直下的事件乃「虹橋機場事件」（日方稱「大山事件」）。8月9日傍晚，日本海軍特別陸戰隊大山勇夫中尉乘坐汽車行經虹橋機場附近時，駕駛及大山勇夫皆遭中國保安隊射殺，當晚上海市長俞鴻鈞隨即赴日本駐滬領事館向總領事岡本季正說明原委，並在雙方磋商下同意透過外交方式以謀圓滿解決，避免衝突擴大。¹³翌日中國以

⁹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頁40。

¹⁰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13）·淞滬會戰（一）》（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再版），頁59。

¹¹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13）·淞滬會戰（一）》，頁7。

¹²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初期陸軍作戰（一）——從蘆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65。

¹³ 〈滬虹橋機場之誤會〉，《國聞週報》第14卷第32期（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年8月4日至8月10日），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85年12月影印出版），頁6520-6521。

上海市府、警備總司令部、警察局為代表，日本則有領事館、陸戰隊司令部及隨行記者，夥同上海工部局立即進行調查，但中日雙方仍彼此指責：中方認為兩人正在從事偵察任務，因不成而逃逸，並開槍射殺一名國軍，故駐軍還擊；日本則堅稱兩人在和無預警之下遭槍殺身亡，並在 11 日要求中國拆除防禦工事及撤離保安隊。日本海軍司令更重新佈署兵力，軍艦二十餘艘護送運輸艦五艘向上海駛近，第一、第三艦隊共三十餘艘集中於吳淞一帶，又動員上海陸戰隊等部隊約萬人。¹⁴戰事一觸即發。

8 月 12 日，曾參與一二八淞滬會戰的張治中率領國軍第五軍第八十七、八十八師¹⁵進入上海，且立即請示蔣中正於翌日拂曉發動攻擊，不過基於英、法、義等國正居中調解，加以部隊方抵達半日，其他軍力亦於運輸途中，故未得同意。¹⁶日本方面，13 日基於上海情勢的變化，決議派遣陸軍部隊進駐上海，佔領八字橋持志大學、五洲公墓、八字橋與寶山橋等要點，¹⁷同時上海海軍司令動員四千餘海軍陸戰隊士兵登陸，以租界東區與北區為據點，於下午六時開始攻擊閘北的國軍。國軍第八十八師以掃蕩日軍在上海之根據地為目的，予以還擊，¹⁸八一三淞滬會戰正式爆發。

¹⁴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市：黎明文化，2011 年 4 月修訂一版二刷），頁 44-45。

¹⁵ 八十七、八十八師前身為國民政府中央警衛軍第一、二師，民國二十四年（1935）起，因受德式編制與裝備，故與三十六師一同被稱為「德式師」。

¹⁶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南京市：鳳凰出版傳媒，2005 年 1 版），頁 341。

¹⁷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頁 45。

¹⁸ 張其昀編，《抗日戰史》，頁 50。

德籍顧問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1878-1966）曾建議國軍進行有效的戰術運用，於是 8 月 20 日，上海戰場在內的江蘇南部與浙江被劃為第三戰區¹⁹，採取第九、第十集團軍分別擔綱右翼與左翼作戰，其中第九集團軍由張治中為總司令，負責閩北區到蘇州河一帶，並再將全軍分為右翼、左翼與中央軍。²⁰透過戰略佈局，儘管會戰開打的隔天，第八十八師旅長黃梅興便於指揮攻擊持志大學時，遭迫擊砲擊身死亡，成為對日抗戰首位陣亡之將官，但大致上，會戰初期國軍居於上風，陸續奪回持志大學、滬西豐田紗廠等據點，甚至在 8 月 22 日推進到虬江碼頭，幾乎切斷日本的佔領區。

空軍方面最初也有斬獲，最著名的即為「八一四空戰」，乃淞滬會戰中日雙方第一次空中作戰。8 月 13 日，空軍第四大隊大隊長高志航接獲指令，飛抵杭州笕橋待命。8 月 14 日凌晨，雙方在空中展開作戰，中國空軍擊落六架日機，堪稱戰果豐碩。²¹中國空軍一早飛往上海，轟炸匯山碼頭、瀏河鎮²²一帶的裝甲巡洋艦「出雲號」等日艦，又成功空襲公大紗廠與陸戰隊司令部。²³此後空軍持續在京滬杭地區，對

¹⁹ 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對於國軍戰鬥序列有所安排，蔣中正為陸海空軍最高統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另一共編五個戰區，其中河北北部至山東北部的第一戰區，以及山東南部至江蘇北部的第五戰區由蔣中正兼任總司令；第二戰區為山西、察哈爾與綏遠，總司令為閻錫山，第三戰區乃江蘇與浙江，初期司令長官馮玉祥，淞滬會戰開打後，8 月 20 日改由兼中正兼任；何應欽則負責閩粵的第四戰區。

²⁰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編輯委員會編輯，《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二編，作戰經過（二）》（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年 9 月初版），頁 181-188。

²¹ 張光明，《中華民國空軍老兵——張光明抗日空戰拾粹》（臺北市：財團法人大鵬文教基金會，2012 年 11 月出版），頁 35-37。

²² 瀏河鎮隸屬江蘇省太倉市，鄰近上海寶山區、嘉定區，位於婁江（瀏河）出海口。

²³ 張其昀編，《抗日戰史》，頁 50。

地支援或於空中作戰。

23日起，日本由第三師團、第十一師團組成的上海派遣軍登陸並進行反擊，²⁴之後雙方不斷地抽調部隊投入戰場，但戰局受限於當地地形，彼此沿著海岸線陷入膠著，日軍與國軍大略分據吳淞江北側及南側。國軍在9月上旬以前，傾向於適當時機退守國防戰線，並未採取死守並抽調精銳部隊之態。²⁵而從9月17日開始，國軍戰術正式改採守勢，退至北站、江灣、廟行、羅店，雙萍敦之線，²⁶並開始徵調兵力，戰前的各地「地方軍」也前來支援，顯見蔣中正有意為了「決戰」而投入多達二十一個整編師。²⁷

投入淞滬戰場的國軍戰力雖優，但面對不斷衝鋒進攻的日軍，依舊處於挨打的局面。空軍方面，由於9月初日本在上海興建機場，並同時使用公大紗廠一帶海軍陸戰隊建築的臨時機場，不但對國軍陸上不對造成空中威脅，也因此讓中國空軍即使有一定的戰果，但面對日本航空母艦及戰機紛紛投入增援，本身的消耗也愈來愈多。²⁸9月下旬，國軍撤退至廣福、蘊藻濱一線。國軍深知該地若失守，則日軍將強渡大場而進入上海市區，於是雙方在沿線展開據點的爭奪戰。²⁹

²⁴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對華作戰紀要叢書（1）：初期陸軍作戰（一）——從蘆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頁377-385、392-398。

²⁵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頁86-87。

²⁶ 張其昀編，《抗日戰史》，頁51。

²⁷ 蔣中正在1936年訂定《整軍計畫》，將每年分為兩期，每期整編十個師，意圖在三至四年之間擴充國軍到六十個師而投入對日戰爭。因此在抗戰爆發時，國軍整編師已達三十個，每個師有一萬七千餘人，軍備亦相當完整。淞滬會戰便動用了其中二十一個師。參閱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頁92。

²⁸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藍天碧血揚國威——中國空軍抗戰史料》（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9月1版1刷），頁17。

²⁹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頁99。

迨 10 月 25 日大場陣線失守，閘北區、江灣鎮與廟行鎮一帶的國軍等同被包圍，迫使國軍調整戰線，將主力轉向蘇州河南岸的虹橋鎮、小南翔之線，僅留一師之兵力死守閘北，以全力防衛上海西郊。時第三戰區副司令官顧祝同受命要求第九集團軍，第八十八師留守，經第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以及參謀長張柏亭斡旋，最後以第五二四團第一營為主幹，組成四百餘人之加強營，並以原來位於蘇州河（吳淞江）北岸³⁰的師部四行倉庫³¹為據點。³²四行倉庫保衛戰為期四日餘，後因掩護任務已完成，同時蘇州河彼岸的英方為了避免受波及，經協商後該營退入租界。

11 月 5 日，日軍再度集結，從杭州灣北岸的金山衛進攻，國軍雖令第六十二師、第七十九師、第十一預備師及獨立四十五旅趕往迎擊，但尚未整集完畢，日軍便已順利登陸，並再度威脅上海戰線國軍的側背。11 月 8 日，國軍最終決議全面撤離上海。11 月 12 日，國軍左右翼主力均已西撤，³³上海淪陷，淞滬會戰至此結束。雙方傷亡人數約二十五萬，其中 60% 屬於國軍的精銳部隊；³⁴空軍在戰前原有九個大

³⁰ 吳淞江流經上海市區之河段，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慣稱蘇州河，但此名僅限於上海市民所稱，官方地圖仍以吳淞江為主。

³¹ 四行倉庫位於上海市閘北區，蘇州河北岸，與英國勢力為主的公共租界中區對河相望；東邊則鄰近日本佔據優勢的公共租界北區。今日地址為上海市閘北區光復路 1 號。倉庫乃兩棟六層樓之鋼筋混泥土建築，建於 1931（民國 20）年，屬於大陸、金城、中南與鹽業等四家銀行的信託倉庫，故稱「四行」，建築體同時也是當時閘北區最高、最大之建築物。參閱虞任遠編，《八百壯士畫史》（臺北市：惠文出版社，1976 年 7 月出版），頁 10。

³²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二）》（江蘇省：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年出版），頁 190-192。張其昀編，《抗日戰史》，頁 52。

³³ 張其昀編，《抗日戰史》，頁 52。

³⁴ Jonathan D. Spence 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中）》（臺北市：時報出版，

隊，共三百一十四架飛機，在會戰中後期也損失慘重，迫使主力西移。

³⁵陸空軍人力、物力之虧損，使國軍在往後之作戰更為艱辛。

第二節 淞滬會戰的新聞宣傳

淞滬會戰開打於報業相當發達的上海，戰前該地報社有五十二家，通訊社二十八家，³⁶直到會戰結束，各報社相繼停刊或西遷以前，對於戰事之報導皆不遺餘力。新聞刊載內容與形式則需從 1930 年代以後訂定的各項法規看起。

北伐前後，除了黨、軍系統報刊的籌設，國民政府也制定法令與審查機制。訓政時期大抵以〈宣傳品審查條例〉、〈日報登記辦法〉、〈出版條例原則〉為主，並配合〈全國重要都市郵件檢查辦法〉及〈各縣市郵電檢查辦法〉以規範報業。迨中原大戰結束，政府以〈出版條例原則〉為基礎，制定〈出版法〉，並於 1937 及 1939 年配合局勢重新修訂。王凌霄認為這部〈出版法〉法令寬鬆，對於禁止刊載的內容規定較為含糊；修訂後的審查機制則較為苛刻，且將審查權限移往地方政府，在當時組織較不嚴明的狀況下，其成效飽受質疑。不過，當時登記有案的報紙達到上千家，可顯見報業的蓬勃發展，且在訓政時期便能將部分權限移往地方政府，已達初步的黨政分離之理想。³⁷

2006 年 9 月 15 日初版 11 刷)，頁 596-597。

³⁵ 胡滌生，〈中日戰爭戰略（術）得失之探討〉，《空軍學術月刊》第 488 期（臺北市：空軍學術月刊社，1997 年 7 月），頁 19-20。

³⁶ 馬星野校訂，程其恆編著，《戰時中國報業》，頁 17。

³⁷ 此外，國民政府也針對新聞記者，於 1932（民 21）年訂定〈新聞記者法〉。除了定義「日報社」、「通訊社」之發行人、撰述編輯者、採訪人及主辦發行或廣告者都屬於「新聞記者」外，也規範得以申請記者證的資格是畢業或任教於教育部認可的

而新聞管理機構，在抗戰爆發前是以中宣部新聞事業管理處為主，各重要城市也有新聞檢查所，與 1935（民國 24）年成立的中央新聞檢查處形成縱向聯繫之關係，但它在隸屬關係上，時常黨政軍混淆，難以貫徹命令。因此迫使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開始針對新聞管理機構進行改制。³⁸

國內外大學或學院修習新聞、文學、教育、社會、政治、經濟及法律等學科，或僅有中學畢業但曾有新聞記者資歷者。若有背叛中華民國或意圖破壞、顛覆國民政府與三民主義，或因各種行為遭判刑、褫奪公權，或是被記者公會除名等，則必須註銷記者證。同時，所有記者也必須加入記者公會或聯合公會，而公會必須協助政府宣傳政策、推動三民主義等。由於此法箝制新聞採訪而飽受批評，最後未真正施行。1937 年對日抗戰爆發，翌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抗戰建國綱領〉，其中總則第二十六條：「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1939（民國 28）年又頒布〈國民精神總動員綱領〉，主要內容要求中宣部、軍隊政治部負責宣傳國家觀念、民族道德與戰勝信心等言論，並糾正各類報刊的言論，並取締有礙抗戰的爭論與活動；而雜誌社、報館以及各級學校、文化機關有責協助黨政軍精神動員工作。此後，國民政府頒行之各項法令與實施細則，皆以上述兩項綱領為所有法令的最高指導原則，逐漸強化國家對報社、通訊社及其出版之內容的控制，不僅詳載禁止刊登之細項並要求稿件皆需受檢，就連報社、通訊社之資本額以及各區域內的報刊數量也有規範。1942 年國民政府頒行〈國家動員法〉，規定政府可以在必要時干涉報館、通訊社之設立，以及報紙、通訊稿及其他印刷物的記載，甚而因應時勢而干涉民眾言論、出版、通訊等自由。參閱王凌霄，《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頁 23-28、120-124、129-131。〈抗戰建國綱領〉（1938 年 6 月 14 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14000-0018。〈國民總動員法令（一）〉（1939 年 3 月 22 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12340-0003。張其昀，《黨史概要》（臺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1979 年 3 月再版），頁 993-994。

³⁸ 重慶時期的新聞管制機構大致以戰時新聞檢查局、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及中宣部為主。中宣部新聞事業管理處在改制以後，只負責管理黨報並指導全國的新聞政策，主要任務是建構理論，使下級單位宣傳、糾舉時能與中央的言論一致。至於中宣部原先具備的檢查功能，則移至「戰時新聞檢查局」及「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兩個單位。抗戰初期，各地新聞檢查較為紊亂，儘管 1935（民國 24）年成立的中央檢查新聞處與原先在重要都市設立的新聞檢查所開始即使 1939（民國 28）年，以中央檢查新聞處為基底，在軍事委員會底下設立「戰時新聞檢查局」，並由中宣部及軍令部會共同主持指導，主要工作是檢查、考核國內中外報紙，並編蒐報社的統計資料等，然而其體制仍舊不清，且檢查機制亦不嚴謹。隔年重新改革，包含將各省新聞檢查所的各縣市新聞檢查室改隸中央，並實施調訓、監督地方的新聞檢查單位，同時也強制中央通訊社稿件必須送檢，才因此讓新聞檢查工作上軌道。中央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審會」）則是針對較不具時效性的圖書、雜誌原稿

是以，淞滬會戰開打之際，新聞管制措施並無抗戰中期以後來得嚴謹。不過因戰前便明令各大訊息由中央社統一發佈，況且中央社又是唯一得以隨軍發佈戰訓之單位。於是 8 月 14 日起，上海地區的戰事透過中央社的訊息，開始佔據各大報之篇幅，詳細敘述戰事起因與戰況。重要的是，會戰爆發之初，主要強調日軍發動攻擊的「主動性」與國軍被迫還擊，例如 8 月 14 日《中央日報》第三版的各標題：「聞北守軍被迫應戰」、「日軍昨晨輕啟釁端，我為自衛當予還擊」、「日方蓄意侵略，和平絕望」。³⁹

上海地區的民間報刊也在此時紛紛加入報導與評述淞滬會戰。例如鄒韜奮（1895-1944）在 8 月 19 日創辦《抗戰三日刊》，⁴⁰評論淞滬

進行審查，並調查書店、出版社、雜誌社及著作人等，適時駁斥糾舉不當言論。其成立是配合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通過的〈戰時圖書雜誌原稿審查辦法〉，初由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中央社會部及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加上行政院內政部、教育部與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等六個單位於 1938（民國 27）年共同組成。兩年後國民政府對之修正並正式施行，中審會直接隸屬於國民政府行政院，下轄各省市圖書雜誌審查處；與戰時新聞檢查局也透過〈審查與檢查聯繫辦法〉橫向聯繫，凡是在報刊遭到緩登或刪扣的文章，兩個單位必須互相知會，強化了對日抗戰期間新聞檢查管制網絡。參閱王凌霄，《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頁 132-140。〈新聞檢查局（所）組織法令案〉（1939 年 5 月 27 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12071-0028。

³⁹ 《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8 月 14 日，版 3。

⁴⁰ 鄒韜奮，福建永安人，原名恩潤，上海聖約翰大學文學學士，於 1920 年代後涉及初版頁，並接辦《生活週刊》。該刊經常因應時勢而有不同的論述，九一八事變後主打抗日，冀求民眾發動抗日活動，使國民黨認識到「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決定。由於經常針砭時事，又能迎合時下大眾口味，使《生活週刊》發行人逐年倍增，直到 1933 年被國民政府查封時，發行人已達 15 多萬份，打破當時中國報刊發行量的紀錄。鄒韜奮本人則因 1936 年擔任上海「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負責人之一，向國民政府要求停止剿共、對抗日本等訴求，雙雙惹惱國民政府與日本駐滬領事館，最後有七名負責人遭到國民政府逮捕，史稱「七君子事件」。1937 年抗戰正式爆發後，七人於 7 月底獲釋，鄒韜奮先在南京，聞淞滬會戰開打，便旋即返回上海，以宣傳抗日為宗旨，主辦《抗戰三日刊》。參閱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頁 652-657、816-817。

會戰開打「表現中國的確能夠抵抗侵略」⁴¹，並特別強調空軍的「英勇行為」震驚了全世界，冀求最短時間內將日軍逐出租界，要以「『破釜沉舟』的決心，『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取得最後的勝利！」⁴²

而在社論當中，《中央日報》也將淞滬會戰，乃至抗戰本身視為神聖的：

從七月八日蘆溝橋的砲聲，到昨天上海的砲聲，抗戰的局面開展，犧牲的境界也開始了。這種局面的開展，正是中華民族解放的曙光，九十幾年的壓迫，尤其六年來的忍受，我們民族的境界太黯淡了。長期的黑暗，現在開始透露一點光明！

..... 光明必須有代價的，代價就是犧牲，將來光明的程度，必然與我們犧牲的程度，成一個正比例。..... 這一次的抗戰，意義是神聖的。為國家的生命，為民族的尊嚴，為人類的正義，我們不能不奮勇地發動抗戰。這種神聖抗戰的陣線中，中華民族的全體人民，都是參加戰爭的鬥士，中華民國全國的領土，都是抗戰的資源。..... 神聖抗戰的未來過程，..... 大概是長久的，過程的進行，大概是有波折的。..... 我們要記著領袖的話，「我們是弱國」，弱國的最利武器，就是犧牲的決心，大家抱著悲憤的情緒，必死的決心。抗戰的神聖性，當然就格外擴大。抗戰的勝利，也更有把握。..... 全國的人民，摩厲

⁴¹ 鄒韜奮，〈社評〉，《抗戰三日刊》第一號，上海，1937年8月19日，版1。

⁴² 仲寔，〈全面抗戰的展開〉，《抗戰三日刊》第一號，上海，1937年8月19日，版1。

偉大的意志力量，擁護這個神聖抗戰的挺進！⁴³

不久後又以反諷方式，「感謝日本空軍的訓練我們民眾，使我們全民的國家觀念更深切與普遍，復興的目標更接近。」⁴⁴從上述社論訴諸正義，強調民族甚至國家認同，可以顯見淞滬會戰已使國民黨或國民政府體認到全面抗戰的必要性，以及對民眾宣傳抗戰的重要性。《大公報》系統的《國聞週報》，也以「第一次對外抗戰」為標題，介紹抗戰以來南北戰場之概況，貶低日本的軍力與士氣，並塑造全國團結的氛圍：

.....日本的大陸政策，其實就是他們的國策，牠的對象，第一步是征服中國，第二步是征服蘇聯。.....在這次戰事初發動時，杉山⁴⁵便高唱要速戰速決，近衛⁴⁶也說要於最短時間內要中國屈膝；但是五十餘日以來，我們愈打愈勇，愈打愈團結。.....（日本）征服中國的幻想，則愈看愈遠，由「速戰速決」一變而為「長期周旋」。.....再從軍紀兵氣上看，那種驕縱貪橫無恥怕死的氣質，幾乎瀰漫在每一個「大和魂」的形陣裏，無怪歐美的觀察家說：華北的戰爭，證明日本的實力，比蘇聯差多了。但是，我們並不是一味樂觀，.....小勝勿驕，小敗勿餒。從今以後，我們要咬著牙受苦受餓，把所有的力量，

⁴³ 〈神聖抗戰的展開——犧牲的初步〉，《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8月14日，版3。

⁴⁴ 〈日空軍之暴行〉，《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9月10日，版2。

⁴⁵ 杉山元（1900-1945），官拜陸軍大將，時任陸軍大臣。

⁴⁶ 近衛文麿（1891-1945），時任日本第三十四屆內閣總理大臣。

供獻給國家。……在這次空前抗戰中，最使我們欣慰而感到前途樂觀的，便是全國堅強團結的形成，和政府領袖的沉著勇敢。全國各黨各派，多在政府指揮下，埋頭於救亡工作，各地軍隊，也爭先恐後，在統一的軍令下開赴前敵。⁴⁷

《國聞週報》更在 8 月下旬出版《國聞週報戰時特刊》，除了以淞滬會戰為中心，詳述戰況之外，也強調「全面戰爭」的展開：

大時代到了！全國渴望的全面戰爭終於展開！

平津失陷後，政府為緊急處理必要的準備，空氣曾一時趨於沉寂，……上海虹橋事件的發生，正是打破這種沉寂的警號，果然，日方從此積極增兵，我方也迅雷不及掩耳的趕速準備，十三日虹口槍聲一響，全國所渴望的全面戰爭終於展開了！……這個戰爭，絕不是短期所能了，最後勝利，一定要在長期抗戰後才能獲得，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應該從此覺醒，……尅尅實實埋頭去幹救國衛國的工作。⁴⁸

實際上長期抗戰的論調，在 1932 年一二八淞滬會戰後便已初步構成。

⁴⁷ 〈第一次對外抗戰〉，《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33-35 期戰時特刊合訂本（上）（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 年 8 月，日期不詳），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頁 6525-6526。

⁴⁸ 〈全面戰爭展開〉，《國聞週報戰時特刊》創刊號（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 年 8 月，日期不詳），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頁 6537。

蔣中正認為應該「充實一切自衛力量，準備長期抗戰，以求最後之勝利。」⁴⁹1935年，蔣中正又將四川地區定為復興民族之根據地，⁵⁰強化了國家的抗日決心，並以長期作戰作為對日抗戰策略的基調。1937年1月，國軍的長期抗戰計畫大致完成，並迎來7月以後抗戰的爆發。⁵¹為了將長期抗戰的計畫傳達給全國民眾，於是透過報刊加以宣傳，便成為策略之一。

從淞滬會戰開打初期的報刊評論與新聞標題形式，可以歸納以下特徵：（一）國軍雖然在戰場上處於被動，但仍能趨敵抗侮。（二）強化中國為弱國的形象，並以國外新聞媒體的評論佐證日本帝國主義式的侵略，終將失敗收場。（三）抱有對戰爭前景的樂觀心態，但也提醒全國人民應效法執政與在野黨的團結，予以國家及民族最正面的幫助。（四）正式將對日抗戰視為全面戰爭，而非單純各省各縣的區域性中日軍事衝突，藉此提升對日抗戰的重要性。

至雙方交戰陷入膠著，《中央日報》標題形式，轉為敵軍進攻不順、登陸未逞，而我軍頻頻包圍、逼退、殲滅敵軍。如「敵援軍在吳淞強行登陸未逞」⁵²、「上海敵方陸軍增援，昨晚猛烈反攻，戰至今晨敵不支敗退」⁵³等標題，皆在強調國軍的戰鬥能力與意志仍相當不錯。到了9月以後，國軍被迫採取守勢，報刊對於淞滬戰場的描述更是呈現

⁴⁹ 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頁441。

⁵⁰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2冊（北京市：華文出版社，2010年6月1版1刷），頁70。

⁵¹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2冊，頁70-71。

⁵² 《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8月24日，版3。

⁵³ 《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8月29日，版2。

「報喜不報憂」的狀況：「上海戰局，仍在膠著狀態，戰線雖略有進退，與全局尚無重大影響。」⁵⁴「淞滬戰場仍在膠著狀態中，敵全力進攻，難得寸進。」⁵⁵同時強調我軍士氣愈戰愈壯，而敵軍情勢愈不樂觀：

據前線之某軍長談：「日本軍閥.....初以為我國軍對不堪一擊，孰知我軍在淞滬抗戰，屢挫敵鋒，敵乃一再增援，四次總攻，均告挫敗。.....猶意北伐時期，北洋軍閥實力雄厚，睥睨一切，迨與革命軍交鋒後，方知革命軍戰鬥力之強，於是慌忙中屢屢調兵增援，終至援盡而崩潰，今日本軍閥輕舉妄動，情況亦復如此。.....敵軍最畏我軍之衝鋒，甚至一聽到我衝鋒之號音，即行畏縮慌亂，亂發槍砲，其可憐亦復可笑之狀，我士兵常引為笑談。.....我軍長期抗戰，確有充分之把握，敵軍最後必至全面覆滅。」⁵⁶

日本此次對華侵略，.....原冀於最短時間內使中國屈服，.....遇我壯烈之抵抗，戰事既大違所期，財力尤捉襟見肘，於是始則通過五萬萬之增稅案，適復通過二十萬萬元之預算案，竭澤而漁、怨聲載道，據東京消息，陸相杉山近稱「日本國民，

⁵⁴ 〈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39 期（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5 日），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頁 6551。

⁵⁵ 〈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40 期（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 年 10 月 6 日至 10 月 12 日），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頁 6556。

⁵⁶ 〈我軍士氣愈戰愈壯〉，《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41 期（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 年 10 月 13 日至 10 月 19 日），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頁 6556。

易興奮亦易消沉，現在戰事延長，各方面不平之聲甚囂塵上，影響前線甚大，希望國民覺悟」云云。日方民情之憤激，及其政府之狼狽，就此數語可以推薦。是知我國只需長期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我也。⁵⁷

儘管真實情形，國軍已漸因日軍不斷增援而逐漸失守，但報刊為了穩定軍心、民心，仍需塑造前線軍隊的士氣之高、戰力之強，誠為戰爭期間宣傳的必然現象。即便真遇某要點失守，也以我軍「全營犧牲」，「抗戰之烈，足使敵軍喪膽」，⁵⁸務必讓中國民眾認識我軍的勇敢。這樣的新聞稿撰寫模式，大致充斥著抗戰時期，當時上海的中醫醫生陳存仁（1908-1990）⁵⁹亦回憶當時報刊「不是說國軍如何勇敢，就是說日軍如何慘敗。」⁶⁰

較為迥異的報紙內容，是迨 10 月底大場陣線失守，報刊終究必須向民眾交代淞滬戰場國軍的動向：

自戰事延至蘊藻浜南後，大場廟行一帶，即陷於突出形式，敵以主力撲南翔至大場公路，希突破一點，牽動全局，一週來

⁵⁷ 〈日軍閔竭澤而漁，民情極憤激——近衛猶稱明年仍將增稅〉，《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9 月 12 日，版 2。

⁵⁸ 〈寶山城守軍全部殉國〉，《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9 月 10 日，版 2。

⁵⁹ 陳存仁原名陳承沅，出生上海商人家庭，求學期間曾師從章太炎（1869-1936）、丁甘仁（1865-1926）等，畢業於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並在上海開設中醫診所。生前曾為中醫辦過不少書籍與報刊。

⁶⁰ 陳存仁，《烽火下的上海：十里洋場的八年抗戰》（臺北市：時英出版社，2005 年 7 月初版），頁 57。

戰事之劇烈，為滬戰以來所未有。現大場廟行終於不守，江灣開北亦勢難持久，今後劇戰，或將在國防線上展開矣。⁶¹

又淞滬會戰近尾聲之際，《國聞週報》的評述：

上海方面，蘇州河兩岸激戰兩週，敵雖有數點渡河，但終難有顯著發展，乃於五日起在金山衛全公亭等處登陸，直追松江金山，以斷我後路，我軍一面以重兵圍堵，一面乃將主力軍向後退，於九日轉入新陣地，今後除南市一點尚擬固守外，戰事已發展至上海市外矣。⁶²

當時國軍的撤退行動，由於準備不周，又遇道路泥濘使行動更為緩慢，民眾對於戰爭動員的亦無法應急；相對的，日軍在此時掌控了制空權，連夜跟蹤轟炸國軍部隊，使這場撤退行動大為失敗，軍中更瀰漫著低迷氣氛。⁶³為了不全然發佈國軍在淞滬會戰失利的消息，重挫軍民士氣，報刊的編輯排列遂現蹊蹺，例如《國聞週報》的編輯方式，於概述上海戰況的消息後，通常又以「北方各線漸有轉機」、「宋子文談抗

⁶¹ 〈滬我軍退出大場線〉，《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42 期（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 年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6 日），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頁 6569。

⁶² 〈一周間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44 期（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9 日），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頁 6585。

⁶³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頁 162-172。

戰決心」⁶⁴、「蔣委員長談抗戰決心」⁶⁵、「蔣委員長談抗戰到底」⁶⁶等標題及其內容，有意地增強讀者對國軍戰力或抗戰勝利的信心。再從上文所引的報刊內容，使用「膠著」、「轉進」等詞彙，取代撤退、撤守等偏向負面之用語，亦可看出報刊對民眾宣傳的手法。唯一的例外是 11 月 11 日至 16 日間的《國聞週報》，以「大上海已全部淪陷」為國內新聞的頭條，但仍強調「奮鬥至最後關頭，乃由軍事當局下令撤退。」並以〈俞鴻鈞發告市民書〉，要民眾繼續保有抗戰的精神與信念：

吾人此三月中之經歷，應再加以探討，……然後充滬市民眾抗戰之精神，足以為全民族抗戰之精神，恢滬市民眾抗戰之經驗，足以為全民族抗戰之經驗。……故切望吾滬民眾不可因戰地略移而誤茲沮喪，更當因環境較異而益矢忠誠。⁶⁷

《中央日報》則貫徹黨的立場，在國軍奉令撤退當日，第二版新聞大標題雖為「南市守軍奉令撤退——浴血苦鬥至最後一息，尚有少

⁶⁴ 《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42 期（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 年 10 月 20 日至 10 月 26 日），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頁 6570。

⁶⁵ 《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43 期（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 年 10 月 27 日至 11 月 2 日），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頁 6580。

⁶⁶ 《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44 期（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 年 11 月 3 日至 11 月 9 日），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頁 6580。

⁶⁷ 〈俞鴻鈞發告市民書〉，《國聞週報》第 14 卷第 45 期（上海市：國聞通訊社，1937 年 11 月 10 日至 11 月 16 日），收錄於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週報輯》，頁 6591-6592。

數勇士奮戰中」⁶⁸，但當天適逢孫中山誕辰日，因此正好得以社論試圖增加民眾信心：

今天是總理七十一週年的誕辰，同時又是「八一三」全面抗戰發生後整整地三個月，……追想總理大無畏的精神，只覺得格外興奮，格外增加我們抗戰的勇氣。……全中華民族在本黨領導之下，已經成為一箇整體，在這箇整體中，包含著無限的潛在力量，最高領袖受民眾的委託，已經決定與敵人周旋到底，我們的憑藉，比總理開始革命時雄厚得多，只要大家能始終信任政府，服從政府的指導，抗戰的前途，一定是樂觀的。

69

當時上海地區民眾的反應，從淞滬會戰開打之初的慷慨激昂，至此迅速消沉，並出現兩種想法與動向。其一是依據過往經驗，認為上海租界是一塊「安樂土」，鄰近地區的戰事很可能像一二八淞滬會戰一樣，隨時都能透過租界的第三方協調而停止戰鬥，因此選擇靜觀其變；其二是租界區裡與黨、政、軍有關的人士，認定「長期抗戰」的說法，為了避免日軍強行進入租界造成人員與財務之損失，於是離開上海。⁷⁰是以，透過報刊增強民眾對國軍與政府的信心，並再次展現抗日決心有其必要。

⁶⁸ 《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11月12日，版2。

⁶⁹ 〈紀念總理誕辰〉，《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11月12日，版2。

⁷⁰ 陳存仁，《烽火下的上海：十里洋場的八年抗戰》，頁50。

整體而言，各報刊受限於國民政府的法令，戰時一切的新聞稿件必須以中央社為主，加以中央社又是唯一獲准攜帶通訊器材隨軍採訪的單位，故報紙呈現「一家之言」的態勢，戰事新聞幾乎都會加註「中央社上海十五日電」等，因此報與報之間的戰況只有極為少數的字詞不同；惟各報社論有相對較多的自由度，由編輯自行撰寫，但內容仍不脫建立國家人民信心一類的用語，見不著有任何直接或間接指責國軍或政府抗戰不利的評論。以國民政府的觀點，統一報刊的宣傳口徑，使民眾接收的訊息大致相同，有助於國民政府迅速地強化認同。即便各黨各派的認同是因應外患的暫時性強化，並仍有認同「對象」的問題，但至少訴諸國家主權、民族存亡的議題後，對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與軍隊而言，無疑是對日抗戰決心與信心方面的互補。

民眾在淞滬會戰開打後，對於會戰本身或整體抗戰的反應與想法不易獲悉，而從《大公報》於淞滬會戰期間開始，並每日刊登的「戰線」專欄，倒是可以彌補一些缺憾。「戰線」專欄始於1937年9月18日，《大公報》編者以〈我們的信念和態度〉為題，向讀者表達以文藝方式抗敵的決心及各類作品之徵稿啟示：

在今天，在我們這個滿地塗上血腥的中國，在一切都處於非常時期的環境下，如果沒有人否認我們的文藝不應該隨著敵人的砲火而燬滅，自然而然的，現階段的文藝應該是另一種姿態，應該是劃時代的產品。她毫無疑義的是具有現實性的，而在參加生活過程中負有相當任務的。……我們拿這種真實的作品，……

可以.....使每個戰鬥員加強了反抗侵略的勇氣，這是我們唯一的信念和使命！也可以說是起碼的一個希望。.....我們需要前方關於戰爭的報告文學，散文，詩歌，速寫，木刻，戲劇等作品，.....希望在後方的非戰爭員而實際已擔起救亡任務的人們，每天把所接觸到的可歌可泣的事情，能用各種不同的體裁寫來。⁷¹

此後，引起諸多藝文人士紛紛投稿，有些以詩歌激勵大眾：「中華民族要怒吼！中國大眾要翻身！血花栽遍中國土！中國遍地插血旌！不怕鮮血流成河，勝利終歸屬我們！血旌招展入雲霄，中華民族慶新生！」⁷²有些以短文主張宣傳應該更大眾化，所有的戰時工作組織與團體，應該穿著平民的衣服才較具親和力，且理應使用通俗、具體的語句說明，再從對話中灌輸民眾愛國心等常識，並嚴格地要求自身表現。⁷³或有針對知識分子，呼籲開展「戰時文藝」，以筆鋒煽動、刺激中國民眾抗日的情緒。⁷⁴

另外，透過國軍特定官兵的英勇事蹟進行宣傳，也有助於抬升民眾對抗戰的反應與回饋，當中較具代表性者，能以四行倉庫保衛戰為例：當大場陣線失守，國軍決定改變戰術，除左翼維持不變，其餘主力撤守據點，僅留一師之兵力死守閘北。但經上海戰區副司令顧祝同

⁷¹ 〈我們的信念和態度〉，《大公報》戰線第一號，漢口，1937年9月18日，版4。

⁷² 藍楓，〈鮮血讚〉，《大公報》戰線第四號，漢口，1937年9月21日，版4。

⁷³ 瘦岑，〈救亡運動應當大眾化〉，《大公報》戰線第六號，漢口，1937年9月23日，版4。

⁷⁴ 崔家瑞，〈我們需要戰時文藝〉，《大公報》戰線第七號，漢口，1937年9月24日，版4。

與八十八師孫元良等高級軍官的磋商後，決定留下第五二四團的加強營，駐守位於四行倉庫的八十八師師部。五二四團團附謝晉元奉令完成北火車站的掩護任務後，便立即返回四行倉庫進行準備。10月26日深夜，該團正式進入四行倉庫駐守。不過上海各報在隔日的報紙，以閘北「我軍西撤」等字眼大篇幅報導，有說明撤退原因，卻未提及軍隊留守斷後。⁷⁵10月28日，「孤軍」死守閘北正式見報。

《申報》報導27日的情形：「我八十八師一營以上之忠勇將士八百餘人……係奉命扼守要點，掩護大軍撤退者，當大軍安然退去後，本有充分時間，可以全部撤去……此營中勇將是抱定犧牲決心，寧灑最後一滴血，爭取我國家偉大之人格，發揚民族壯烈之精神，不願生還……。」⁷⁶更有記者於當日中午以後在蘇州河南岸近距離觀察，對於戰情有詳細地描述：「自正午起至下午三時，敵眾……擬突門而入，此時我軍乃發機關槍，拋擲手榴彈，敵眾被擊斃達六七十人之多……六時許，謝團長楊營長曾發出壯烈之呼籲，請接濟糖鹽各五百磅，光餅五百枚，則我全營中勇將士，可與敵死拚一週，死而無憾。」⁷⁷

同日，上海市民聽聞消息後，租界區內的市民感到興奮，紛紛爬往高處觀看槍彈往來，⁷⁸北西藏路附近駐守的英軍以及美僑、德僑也

⁷⁵ 〈江灣閘北我軍昨晚西撤〉，《申報——臨時夕刊》，上海，1937年10月27日，版1；〈某軍事長官談我撤退閘北原因〉，《申報——臨時夕刊》，上海，1937年10月27日，版1。

⁷⁶ 〈悲慘壯烈可歌可泣，我孤軍誓死抗日〉，《申報》，上海，1937年10月28日，版3。

⁷⁷ 〈八十八師謝團掩護大軍撤退〉，《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10月28日，版2。

⁷⁸ 陳存仁，《烽火下的上海：十里洋場的八年抗戰》（臺北市：時英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頁45。

贈與罐頭等食物，唯國軍仍尚缺醫藥用品；⁷⁹另外，「青年救國服務團代表及美聯社記者均曾冒險至該倉庫慰問……。」⁸⁰北西藏路一帶也有許多民眾駐足圍觀，英軍則是於早晨勸退駐軍進入租界，並斷絕鄰近交通，⁸¹但守軍不退，甚至仍設法遞出信件。該日日軍將四周房屋焚燒殆盡，並分別於早晨與下午派機偵查，而國軍以機槍逼退之，⁸²謝晉元更於早晨親手擊斃兩名日軍，租界民眾見之皆鼓掌歡呼；⁸³下午五時，四行倉庫樓頂突然高揭一面國旗⁸⁴，「該旗為新製者，闊八尺，係由一女童子軍冒險涉送進」⁸⁵。

《立報》對於獻旗一事記載得更為詳細，指國旗原由上海市商會派女童軍所致贈，當晚則又有人再送兩面大幅國旗，並於 10 月 29 日早晨高掛頂樓，⁸⁶民眾見之無不雀躍，「高呼『中華民國萬歲』」。⁸⁷捐贈物資也並未停止，當天有許多市民絕食一天，購買水果等食物運往倉庫，也有麵包公司捐三卡車的麵包與餅乾。⁸⁸該日，日軍數度以平

⁷⁹ 〈我孤軍死守四行倉庫，青天白日旗飄揚閘北〉，《立報》，1937 年 10 月 29 日，版 2。

⁸⁰ 〈滬我軍新陣線穩固〉，《大公報》，漢口，1937 年 10 月 28 日，版 2。

⁸¹ 〈閘北一高樓國旗招展！〉，《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10 月 29 日，版 2。

⁸² 〈謝團無恙〉，《大公報》，漢口，1937 年 10 月 28 日，版 2。

⁸³ 〈謝團長上孫師長函〉，《申報——臨時夕刊》，上海，1938 年 10 月 30 日，版 1。

⁸⁴ 〈八百孤軍安全無恙，我壯士高揭國旗〉，《申報》，上海，1937 年 10 月 29 日，版 2。

⁸⁵ 〈孤軍死守閘北之八百壯士奮勇却敵〉，《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10 月 30 日，版 2。

⁸⁶ 〈我孤軍死守四行倉庫，青天白日旗飄揚閘北〉，《立報》，上海，1937 年 10 月 29 日，版 2。

⁸⁷ 〈我孤軍誓寶閘北一塊土〉，《申報——臨時夕刊》，上海，1937 年 10 月 29 日，版 2。

⁸⁸ 〈大中華男兒氣壯山河，閘北孤軍奮鬥到底〉，《立報》，上海，1937 年 10 月 30 日，版 2。

射砲射擊倉庫西北側，但因庫牆厚實而未完全穿透。早晨日方派機盤旋於倉庫上空但沒有投彈，又有旅團於上午三時、上午七時十分、下午三時四十五分及下午五時二十分，四度向倉庫進攻，前三次皆遭國軍以手榴彈與機槍逼退，最後一次日軍派海軍陸戰隊乘汽艇駛至蘇州河，擬攻倉庫南側，⁸⁹但因鄰近租界，於是英美派兵駐守並勸阻日軍，五小時後日方撤退。午後四時日軍又犯，雙方僵持至半夜，估計日軍死傷達八百人。⁹⁰又，當日報紙援引上海市《大美晚報》評論「閘北孤軍之死守，尤為世人所推崇」，⁹¹以此宣示各國皆同情中方。

軍事行動之外，謝晉元於上午分別致函八十八師師長孫元良及副師長馮聖法，強調自己「職到此時從未向外界發表任何要求、任何談話」，「現職決心殉國，在限期內任務達到，亦決不輕言撤退……。」⁹²孫元良也致書倉庫內的守軍，表明死守之決心，「全世界千百萬後世人，必以血誠讀此史頁……望繼續奮鬥，完成抗敵使命……我最高領袖蔣委員長於諸同志之壯烈犧牲，殊感嘉慰，余敬以轉告。」⁹³同時又致信上海市地方協會會長杜月笙，表明對於各界所捐贈的物資相當感激，但由於食物不易存放，因此希望由杜月笙代為轉達各界，可改以購買

⁸⁹ 〈大中華男兒氣壯山河，閘北孤軍奮鬥到底〉，《立報》，上海，1937年10月30日，版2。

⁹⁰ 〈滬西全線戰士又起——南祥之線〉，《大公報》，漢口，1937年10月30日，版2。關於此處日軍死傷人數有過分誇大之嫌，國軍撤退後，記者赴膠州公園採訪時，確認日軍死亡人數約八十人。參閱〈忍痛撤退四行倉庫，我壯士赴新陣地〉，《申報》，上海，1937年10月31日，版2。

⁹¹ 〈外報一致揄揚我軍抗戰精神〉，《申報》，上海，1937年10月29日，版2。

⁹² 〈八百孤軍沉著應戰，今晨三次却敵〉，《申報——臨時夕刊》，上海，1937年10月30日，版1；〈閘北保衛者堅守已四日——謝團附函呈孫師長〉，《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10月31日，版2。

⁹³ 〈孫師長勗死守壯士〉，《申報》，上海，1937年10月30日，版3。

救國公債或捐助現金，以表愛國之心。⁹⁴

10月30日拂曉，中日雙方再度展開攻防，但日方至早晨七點卻無所斬獲，於是改變策略，從西側緩慢地將防禦工事往東，向倉庫方向移動，並集中火力順利將倉庫牆壁打穿，然而國軍卻趁勢架設機槍於該洞口，日軍於是停止進攻。之後除了有日方軍機盤旋之外，皆為零星戰火。⁹⁵報紙並報導，各界除了致電頌揚守軍，⁹⁶亦紛紛籲請蔣中正以人道考量，勿使守軍犧牲，然謝晉元則仍堅持要完成任務。⁹⁷

當晚，蔣中正諭令淞滬警備總司令楊虎指導五二四團退出四行倉庫，說道：「為主帥者，愛惜所部與犧牲所部皆有一定限度，今謝晉元團長死守閘北一隅，任務與目的已達，故令其為榮譽之撤退，不必再作無謂之犧牲矣！」⁹⁸楊虎旋即與謝晉元協商，翌日各大報紛紛刊載蔣中正的指示：「對此一營壯士視死如歸，忠勇愛國，不負平素訓練教導之旨，亦深為嘉許感動，惟以現值長期抗戰之際，國家所期待於此忠勇壯勢者至深且遠，如任其孤軍死守，壯烈犧牲，要亦為國家莫大之損失，不如忍痛放棄此閘北最後陣地，使此輩壯士另圖報國之道……。」⁹⁹同時電諭犒賞官兵三千元，並各升一級。¹⁰⁰

⁹⁴ 〈八百孤軍沉著應戰，今晨三次却敵〉，《申報——臨時夕刊》，上海，1937年10月30日，版1。

⁹⁵ 〈八百孤軍沉著應戰，今晨三次却敵〉，《申報——臨時夕刊》，上海，1937年10月30日，版1。

⁹⁶ 〈閘北保衛者堅守已四日——各地團體分電致敬〉，《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10月31日，版2。

⁹⁷ 〈孤軍奮鬥〉，《立報》，上海，1937年10月31日，版1。

⁹⁸ 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上）》（臺北市：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年出版），頁133。

⁹⁹ 〈堅守估蓄苦鬥四日，八百壯士遵命撤退〉，《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11月1日，版2。

撤退前，日軍於 30 日晚上十時發動猛攻，至隔日凌晨一時平射砲砲火最激烈，平均每秒一發，¹⁰¹但從西北方來的砲彈但也因誤射而落至南京路外灘一帶，造成房屋毀損並波及百姓。¹⁰²五二四團數百位官兵約莫於凌晨三時，計四百五十人順利退出，受傷者二十四名，另有五人死亡，¹⁰³並在兩小時後抵達租界區，午後再轉移至上海跑馬廳的英國兵營內整頓靜養。日軍於清晨五時向倉庫摸索前進，不時向內射擊，確認無人後便佔領之，並同時要求上海工部局履行諾言，扣留國軍之武器，¹⁰⁴至此結束四行倉庫保衛戰。

有記者統計，保衛戰期間，倉庫損失約一百五十萬元以上；¹⁰⁵官兵則一共有三十五人殉職，五十四人負傷。¹⁰⁶謝晉元與楊瑞符除了官階升級之外，另於年底獲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頒青天白日勳章一座，¹⁰⁷但部隊卻因此陷於上海租界區，直到 1941（民國 30）12 月

¹⁰⁰ 〈革命文獻—淞滬會戰與南京撤守〉（1937 年 10 月 31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20300-00009-138。

¹⁰¹ 〈我忠勇一營孤軍今晨奉令忍痛退出閘北〉，《申報》，上海，1937 年 10 月 31 日，版 3。

¹⁰² 〈今晨敵砲轟四行倉庫，砲彈飛落外灘一帶〉，《立報》，上海，1937 年 10 月 31 日，版 1。

¹⁰³ 〈盧溝禦侮（二）〉（1937 年 10 月 31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105-00002-368。

¹⁰⁴ 〈一般資料—呈表匯集（六十四）〉（1937 年 11 月 4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491-004。

¹⁰⁵ 〈忍痛撤退四行倉庫，我壯士赴新陣地〉，《申報—臨時夕刊》，上海，1937 年 10 月 31 日，版 2。

¹⁰⁶ 〈八年血債（一）〉（1937 年 11 月 2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90200-00025-127。

¹⁰⁷ 〈行政院決議呈請國府特令褒揚郝夢麟等，謝晉元、楊瑞符各頒勳章一座，陳濟棠捐款接濟軍用特予獎勵〉，《中央日報》，南京，1937 年 11 月 17 日，版 3。〈抗日有功人員勳獎（九）〉（1937 年 11 月 16 日至 1938 年 1 月 4 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35100-0071。

28日。¹⁰⁸期間謝晉元於1941年4月24日被刺，¹⁰⁹蔣中正得知消息後電令表揚謝晉元並籌劃家屬撫卹事宜，¹¹⁰以彰「我軍人堅貞壯烈之氣概」；¹¹¹隨後，行政院認為謝晉元一團當年死守閘北，誓死守護國旗與最後陣地，「忠勇堅貞氣節以深為中外人士所矜式」，且在撤出四行倉庫後「留駐上海歷時三年，備受逼誘，卒能始終一致，保持我革命軍人之人格」，因此明令褒揚，並由政府代為教養其家屬子女。6月17日謝晉元家屬在廣東省蕉嶺縣治喪，政府要員也紛紛致輓詞並派員前往悼念。¹¹²同年年底，日軍強行扣押孤軍至南京等地，未逃跑的士兵有部分在後來被日本遣送新幾內亞做苦工，¹¹³至此上海孤軍營告終。

另女童軍楊惠敏則是早在獻旗後的兩天便在報紙專欄上獲得介紹，¹¹⁴外國媒體路透社也敘述八百壯士與楊惠敏的經歷。¹¹⁵原先在獻旗當天，報刊報導有女童軍送旗一事，半夜又有另二人再送兩面較大的國

¹⁰⁸ 上海租界原先對孤軍營採取不嚴格控管的措施，一度得以開放營區與民眾往來。1938年8月11日，為了紀念前一年隨八十八師開拔至上海準備抗日，於是向租界萬國商團交涉，同意條件將旗桿截短，以免工部局遭到日方為難。但該日上午升旗典禮後，孤軍營卻遭萬國商團包圍，中白俄商團開槍射殺四名國軍士兵。此舉也引發中國民間各界要求外交部力爭。〈對英法德義關係（四）〉，《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90103-00014-255。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高雄市：景昌文具，1974年2月再版），頁220。

¹⁰⁹ 〈謝晉元被刺與撫卹〉（1941年4月25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16144-0001。

¹¹⁰ 〈籌筆——抗戰時期（四十三）〉，《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10300-00043-017。

¹¹¹ 〈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年四月〉，《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60100-00151-025。

¹¹² 〈抗戰有功人員褒卹案（四）〉（1941年5月6日至5月9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36000-0132。

¹¹³ 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頁224-225。

¹¹⁴ 〈向我閘北孤軍獻旗的四拾一號女童子軍〉，《立報》，上海，1937年10月30日，版3。

¹¹⁵ 楊惠敏，《八百壯士與我》，頁72-73。

旗，然而後述二人為誰，在往後的報導中不見任何記載，反倒「四十一號女童軍」楊惠敏又在兩週後出版的《戰時畫報》，被更仔細地介紹學、經歷。¹¹⁶雖然楊惠敏旋即遭到日方通緝而於翌年初離開上海，但仍輾轉到金華、南昌等地繼續以童軍身分服務，¹¹⁷且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安排下，成為世界青年和平大會成員之一赴美，並在會後為了擴大宣傳，又受派參加美國巡迴宣傳隊。¹¹⁸

實際上，童軍在中國的發展，與童軍創立者 Robert Baden-Powell (1857-1941) 的構想有很大的不同，他所強調的非軍事化、非學校化與非政黨化在中國未獲得實現。國民黨在 1924 年改組之際，體認到青年學生對於國民革命的重要性，於組織學生團體便相形重要，其中童子軍組織亦成為其中一環。童軍組織乃依照黨義發展，在中國面臨內憂外患下，不但負有軍事教育之意義，並在黨化教育的基礎上，於學校體制內相得益彰。1931 年以後，童軍陸續發起抗日救國的宣傳活動，並在八一三淞滬會戰開打後，更宣示抗戰到底、服務到底，投入二百多名童軍團員從事隨軍服務、醫療後勤等戰地工作，顯見童軍組織幾已配合國家發展，並讓青年學子密切地與黨結合。¹¹⁹楊惠敏的事蹟，正巧可以讓青年參與抗戰的宣傳得到彰顯。

淞滬戰事開打之際，一路到大場陣線失守，報刊逐日的戰訊多以

¹¹⁶ 《戰時畫報》第 18、19 合刊，上海，1937 年 11 月 15 日，頁 16。

¹¹⁷ 楊惠敏，《八百壯士與我》，頁 102-130。

¹¹⁸ 〈陳誠副總統文物——往來函電（二十一）〉（年份不詳），《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8-010202-00021-008。

¹¹⁹ 參閱秦穗齡，〈童子軍與現代中國的青少年訓練（1911-1949）〉（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

國軍某師或某部隊等較為不明確的戰鬥序列為主，報導中列出的國軍人名，也多是師長以上軍職或不幸殉職之軍官。四行倉庫保衛戰則是少見將部隊編號與團、營長官姓名刊登，並追蹤戰況、逐日報導，甚至反常地透過情治單位架設電話，使戰情可以直達天聽。¹²⁰且自登報日起，便被以「八百壯士」稱呼，僅有《抗戰三日刊》稱之為「四百壯士」，但仍無減對這批國軍「完成閘北抗戰中最光榮的一幕」之評價。¹²¹甚至也曾引起日本陸戰隊的高度關切，認為四行倉庫的守軍已然成為中國宣傳的好材料，故冀求各種方式圓滿解決保衛戰。¹²²「孤軍」撤至上海後，報刊未讓日方得意，仍加以報導官兵的後續消息，乃至於謝晉元之死與派楊惠敏赴美宣傳等皆有提及。

從保衛戰開打到後續的消息追蹤，顯見這場保衛戰經過精心設計。自軍官們的回憶也能得到印證：八十八師參謀長張柏亭於 10 月 26 日與副司令顧祝同商討留置師部一事時，便說蔣中正有意將淞滬會戰的戰況帶到《九國公約》會議上；¹²³而蔣中正亦曾言：「滬戰不能不變換陣地矣！但閘北當留一團死守，以感動中外人心。」¹²⁴10 月 28 日蔣中正於松江主持軍事會議，並對第三戰區師長以上將領訓話，黃杰又提到蔣中正「留八十八師五二四團一團人死守閘北，外國軍人……發

¹²⁰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頁 121。

¹²¹ 金仲華，〈蘇州河岸的新陣線〉，《抗戰三日刊》第二十三號，上海，1937 年 11 月 3 日，版 1。

¹²² 〈一般資料——呈報彙集（六十四）〉，《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491-001。

¹²³ 〈光耀日月永垂青史——張柏亭將軍追記淞滬戰役鱗爪〉，收錄於上官百成編撰，《八百壯士與謝晉元日記》，頁 21-23。

¹²⁴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下冊）（臺北市：國史館，2011 年 12 月租版一刷），頁 582。

現人類的同情，就力勸我們官兵由租界安全退出，但是我們官兵……寧願死守不退，……使各國人士知道我們中國軍人已有未主義而戰、為衛國而死的程度和精神。」¹²⁵這樣一場精心安排的保衛戰，其結果對內促使謝晉元、楊惠敏及「八百壯士」的形象在當時備受重視，成為淞滬會戰的代表性人事物及歷經抗戰者的共同記憶；對外則有助於中國在《九國公約》會議上的宣傳，¹²⁶使抗戰形象躍升至國際政治舞台。

相較於四行倉庫保衛戰立即性的高度關切，8月14日起也投入作戰的空軍高志航等飛官，其個人受關注度便不高。高志航早年在東北陸軍軍官教育班期間曾赴法國留學，學成後在東北航空部隊擔任飛鷹隊少校飛行員。1929年國民政府在南京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設立航空班，1932年升格為中央政府航空學校，選定杭州笕橋為校址，並陸續派員出國考察、¹²⁷設立學生總隊、¹²⁸積極要求隊長學業，¹²⁹亦聘任美籍教

¹²⁵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年6月出版），頁72。

¹²⁶ 《九國公約》為1921（民國10）至1922（民國11）年間，華盛頓會議中所完成的三項成果之一，共有美、英、法、義、荷、比、葡、日、中等九國簽屬，主要內容是尊重中國在領土及行政等主權，若中國未參與，則各國不得訂定任何與中國有關的條約，並且不能阻礙中國的國家發展進程。當抗戰爆發以後，蔣中正透過外交管道向國際聯盟申訴，要求介入處理中日糾紛，但因日本早在1933年便退出國際聯盟，故國際聯盟並未採納，而是提議再次召開《九國公約》會議，並訂於10月30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於是上海的堅守，便被視為有助於提升中國在國際舞台發言的機會。參閱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頁124-125、127-147。楊天石，〈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刊登於「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198221/198974/199955/12501359.html>（2014年4月13日點閱）。

¹²⁷ 〈籌筆——統一時期（八十四）〉（1933年5月23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0084-015。

¹²⁸ 〈籌筆——統一時期（九十四）〉（1933年9月16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0094-013。

官實施訓練，¹³⁰蔣中正甚至囑咐應設法鼓勵浙江中學生與大學生踴躍報考航空學校，¹³¹試圖藉由航校的訓練進一步組織空軍，¹³²顯見對航校的重視。高志航亦前往受訓，雖軍階降為上尉，但仍不減上級對他的重視。1933年便成為航校的隊長人選，¹³³翌年又以教官身分接收並公開駕駛中國購買的新軍機。¹³⁴1936(民國25)年因學飛行表現優良，而被委以空軍總隊總隊附之職，¹³⁵並派他前往義大利留學考察。¹³⁶

淞滬會戰開打後，空軍對敵作戰的消息時有所聞，在電報當中也可看到高志航及航校學生的表現，飛機與人員的損傷相當詳細，¹³⁷不過報紙受限於管制措施，通常只說明出動架次與摧毀、擊落隻數量，而幾乎不單獨提及部隊序列與飛行員本名。以《立報》為例，自空軍

¹²⁹ 〈籌筆——統一時期(九十五)〉(1933年10月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0095-058。

¹³⁰ 〈空軍編訓(二)〉(1936年11月14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87-002。

¹³¹ 〈籌筆——統一時期(一二五)〉(1935年1月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0125-013、002-010200-00125-021。

¹³² 〈籌筆——統一時期(一四九)〉(1935年12月4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10200-00149-040。

¹³³ 〈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六十五)〉(1933年11月27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80200-00135-067。

¹³⁴ 〈天廚號機試飛良好，由航署教官高志航協同接收〉，《中央日報》，1934年3月4日，版3。〈天廚號機今日命名，國府派吳鐵城代表參加，航署派高志航駕機表演〉，《中央日報》，1934年3月10日，版3。

¹³⁵ 〈戰區軍事部署及人員派充(一)〉(1936年4月5日至4月13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72200-0002。

¹³⁶ 〈鞏固國防(二)〉(1936年11月1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90102-00002-183。

¹³⁷ 如杭州防空司令宣鐵吾、副司令蔣堅忍向蔣中正報告，1937年8月15日早晨，日本軍機從奉化向杭州侵襲，並在中央航校投彈。中國空軍在蕭山、紹興、寧波等地與日機展開空戰，一共兩架飛機受損，高志航與學生一名受輕傷，但及落日機共七架。〈八年血債(二)〉(1937年8月15日)，《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2-090200-00026-012。

開戰訊息見報的 8 月 15 日至會戰結束，計五十五則與滬杭一帶空軍有關之作戰消息，僅有四則提到官兵姓名：「某隊隊員空軍少尉任雲閣受傷殉國。」¹³⁸「航空員閻海文利用降落傘下落，但仍墮入的軍陣地，被敵包圍，閻即出手槍斃敵數人，至最後一粒子彈，向太陽穴自斃殉國。」¹³⁹「我空軍志士張樹功，前因在楊樹浦一帶夜襲敵陣，頭部略被高射砲彈片擦傷，經在滬療養後，昨已離滬歸隊工作。」¹⁴⁰「我空軍某分隊長祝鴻信前在滬襲敵陣，不幸左臂受傷，在醫院療治後，現已痊癒，日內即歸隊，繼續殺敵。」¹⁴¹另追蹤的空軍消息，也多由時任空軍副總司令毛邦初向記者說明，例如：「據毛邦初談，日機被擊落者共卅四架，內有重轟炸機廿四架，中國方面並無一架被擊落，兩架受微損，三架在地被炸。旋往晤中國空軍某將士，謂彼曾獨自擊落日機四架。」¹⁴²《申報》亦幾乎逐日報導空軍隊第與空中作戰之捷報，但仍不提陣亡將士以外的空官或飛行員姓名，遑論作戰隊伍之編號。唯獨《辛報》曾在「抗戰叢刊」專欄，敘述高志航飛行技巧高超及其英勇對日作戰之過程；¹⁴³另也有畫報介紹空軍，將高志航等空軍飛行員若干人等之本名與照片編輯在內。¹⁴⁴

而高志航本人英雄角色的塑造與空軍的抗日形象，即使到 1937

¹³⁸ 〈我空軍駕駛員任雲閣殉國〉，《立報》，上海，1937 年 8 月 15 日，版 1。

¹³⁹ 〈我空軍戰事閻海文壯烈犧牲之一幕〉，《立報》，上海，1937 年 9 月 7 日，版 1。

¹⁴⁰ 〈空軍勇士張樹功昨離滬歸隊工作〉，《立報》，上海，1937 年 10 月 25 日，版 2。

¹⁴¹ 〈空軍隊長祝鴻信傷癒將歸隊殺敵〉，《立報》，上海，1937 年 11 月 6 日，版 2。

¹⁴² 〈我空軍已獲極大勝利〉，《立報》，上海，1937 年 8 月 24 日，版 1。

¹⁴³ 〈抗戰叢刊（一）〉（1938 年），《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18-003。〈抗戰叢刊（一）〉（1938 年），《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701-00018-020。

¹⁴⁴ 《戰時畫報》第 1 期（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9 月 19 日），頁 7。

年 11 月 21 日，在周家口遭砲擊身亡，其死訊依舊未見報。對照當時各戰線局勢，最有可能的原因即是不能再持續對外公佈重要軍官的傷亡消息，以避免影響士氣。事實上，從淞滬會戰局勢底定之後，報紙便少有刊載有助於建立抗日烈士形象的各軍將士殉職消息。直到翌年，國民政府通過訂定 8 月 14 日為空軍節之決議。¹⁴⁵隨後，軍事委員會也決議追贈「空軍上校大隊長兼空軍驅逐司令高志航為空軍少將」，與他幾乎同時戰死的軍官，亦紛紛追晉官位。¹⁴⁶1940 年起至 1955 年，報紙都不曾中斷報紙對空軍節的報導，不過個人化的英雄形象塑造則顯得式微。

第三節 淞滬會戰的影像宣傳

抗戰時期的影像，以戰爭後期居多。主因來自抗戰初期，國軍與國民政府尚未建立戰地記者制度，本土各報社的照片來源多倚賴國際社為主，其餘影像則以外國記者拍攝居多。即使到戰爭後期，影像之記錄大致仍由各國記者所把持，尤其自 1941(民國 30)年美國參戰後，中國戰區的局勢有很大的轉折，不但同盟國 (Allies of World War II) 予以軍事方面的實質幫助，也有更多配有攝影器材的新聞記者進入中國。其中較為完備且數量龐大的影像檔案，當屬中緬印戰區，它始於 1942 年，包含中國遠征軍、中華民國空軍美籍志願大隊 (American

¹⁴⁵ 〈八一四空軍節〉(1939 年 8 月 10 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001-051616-0025。

¹⁴⁶ 〈空軍官位追贈追晉案(二)〉(1941 年 4 月 9 日至 4 月 10 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36190-0002。

Volunteer Group，簡稱 AVG，普遍稱為「飛虎隊」)、駝峰航線與中印公路開發等代表性抗戰名詞，並為中國與盟軍的聯合行動，¹⁴⁷其隨軍記者數量自然相當龐大，故影響抗戰後期之宣傳狀況。同時，無論照片、紀錄片或電影，從攝影到後製，乃至於公開，必然需要數日、數月不等的時間，時效性不即新聞報紙來得佳，但藉著影像得以直接刺激感官並喚起記憶的優勢，仍舊對宣傳產生作用。

依出版、公開的時間序，照片是繼文字之後最快的呈現方式。一般報紙中，很早開始偶爾夾雜一些照片及簡短說明，例如《中央日報》在抗戰前每隔三至四日刊登一些《中央畫刊》的內容，篇幅約半版，刊登照片之數量從零星個位數到十多張不等，內容有外交、內政建設、生活娛樂、黨內及軍方動態等。¹⁴⁸對日抗戰以後，雖報紙張數因應局勢有所增減，但仍持續刊登《中央畫刊》之影像，且戰爭本身的影像比例增加，呈現國軍使用的裝備、駐防要點，或軍民互動、平民抗日活動，以及被攻擊後的城鄉畫面等，也偶有日軍的照片。¹⁴⁹不過將照

¹⁴⁷ 參閱張力，〈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緬印戰場〉，收錄於之章東磐主編，《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臺北市：旅讀中國出版，2013年3月初版一刷），頁14-19。章東磐、晏歡、戈叔亞主編，《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貳）》（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1版1刷）。

¹⁴⁸ 外交照片如駐德大使程天放與 Adolf Hitler 的合影，《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7月14日，版10。內政建設如修復古蹟嵩山觀星樓，《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7月4日，版9。生活娛樂照片如京劇劇照，《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7月4日，版9。黨政軍動態如笕橋空軍航校副校長蔣堅忍與時任蘇浙邊區綏靖主任張發奎於國防講演後的合影，《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6月20日。

¹⁴⁹ 國軍裝備與陣地如楊樹浦的機關槍陣地，《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9月15日，版4。平民抗日活動如京滬地區作家參加抗敵漫畫展覽，《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10月3日，版4。城鄉戰爭畫面有農村被轟炸後的情景，《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9月2日，版4。日軍照片如楊樹浦一帶登陸之部隊，《中央日報》，南京，1937年9月6日，版4。

片置於最後一版，且僅列出較具代表性之影像，反而有廣告性質之感。

在抗戰期間，要以刊登照片等平面影像為主的畫報或雜誌最具影像宣傳的代表性。如同 Susan Sontag 所言，報紙上的戰爭照片四周總是圍繞文字，而雜誌上多半會與其他影像並排，爭奪讀者的注意力。¹⁵⁰ 例如攝影師王小亭在日本轟炸上海火車站南站以後，便以十六釐米的電影底片記錄下一名嬰兒在鐵道旁嚎啕大哭的片段，不過當時王小亭並不隨軍，而是屬於美國國際新聞社 (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¹⁵¹ 駐中國記者，故該捲底片後來未在中國公開，而是輾轉刊登於《生活》(Life) 雜誌上，並因此獲得美國群眾的注意。¹⁵²

中國本身對淞滬會戰的影像紀錄與公開，則歸功於上海發達的報刊業。會戰開打前後，上海地區所出版的畫報、畫刊數量多達十餘家，甚至因應會戰而另出特刊，如《良友畫報》便出版《良友戰事畫刊》，共出版十九期；《抗敵畫報》出版十四期；也有《戰時畫報》，屬於《中華圖畫雜誌》號外刊，一共二十期；《新生畫報》的號外刊物《抗日畫報》，多達二十五期；《辛報戰情畫刊》則有五期。眾多畫報、畫刊的照片來源，多半是與特約記者合作而取得所需素材。¹⁵³

以《戰時畫報》為例，第一期出版於 1937 年 9 月 19 日，封面是

¹⁵⁰ Susan Sontag 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頁 44。

¹⁵¹ 國際新聞社為美國報業巨頭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1863-1951) 於 1909 年創辦，目的是與自己的報紙聯合採訪新聞，1958 年被併入合眾國際社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另 Hearst 自十九世紀末投入報界以後，便有派記者前往戰地採訪的紀錄。參閱李瞻，《世界新聞史》，頁 661-662、700-703。

¹⁵² 趙雪波，《戰地記者述論》，頁 85-86。

¹⁵³ 唐與羣，〈從事攝影工作的回憶〉，《傳記文學》第 19 卷第 3 期，總 113 號 (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 年 9 月)，頁 69-70。

蔣中正的半身頭像，¹⁵⁴以突顯蔣在領導國家對日抗戰的重要性。內容則從蘆溝橋事變爆發以來的各戰區皆有涉略，圖片多是國軍集結狀況。與淞滬會戰相關之影像，是由空軍的作戰情形開始，以「我空軍之偉績 Our Aerial Victories」為題，分別介紹率先擊毀敵機的高志航以及擊落五架日機的樂以琴等空軍飛行員（下頁圖 3-3-1），以及空軍之陣容。《辛報戰情畫刊》出版較晚，第一期於 10 月 10 日雙十節當天出版，一半的內容以類似序文之概念，呼籲各方要「如孫元良將軍所示：我們一定要以赤血去洗滌國恥，起來！大家起來！」¹⁵⁵隨後亦聚焦上海地區，照片形式則與《戰時畫報》相仿。



圖 3-3-1：《戰時畫報》介紹空軍飛行員及其戰果。

資料來源：《戰時畫報》第 1 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9 月 19 日），頁 7。

¹⁵⁴ 《戰時畫報》第 1 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9 月 19 日）。

¹⁵⁵ 《辛報戰情畫刊》第 1 期（上海市：辛報編輯部，1937 年 10 月 10 日），頁 2。

《戰時畫報》同時也刊登 9 月 13 日國軍撤退至第一道防線後的淞滬會戰兩軍態勢圖，以及上海地區中外民眾避難狀況（圖 3-3-2），顯現淞滬會戰造成的動盪。



圖 3-3-2：《戰時畫報》以組圖呈現上海地區中外人士的避難情形。

資料來源：《戰時畫報》第 1 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9 月 19 日），

頁 17。

《戰時畫報》第二期，內容便幾乎著重於上海戰區，並以戰事最激烈的閘北為主。包含閘北國軍的佈署、裝備，與國軍奪得的日軍武器、日本國旗，以及後方由婦女為主的救護、慰勞行動之相關照片，都在呈現軍民一體，不但強化國軍在民眾內心的印象，也提升全民參與抗戰之形象，屬於較正面意義之宣傳。負面意義之照片則有寺廟、建設與民房被炸毀等內容（圖 3-3-3），但數量比例並不高。以第二期統計，十八頁當中，不動產設施遭毀的內容僅占兩頁，共六張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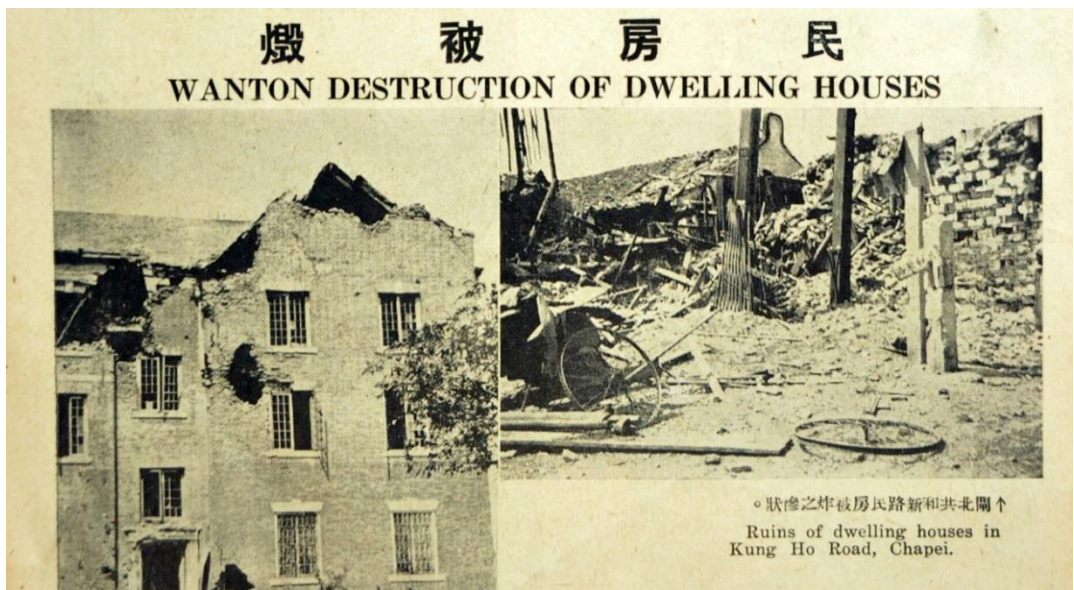


圖 3-3-3：《戰時畫報》呈現上海閘北地區民房被毀之情形。

資料來源：《戰時畫報》第 2 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9 月 23 日），

頁 14。

負面形式的宣傳不僅如此，對日軍的斥責、醜化與強調其戰鬥損失情形，隨著畫報出刊數量愈多，更顯得不遺餘力。當時為達宣傳目的，逕將被炸死的平民之慘狀置於畫報當中（圖 3-3-4）；並在強調空軍英勇之際，也不忘附上遭擊落之日本軍機，以示證明並加強宣傳。較為特殊的是，《戰時畫報》曾刊出日本飛行員斧田卯之助遭國軍擊落後，被繳獲的信函及其與妻子的獨照（下頁圖 3-3-5）。乍看之下較為突兀，實則藉此強調「日本青年，痛恨軍閥的心情」，而日本「黷武者驅其深惡戰爭之人民，暴屍異國，最後之必遭慘敗，何待贅言。」¹⁵⁶



圖 3-3-4：《戰時畫報》刊登平民遭砲擊身亡的慘狀。

資料來源：《戰時畫報》第 3 期（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9 月 23 日），頁 7。

¹⁵⁶ 《戰時畫報》第 3 期（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9 月 27 日），頁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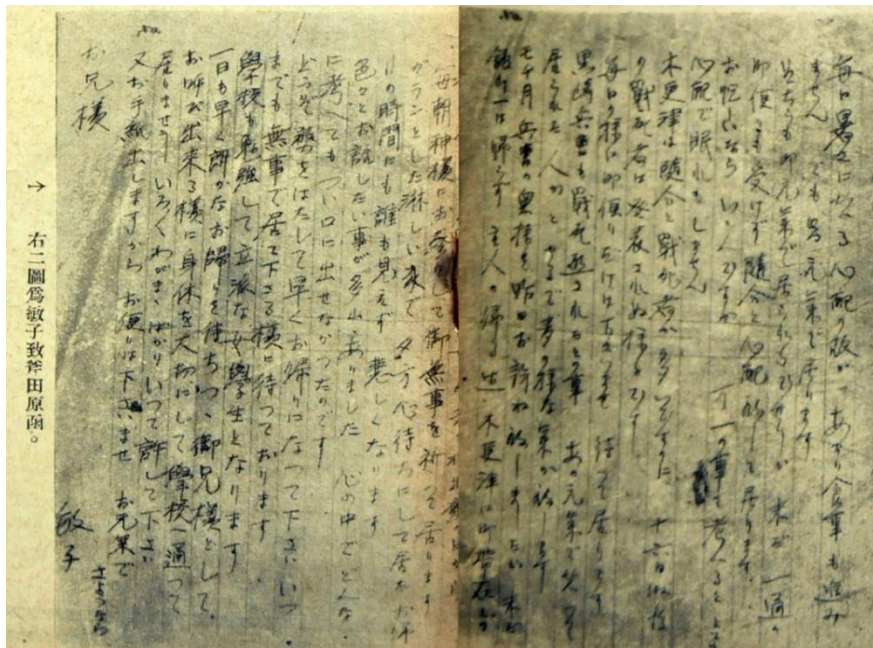


圖 3-3-5：《戰時畫報》刊登日本飛行員斧田卯之助其妻的信函。

資料來源：《戰時畫報》第 3 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9 月 23 日），頁 9-10。

大致上，《戰時畫報》與《辛報戰情畫刊》皆於第三期以後，刊載內容與形式已見定型。《戰時畫報》封面與封底以國軍將士最多，亦有女性角色如女童軍、¹⁵⁷女戰士，¹⁵⁸以黨政要員為封面的期數僅佔三期。¹⁵⁹內容方面，軍方照片以陸軍與空軍訓練、佈署與戰鬥成果最多；民眾照片則有後方照護、慰勞，以及房舍毀壞等。若有較特殊人士的活動或戰果，則另以專張照片刊登其姓名與說明，例如上海童星陳娟娟

¹⁵⁷ 《戰時畫報》第 20 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11 月 19 日）。

¹⁵⁸ 《戰時畫報》第 11 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10 月 28 日）。

¹⁵⁹ 蔣中正的封面分別為《戰時畫報》第 1 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9 月 19 日）、第 15 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11 月 7 日）；孫中山為封面的期數則為第 6 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10 月 9 日）。

慰問受傷官兵。¹⁶⁰從黨政人士於畫報中出現的頻率，在在顯示刻意淡化國民黨在抗戰中扮演的角色，而塑造「全民抗戰」的意義。至於《辛報戰情畫刊》則是有更多的藝文作品，如詩歌、短文與電影界的活動（圖 3-3-6），並對中共八路軍有簡短之介紹。¹⁶¹



圖 3-3-6：《辛報戰情畫刊》介紹電影界的募款活動。

資料來源：《辛報戰情畫刊》第 3 期（上海市：辛報編輯部，1937 年 10 月 24 日），頁 12。

不過以淞滬會戰而言，隨著 9 月中旬戰況漸不樂觀，畫報中有關上海地區的篇幅亦隨之減少，取而代之的是綏遠、廣東、香港等地的

¹⁶⁰ 《戰時畫報》第 4 期（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10 月 1 日），頁 15。

¹⁶¹ 《辛報戰情畫刊》第 4 期（上海市：辛報編輯部，1937 年 11 月 1 日），頁 12、18。

影像，以及更多上海後方補給、醫療、藝文活動與各區機關房舍的損毀情形，甚至直接以「晉戰專號」¹⁶²、「綏遠專號」¹⁶³，取代上海戰場的內容。迨國軍撤守上海以後，《戰時畫報》為安撫民心，在十八與十九期聯合刊以「為保衛大上海而負傷的英勇戰士」¹⁶⁴為封面下標題，內頁則有士兵舉槍凝視前方的照片，強調「一起來吧！全上海三百萬市民！加強組織、發揮力量，與前線浴血抗敵的將士，更緊密的聯合起來，不惜任何犧牲，來保衛我們的大上海！」¹⁶⁵編排漫天烽火の影像，也以「將中華民族鬱積了四十餘年の怒火，積成了一座爆發の火山」說明之（下頁圖 3-3-7）。整輯以淞滬會戰各戰線與敵後工作の情景為主軸，尤其四行倉庫保衛戰便在十八頁當中，共有三頁整の篇幅，不僅介紹四行倉庫保衛戰の背景，宣揚孤軍奮勇の氣概「千古不朽」¹⁶⁶，並附上謝晉元、楊瑞符の親筆字及信函，¹⁶⁷也有訪談楊惠敏の專文，將她的身家背景與獻旗過程描述得鉅細靡遺。¹⁶⁸其中一張照片，為平民隔著拒馬刺網遙望四行倉庫（下頁圖 3-3-8），在會戰告一段落之際，或有提倡軍民一心之用意。

¹⁶² 《戰時畫報》第 12、13 期合刊，晉戰專號（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10 月 30 日）。

¹⁶³ 《戰時畫報》第 16、17 期合刊，綏遠專號（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11 月 11 日）。

¹⁶⁴ 《戰時畫報》第 18、19 期合刊（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11 月 15 日）。

¹⁶⁵ 《戰時畫報》第 18、19 期合刊（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11 月 15 日），頁 2。

¹⁶⁶ 《戰時畫報》第 18、19 期合刊（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11 月 15 日），頁 10。

¹⁶⁷ 《戰時畫報》第 18、19 期合刊（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11 月 15 日），頁 9-10。

¹⁶⁸ 《戰時畫報》第 18、19 期合刊（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11 月 15 日），頁 15。



圖 3-3-7：《戰時畫報》刊登暗夜砲火下的開北。

資料來源：《戰時畫報》第 18、19 期合刊（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11 月 15 日），頁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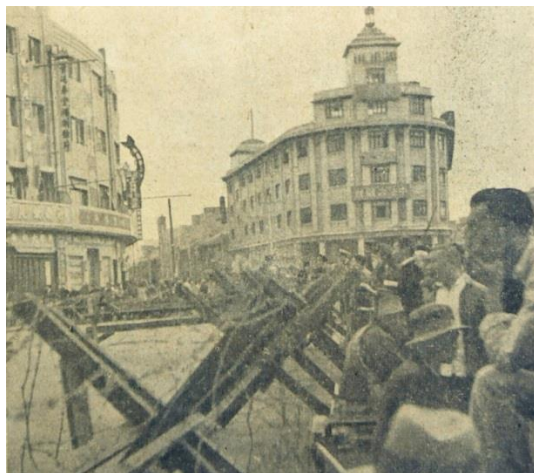


圖 3-3-8：《戰時畫報》登載民眾隔著拒馬遙望四行倉庫。

資料來源：《戰時畫報》第 18、19 期合刊（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 年 11 月 15 日），頁 9。

同一時期，日本也針對淞滬會戰出版畫報，大多是擷取新聞報紙的照片再予以出版，而非中國採取獨立發刊的形式。¹⁶⁹不過東京國際情報社《世界畫報》出版的特刊《世界畫報——日支大事變號》，則有更勝中國畫報、畫刊之勢，不但內容豐碩，每輯六十餘頁不等，以「勝利者」之姿分別介紹日軍在華的軍隊概況、新型武器，對中國方面軍情與民情亦有提及，另有北平、滿洲的建設情形，甚至介紹最新的愛國電影（下頁圖 3-3-9），而原本《世界日報》介紹全球各地風土民情的專欄也所保留。與其稱之為畫報，實則更像綜合性雜誌。¹⁷⁰其中針對淞滬會戰的專題，主要集中於《世界畫報——日支大事變號》第二輯，有空中俯拍空襲城市之大幅照片，以及海陸軍彼此聯合作戰的狀況。與中國的畫報、畫刊同樣強調自身軍隊的勇敢犧牲與豐碩的戰果。¹⁷¹

¹⁶⁹ 羅國儲，〈淞滬會戰的影像與實錄〉，收錄於劉維開主編，《影像近代中國》（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初版一刷），頁77-78。

¹⁷⁰ 日本對中國戰場相關之畫報有朝日新聞社編，《支那事變寫真全輯》（東京市：朝日新聞社，1937年）；朝日新聞社編，《支那事變畫報》（東京市：朝日新聞社，1937年至1938年）；陸軍畫報社編，《支那事變戰跡の刊》（東京市：陸軍畫報社，1939年）等。

¹⁷¹ 《世界畫報——日支大事變號》第2輯（東京：國際情報社，1937年10月1日），頁10-23。



圖 3-3-9：《世界畫報——日支大事變號》介紹日本最新的愛國電影。

資料來源：《世界畫報——日支大事變號》第 1 輯（東京：國際情報社，1937 年 9 月 1 日），頁 65。

總的來說，以《戰時畫報》、《辛報戰情畫刊》為主，並比較日本方面的畫報而分析淞滬會戰的照片宣傳，主要呈現下列現象：（一）雖然畫報內容刊登之照片、文字說明與各部隊所佔據之篇幅不同，然各地前線與後方活動之照片皆不偏廢，完整呈現「全民抗戰」；日本也強調陸、海軍聯合作戰的行動，對於重要的各軍司令與作戰行動，都配有一定的版面。（二）各部隊受刊登之照片與說明文字多不具編號，較為例外的僅有謝晉元一團有完整呈現，不過為了有效宣傳，軍官之肖像仍會完整地刊載其中。此現象日本亦然，如介紹負責上海戰事的海

軍第三艦隊司令官中將長谷川清(1883-1970)之照片與說明,是以「第〇艦隊司令長官として〇〇艦.....」為內文體例,而長谷川清在艦上手持望遠鏡的全身像則毫無保留以全頁版幅刊登。¹⁷²(三)中國的畫報、畫刊以「勝利」字眼加以標記,並針對單獨飛行員簡介者,多為空軍,其因與空軍通常有具體的轟炸與作戰目標,且易被察覺有關。相較於陸軍在城市內的作戰,除大部隊移防,否則進退不明顯,空軍在畫報上得以塑造抗敵成功的形象確實較為容易。(四)文字說明必定以中、英文並列呈現,不但滿足上海地區中外人士的需求,也更容易對外宣傳;而日本的畫報則均以日文顯現,主要針對國內進行戰爭宣傳。

至於紀錄片的播映,則相對較晚,但已有「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交織的現象。意即紀錄片不但喚起民眾的戰爭集體記憶,對於不曾經歷戰鬥過程的國內外人士而言,亦有塑造戰爭記憶的作用,因此符合文化記憶之定義。當時,動態影像的技術已有半個世紀左右的開展,各國紛紛認識到影像對宣傳的重要性,創作者也多半相信紀錄片有助於公共利益的增進,¹⁷³尤其戰爭時期最為明顯。中國、日本與其他紛紛在1939年以後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都有戰爭紀錄片的發展,使紀錄片進入「戰爭宣傳片時期」。¹⁷⁴早在1937年8月,黎民偉便在上海攝製《淞滬抗戰紀實》;¹⁷⁵然而上海淪陷後,一部分影界人士在租界區外籍住民協助下留在上海,另一些則在中共與其他愛國

¹⁷² 《世界畫報—日支大事變號》第2輯(東京:國際情報社,1937年10月1日),頁19。

¹⁷³ 李道明,《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頁233。

¹⁷⁴ 李道明,《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頁48。

¹⁷⁵ 黎民偉,《黎民偉日記》(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出版年份不詳),頁24。

團體協助下南下香港，¹⁷⁶也因此在此之後的抗戰日子裡，較少流傳由中國所出版有關淞滬會戰的紀錄片，大多製片要待美國參戰後才出現。其中美國於 1942 至 1945 年出版一系列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Why We Fight*），大多由 Frank Capra（1897-1991）執導，一共七集，目的是要強化美國人是為了自由與正義而戰，一度被認為是戰爭時期乃至於戰後，對於戰爭描述最為詳盡也具代表性的系列紀錄片。¹⁷⁷其中 1944 年公開放映的第六集為《中國戰事》（*The Battle of China*），片長六十二分鐘又十六秒，當中簡略地介紹美國盟友中國的歷史背景與文化，再拉向日本為何意圖侵略中國，以及各場戰役的經過。¹⁷⁸其中關於淞滬會戰之內容，有來自日本的空襲與砲擊畫面，亦有中國民眾逃難、國軍移防之鏡頭等，¹⁷⁹時間約有六分多鐘。主要以當時美國的觀點看待戰爭，認為日本在上海之作戰是一場全新的作戰形態，即蓄意地恐怖屠殺。¹⁸⁰日方也有關於淞滬會戰之紀錄。1939 年，日本海軍省公開《支那事變海軍作戰記錄》（支那事變海軍作戰記錄），全長六十六分鐘，以海軍角度講述蘆溝橋事變到淞滬會戰 8 月底以前，日本陸戰隊與航空隊之作戰情形，並對淞滬會戰中日雙方的戰力損失有所

¹⁷⁶ 魏時煜，《東西方電影》，頁 285。

¹⁷⁷ Richard Barsam, “Why We Fight”, Richard Glatzer、John Raeburn, Frank Capra: *The Man and His Film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pp. 149-154.

¹⁷⁸ The War Department Army Pictorial Service, “The Battle of China”, *Why We Fight* (1944). 收於《二次大戰的真相》第 7 集（臺北市：輝洪開發，1995 年）。

¹⁷⁹ The War Department Army Pictorial Service, “The Battle of China”, *Why We Fight* (1944). 收於《二次大戰的真相》第 7 集，17 分 55 秒至 24 分 41 秒。

¹⁸⁰ The War Department Army Pictorial Service, “The Battle of China”, *Why We Fight* (1944). 收於《二次大戰的真相》第 7 集，24 分 9 秒至 24 分 27 秒。

統計。181

目前所得知公開放映時間的淞滬會戰紀錄片，多集中於 1938 年以後，這在歷史記憶之觀點當中，呼應了「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的概念。原先各方紛紛出現記錄的動機，無論是以記錄日軍暴行為出發點，或記錄日本「皇軍」的偉大勝利，或記者們單純就時事新聞角度拍下畫面，無論如何彼此都有想要記憶的意願。接著承載著這些有形的記錄與無形的回憶，再經由編整成為一部非完整時間序列，而是安排、配置過的動靜態影像，¹⁸²於是經歷過這場會戰者便有了「集體記憶」。相對的，對大多數的美國人及其他同屬同盟國成員的人們而言，1937 年的中國戰場是一段陌生的過往，為了對內外宣傳參戰的正當性，並讓民眾瞭解美國參戰前後的概況，於是透過紀錄片，將確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傳遞至不曾經歷的人民身上，「文化記憶」遂已然形成。

儘管戰爭影像多透過重建、搬演，真實性受到存疑，¹⁸³但就宣傳角度來看，畫報或紀錄片無非都是要訴諸民族情感，以提升前方將士與後方人民在戰場內外的心理素質。除了遠距離或從空中拍攝砲擊、空襲，其餘畫面看不到兩軍交戰的場景，也不會有戰場上官兵死傷的畫面，更看不出士兵是否真的正處於交戰中，抑或純粹演示作戰動作供記錄者拍下。再者，中國在淞滬會戰後期的畫報，以及美國出版的紀錄片，為了強化對日本暴行的印象，於是將百姓死傷的場景致入版

¹⁸¹ 《支那事變海軍作戰記錄》（東京市：海軍省，1939），9 分 35 秒至 9 分 45 秒。

¹⁸² Susan Sontag 認為直到美國參加越戰後，才有立即性之影像。參閱 Susan Sontag 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頁 65-69。

¹⁸³ 李道明，《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頁 235。

頁或影格當中，不過不易看出傷亡的嚴重程度，或多或少能減少民眾對戰事的恐懼，對於戰時宣傳仍具有幫助。如同 Susan Sontag 所認為，戰爭影像塑造出的並非回憶，而是某種約定，尤其是一些代表性的影像，例如八百壯士在四行倉庫的照片，是綜合眾人認同的重要意念，能夠挑起思想與情感，¹⁸⁴它們的真實與否，並非戰爭期間所欲追求的部分。

¹⁸⁴ Susan Sontag 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頁 99。

第四章 淞滬會戰的文化記憶形塑

第一節 英雄形象之塑造與宣傳

淞滬會戰屬於對日抗戰的初期戰役，歷時三個多月，卻成為抗日戰爭戰史當中，較受廣泛認知的會戰。主要原因是淞滬會戰粉碎了日本「三月亡華」的美夢，對於講述中日關係當中我國的形象，具有相當正面的提升作用。往後我國凡是抗戰有關之文本，幾乎都會有淞滬會戰造就的「八百壯士」、「女童軍獻旗」、「空軍高志航」等事蹟，與「台兒莊大捷」以及抗戰後期「修築滇緬公路」等英勇故事相提並論。張世瑛曾提出表彰抗戰忠烈的意義，以為是藉由紀念烈士而塑造「服從、守紀、對國家無私的犧牲與奉獻等種種新國民典範」，同時也透過選擇性地呈現英雄烈士，達到塑造全民歷史記憶之目的。¹

進一步來看，塑造並宣傳戰爭英雄事蹟與國民政府面臨的局勢有極大的關係，且能從時間分期切入闡述。研究戰後臺灣藝文發展的研究者，往往將國民政府在臺的藝文發展及策略分為三期或四期。音樂史研究如周世文認為有「反攻復國期」（1950 至 1971 年）、「全面發展期」（1971 至 1987 年）、「解嚴民主期」（1988 年以降）；²而陳明宏則是分「整軍經武期」（1940 至 1950 年代）、「鞏固民主憲政期」（1950 至 1970 年代）、「防衛固守期」（1960 至 1980 年代）、「民主開放期」（1980

¹ 張世瑛，〈國民政府對抗戰忠烈事蹟的調查與紀念〉，《國史館館刊》第 26 期（臺北市：國史館，2010 年 12 月），頁 9-10。

² 周世文，〈國軍一九五〇年後音樂發展史概述〉（臺北市：東吳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2005 年），頁 88-91。

至 2000 年代) 等四期。³電影史研究有李天鐸約略概分光復後 (1945 至 1950 年代)、威權時代 (1950-1990 年代) 及威權時代以降 (1990 年代以後);⁴盧非易倒是依據不同期間的經濟、政治與外交狀況, 配合藝術思潮, 將戰後臺灣電影史分為「動盪的一年」(1949 年)、「重整的年代」(1950 至 1954 年)、「起步的準備」(1955 至 1959 年)、「成長的開始」(1960 至 1964 年)、「黃金年代」(1965 至 1969 年)、「處變不驚」(1970 至 1974 年)、「騷動與迷惑」(1975 至 1979 年)、「寫史的年代」(1980 至 1984 年)、「新時代開始」(1985 至 1989 年)、高貴而寂寞 (1990 至 1994 年)。⁵

不過若從執政黨與政府的角度來看, 戰爭記憶的形塑必須拉長至抗戰時期, 整體黨國的宣傳背景與施行方式會更為鮮明, 故依「敵人」、「統治對象」與「對日關係」的不同分為四個時期:

第一時期為對日抗戰期間, 在面對日軍步步進逼、國軍節節敗退的情勢下, 需要有壯烈的英雄事蹟來穩定軍心與民心, 此時因民眾大多具備抗戰經驗, 因此此時的戰爭記憶屬於「集體記憶」; 戰爭後期因加入同盟國作戰行列, 許多淞滬會戰的影像透過紀錄片與電影受到外國人士的接收, 形成初步的「文化記憶」概念。相關論述於上一章已有所提及。抗戰結束後, 國共內戰旋即開打, 此時抗日英雄的故事便

³ 陳明宏,〈復興崗五十年「音的風景」之回顧〉,《復興崗學報》第 73 期(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 2001 年 12 月),頁 326-328。

⁴ 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臺北縣:視覺傳播藝術學會, 1997 年 10 月初版),頁 31-232。

⁵ 盧非易,《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臺北市:遠流出版, 1998 年 12 月初版一刷),頁 33-392。

逐漸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年 1949（民國 38）的「太原五百完人」⁶事蹟，以及「古寧頭戰役」等足以振奮士氣的「反共」事蹟。

第二時期是戰後接收臺灣以降至 1960 年左右，此期與「省籍」及「思想改造」有關。臺灣在清領時期，族群以「漳州人」、「泉州人」與「客家人」三類為主；日本統治時期，官方資料除了改以「本島人」⁷與「內地人」區分日本人與臺灣人，並對臺灣人以「祖籍」，如福建、廣東為區分，也因此漸消弭原有漢人的族群劃分界線。⁸ 1945（民國 34）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後，在人口籍貫分類上延續日本的戶口調查

⁶ 太原五百完人係指 1949 年 4 月份的太原戰役，時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及閻錫山堂妹閻慧卿等人堅持不投降，於省政府辦公廳服毒自殺。閻慧卿自戕前，梁敦厚代筆寫下〈閻慧卿至閻錫山的絕命電〉，電文一句「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受到重視，似乎有意模仿西漢初年的「田橫五百壯士」，於日後在臺灣被大肆紀念。先有 1950 年於臺北市劍潭山（今圓山大飯店下方）興建紀念建築群，翌年落成後，蔣中正親自主祭，閻錫山撰寫碑文，孫立人則為招魂塚題詞。同時也將事蹟編入小學國語課本當中，並於 1979 年山西文獻社編印《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週年紀念》，不但更加詳述事蹟，亦將五百人名單及其極冠與頭銜等資料皆列上。然而，中共於 1988 年的《山西文史資料》針對五百人詳加查證，確認特警處首要特務份子四十六人自殺，其餘名單則有失蹤、戰死、病死、被處死、非於太原自殺者，或是將本名、別號視為兩人者，甚至查無此人者等。民國 1996 年起，此段事蹟不再編入教科書；2009 年臺北市政府以太原五百完人不符史實但仍具歷史教育意義，核定為歷史建築；2011 年不再編列祭祀預算，並立碑說明史實。參閱：山西文獻社編，《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週年紀念》（臺北市：山西文獻社，1979 年初版）；劉存善整理，〈「太原五百完人」調查報告〉，《山西文史資料》第 60 輯（太原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8 年 11 月），頁 120-159；管仁健，〈臺灣小學課本裡的「太原五百完人」〉，刊登於「你不知道的臺灣（管仁健／著）」（2005 年 12 月 31 日）：<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281895765>（2015 年 1 月 27 日點閱）；〈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紀事〉，收錄於「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臺灣碑碣拓片」：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document_ink_detail.hpg&xml_id=0000000390（2015 年 1 月 27 日點閱）；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太原五百完人紀念建築群」為本市歷史建築〉，《臺北市政府公報》98 年夏字第 7 期：http://twinfo.ncl.edu.tw/tiqry/hypage.cgi?HYPAGE=search/show_gaztext.hpg&sysid=E0947175（2015 年 1 月 27 日點閱）。

⁷ 本島人包含漢人與臺灣原住民。

⁸ 王甫昌，〈光復後臺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76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3 年），頁 50-51。

分類方式，同時也以統治中國大陸的「省份本位」習慣，依照省籍來分類，於是「臺灣省」的閩南人、客家人等形成「本省人」，而除了日治時期便在臺長住的外省籍人士外，陸續於 1945 至 1951（民國 40）年隨行政長官公署及軍隊而來的軍亦被歸類為「外省人」。⁹

儘管外省人人數比例上不如本省人，¹⁰主要由外省人組織的政府卻有意強調臺灣的文化與人口皆源自中國，意即「臺灣人就是中國人」，¹¹教育與文化方針延續大陸時期大中華式的民族精神教育，藉此抵除本省人的日本文化。意即不僅要推行「中國化」，更要推動「臺灣化」與「現代化」，藉此「去殖民地化」與「去日本化」。¹²於是由國民黨

⁹ 依據 1956（民國 45）年的戶口普查，問卷直接列出「本省籍」、「外省籍」，反映出臺灣省政府延續日本與中華民國政府在大陸時期戶口調查的「省份本位」慣性。如戶籍設在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地區者，便屬於外省籍。參閱王甫昌，〈由中國省籍到臺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臺灣社會學》第 9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5 年 6 月），頁 75。

¹⁰ 根據年 1943（民國 32、日昭和 18）日本的統計資料，當時全臺灣共 6585841 人，本省籍 6133867 人，外省籍 52020 人，外省籍人數約佔全臺 0.008%。1956（民國 41）年戰後臺灣省首次戶籍調查，全臺共 9367611 人，外省籍人口比例約佔 10%，其中約有 640000 人乃戰後到民國三十二年之後遷入，並以來自浙江等沿海省份之比例最高。在臺灣的分布多分布於都市，約 40% 外省籍人口居住於臺北周遭地區，其中今大安區更有 60% 以上的外省人口，基隆、臺中、臺南與高雄的某些區域也有 20% 以上的外省人比例。不過這項數據因 1970 年以前的戶口調查將現役軍人（軍籍）與一般民眾（民籍）分開計算，因此比例可能低估。根據林勝偉的研究，他較認同另一名學者李棟明估計光復後淨遷入臺的外省籍人口至少有 91 萬人的說法。參閱：林勝偉，〈「戶籍」與「兵籍」：戰後臺灣人口統計二元之成因及其影響〉，發表於「臺灣人口學會 2004 年年會暨人口、家庭與國民健康政策回顧及展望研討會」（臺北市：臺灣人口學會，2004 年 4 月），頁 9；溫在弘、黃清琦、葉高華編著，《臺灣戰後人口普查地圖集（1956-2010）》（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2012 年 12 月初版），頁 49-50。〈歷年全省戶口（人口）〉，收錄於「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1894-1945）：臺灣五十年來統計戶口調查」：<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twstatistic50/POP/Mt49-2.xls>（2014 年 12 月 20 日點閱）。

¹¹ 王甫昌，〈由中國省籍到臺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臺灣社會學》第 9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5 年 6 月），頁 79-80。

¹² 徐秀慧，〈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1945~1949）〉（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 年），頁 84-95。

領導的國民政府是三民主義唯一的繼承者之思維，便被帶到教育體制當中，非但要使臺灣民眾認識「本國」史地文化，也要強化民眾對中華民國政府的認同感。¹³而時間距離最近，也最易訴諸民族精神的歷史事件即為對日抗戰，抗日英雄事蹟遂浮上臺灣文教層面。儘管此時的抗戰事蹟，主要目的是用來襯托「愛國」意識，而非對民眾與學子施行反日宣傳，但已使戰爭記憶開始正式進入「文化記憶」階段。

當然，戰後初期的藝文政策並非全然受到臺灣本省人的接受。當時的文化界一度意圖使「全球化」與「中國化」並存，但二二八事件後因不少藝文人士遭迫害，使創作轉向社會功能，對於當權者進行批判，更因此從「殖民文化」中找到臺灣自身的價值。青年學生也是不分省籍，創辦社團或進行各類演出，以宣揚對社會的關懷，有助於文藝青年們彼此團結，直到「四六事件」以後，才讓這批青年不再鋒芒畢露。¹⁴這段期間，國民黨進行改造，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延續先前的中宣部職責，負責一切電影、電視、報章雜誌等文化界事務，旗下又有中央社、中央日報、中華日報、香港時報、中央電影公司、中央廣播電台與正中書局等黨營文化事業，對於戰爭記憶的塑造有相當程度的作用。

第三時期則為 1960 年代後期以降，政府再度透過文本與儀式，重談對日抗戰，起因來自內外情勢的轉變。國內方面，1975（民國 64）

¹³ 黃若惠，〈國民中學歷史課程之探討——以目前本國歷史為例〉，《歷史教育》第 6 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0 年 6 月），頁 2。

¹⁴ 朱宜琪，〈戰後初期臺灣知識青年文藝活動研究——以省立師院及臺大為範圍〉（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頁 289-290。

年中華民國失去三十年來的反共領袖——蔣中正，儘管蔣經國的接班態勢現之甚早，在黨、政繼承上並無顯著的障礙，不過仍促使政府必須謹慎地面對，而在宣傳力度上有所增進。對外情勢則是先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文化大革命，蔣中正趁勢在臺灣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同時教育部亦成立文化局，主掌圖書出版、電影事業、廣播電視及文藝工作。¹⁵透過國家與政黨的力量，除了延續反共方針，也勢必宣揚中國數千年的文化，以突顯國民黨統治的中華民國才是中國大陸領土與政權唯一的繼承者。此外，當時美國為了與蘇聯抗衡，開始積極拉攏因中蘇邊界問題而與蘇聯交惡的中共。此舉導致國際之間的骨牌效應，陸續與中共展開交流；迨 1971（民國 60）年我國退出聯合國後，各國更是陸續與我斷交，儘管美國國會在 1979（民國 68）年中美斷交後通過《臺灣關係法》，不過受到這近十年之間外交情勢的困局，中華民國對外形同孤立，部分臺灣民眾甚至移民國外，以尋求安定之生活。¹⁶其中對於抗戰文化記憶型塑至關重要者，為 1972（民國 61）年的中日斷交，以及後來 1980 年代日本現代史教科書的爭議，都促成中華民國政府將抗日英雄事蹟以電影、展覽與圖錄等形式，重新建構「反日」形象，並與「愛國」意識並立於國人面前。整體來說，這個時期確立臺灣被「中國化」——被視為中國的一部分、「正統化」

¹⁵ 張宏維，〈由文建會預算結構變化看臺灣文化政策演變〉，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4。

¹⁶ 陳靜瑜，〈臺僑在美國的生根與發展〉，發表於「2008 年僑務發展之外交意涵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2008 年 5 月 15 日）：<http://www.ntnu.edu.tw/deacd/conference/paper/2-1.pdf>（2015 年 1 月 28 日點閱），頁 2。

——保存中國文化傳統智慧、「工具化」——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與「典範化」——未來統一中國後發展政治及經濟的模範。¹⁷

第四時期為 1980 年代末以降，當時在臺灣已醞釀十餘年的「臺灣意識」，在解嚴以後高唱論調，使「中國認同」為象徵意義的對日抗戰記憶面臨相當大的衝擊。加上經歷過淞滬會戰等抗戰戰役的軍官士兵在此時已漸凋零，相關的紀念活動也不再頻繁，皆促使戰爭記憶主動或被迫地改變。

四個時期所面臨的態勢不盡相同，淞滬會戰的抗日英雄卻因為因應國民共同的敵人，而成為了尋求認同的利器。至少到蔣經國逝世以前，國家都不曾放棄在社會內部尋找、建構敵人的想法，¹⁸於是將某段歷史具體化而達成目的，便是宣傳工作的要項之一。尤其有學者認為，對於過去記憶的喚醒或形塑，透過「人物」會遠比透過「事件」來得更為簡便，因為後者往往涉及諸多人、事、物，並有複雜的因果邏輯關係，¹⁹因此英雄形象的建立，對於歷史記憶之塑造位居關鍵角色。

另一方面，即使國民黨在臺灣仍延續抗戰前與抗戰時的新聞管制措施。如 1949(民國 38)年 8 月公布《臺灣省新聞雜誌資本限制辦法》、1950(民國 39)年 3 月公布《臺灣省戒嚴期間新聞雜誌管制辦法》、

¹⁷ 出自石計生等著，《意識形態與臺灣教科書》(臺北市：前衛出版，1993 年初版)，引自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市：聯經出版，2012 年 12 月初版)，頁 283。

¹⁸ 姚人多，〈社會是戰爭的延續：日治時期以來臺灣「國家的敵人」與「治安戲碼」的歷史考察〉，收錄於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 336-337。

¹⁹ 王明珂，〈臺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5 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1997 年 6 月)，頁 174。

並限制辦報登記、用紙數量、發行張數與報紙售價等，²⁰在此之下，加以臺灣各項資源尚未穩固，黨營的《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及省營的《新生報》都只能勉強維持開支平衡；中央社則是動用教育部補助今，轉由國民黨支付，方能負擔它遍佈全球的事業版圖之財務。²¹不過當時的環境除了八二三砲戰等兩岸軍事衝突外，已無大規模知會戰，因此立即性的戰時新聞及其宣傳效能便轉為輔助角色，主要對戰爭英雄的宣傳與塑造工作，落入教育及藝文工作當中。四行倉庫保衛戰與八百壯士、楊惠敏的種種事蹟，主要體現於教科書、民間出版物；高志航為軸心的空軍形象，則有空軍志航基地、嘉義志航國小為紀念象徵。二者則不約而同的，又在 1970 年年代由中央電影股份有限公司拍攝劇情片電影，藉著抗戰歷史，強化國人的愛國意識。

紀念英雄烈士除了有助於「軍人武德典範」的提升，²²更呼應學者所述，當國家面臨外患，便會喚醒、重組或塑造歷史記憶，而滿足當前的需求。²³不過必須強調的是，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於中國抑或中華民國政府在臺灣時期之發展，二者並沒有特別明顯的分野。如同前章所述，戰爭期間有關淞滬會戰的紀錄片已然有文化記憶的特徵，除了對沒有抗戰經驗的外國人宣傳之外，也是對不曾經歷過該場會戰

²⁰ 廖郁毓，〈臺灣報業的生產科技、勞動過程與性別分工〉（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頁32-34。

²¹ 劉志祥，〈我國國家通訊社設置之探討——中央通訊社改制研究〉（臺北縣：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頁56-57。

²² 張世瑛，〈國民政府對抗戰忠烈事蹟的調查與紀念〉，《國史館館刊》第26期（臺北市：國史館，2010年12月），頁31-35。

²³ 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以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第91期（臺北市：合志文化，1993年11月），頁42。

的軍民之記憶塑造；戰後臺灣的省籍族群組成，則更是反應集體記憶與文化記憶的並列，惟面對數量較龐大的臺灣人與來臺外省人第二、三代，執政者將集體記憶透過文本編纂、影像攝製與重現，以及實施紀念等方式，提升為文化記憶，進而訴諸愛國意識與國家認同的現象較為顯著。而原本保有集體記憶的群體，一部分以回憶錄、口述訪談的形式，作為國家塑造文化記憶的素材；另一部分則鮮少論及而讓記憶隨時間消逝。

以下兩節便分就抗戰結束後，歷史文本、紀念活動以及視聽作品如何闡述淞滬會戰與英雄事蹟進行討論。

第二節 歷史文本中的淞滬會戰

淞滬會戰以後，「八一三」、「淞滬會戰」、「八百壯士」等詞彙，成為了具有全面抗戰象徵意義的代名詞。往後的抗戰歲月，每到 8 月 13 日前後，報刊都會以一定的篇幅報導，以避免民眾遺忘，甚至在戰爭期間，便以淞滬會戰強化上海精神與經濟堡壘的角色，並呼籲上海市民與各界同胞要團結一致、互助互濟。²⁴同時為了強化八百壯士與謝晉元的形象，在 1938 年的《八百壯士》電影中，即選用〈歌八百壯士〉為主題曲，除了紀念國軍英勇事蹟，也藉以激勵國人士氣：

²⁴ 〈八一三兩週年紀念日，蔣委員長發表告上海同胞書〉，《中央日報》，重慶，1939 年 8 月 13 日，版 2。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你看那民族英雄謝團長。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你看那八百壯士孤軍奮鬥首戰場。
四方都是砲火，四方都是豺狼，
寧戰死，不退讓；
寧戰死，不投降。
我們的國旗在重圍中飄盪、飄盪、飄盪、飄盪！
八百壯士一條心，十萬強敵不敢擋，
我們的行動偉烈，我們的氣節豪壯。
同胞們起來，同胞們起來，
快快趕上戰場，拿八百壯士作榜樣。
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中國不會亡！
不會亡，不會亡，不會亡！²⁵

此曲在戰時亦被稱為〈中國不會亡〉，除了有紀念八百壯士之用意，亦將忠勇壯烈精神提升至全中國的戰鬥意志。後因抗戰勝利，篤定中國不會滅亡，故更名〈中國一定強〉，歌曲內「不會亡」也一律改為「一定強」；同時，歌曲被編列至軍歌內，並在 1975 年再度成為中央電影公司拍攝的電影《八百壯士》之插曲。實際上，抗戰歌曲可考者多達二、三千首，不過大多歌曲因作曲、作詞者留在中國，因此在臺灣遭

²⁵庄福祥編，《抗戰救亡歌曲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 年 10 月），頁 138-140。

到禁唱，而僅成為當代人的集體記憶。²⁶〈歌八百壯士〉得以流傳，並從集體記憶提升至文化記憶，則顯見媒體與宣傳的重要性。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謝晉元與八百壯士的形象仍偶見於報刊。²⁷另在 1962（民國 51）年 10 月 29 日，以楊惠敏獻旗二十五週年為由，訪問楊惠敏本人，她提到當前國家再度面臨困境，因而要效法八百壯士之精神，²⁸使八百壯士作為抗日活動的象徵，再度與國家形塑與認同結合，並喚起一部份民眾對抗戰的記憶。

楊惠敏的獻旗事蹟，在抗戰期間，便已於媒體與政府的安排下，成為抗日史上的傳奇故事之一。後來又被選為童軍代表赴美參加「第二屆世界青年和平大會」，除了與華僑相見，又繼續遊歷歐洲，時間長達近兩年。²⁹楊惠敏在自述當中大多僅提及在歐美的所見所聞，或自己上臺演說之內容，不過根據紀錄，楊惠敏等青年代表團員在美國期間曾進行多次宣傳，並募得約兩千元，³⁰因此國民政府的確可能有意塑造一名英雄，藉以吸引國際人士之注意以及海外僑胞的愛國心。

為了強化經歷過抗戰人們的集體記憶，及塑造其他臺灣人民與戰後出生的青年學生，臺灣自戰後以來，有很長一段時間直接將女童軍

²⁶ 張瑞德，〈紀念與政治——臺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收錄於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縣：國史館，1998 年 12 月初版），頁 1099。

²⁷ 如張英超，〈七七悼英魂〉，收錄於〈中央軍事機關人士（十一）〉，《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27-003。

²⁸ 〈廿五年前八百壯士往事——楊惠敏談獻旗經過〉，《中央日報》，臺北市，1962 年 10 月 30 日，版 3。

²⁹ 楊惠敏，《八百壯士與我》（臺北市：博愛出版社，1979 年 7 月出版），頁 102-130。

³⁰ 〈往來函電（二十一）〉（1939 年 3 月 30 日），《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典藏號：008-010202-00021-008。

楊惠敏與八百壯士的故事做為課文內容。其意義與目的可由歷史教育對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來探討。有學者將歷史教育分為三個層面：正面意義是可以促進社會和諧；負面意義為經由納入（inclusion）與排除（exclusion）可反映或強化原先社會的支配關係；若從中性層面來看，則是以歷史的再現（representation）建構集體記憶，並提供對未來之想像（imagination），進而塑造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³¹ 李國祁也說，歷史教育得以激發人民國愛國、愛民族的情操，若透過聖賢典範的樹立，也能以此作為後人仿效的標準。³² 根據研究，民國以後的教科書已從地方或個人化，轉為少數版本壟斷，且其傳達的歷史意識愈加統一，顯示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時期，便以國家統治者之姿，藉由「一套框架，以規範國民的歷史記憶。」³³ 而如前節所述，在臺灣比例佔少數的外省人擁有絕對多數的統治權，且認為國民黨「因臺澎之割讓而成立，以廢除不平等條約，還我河山，恢復主權為宗旨。因此，本黨之革命與臺澎之重光，歷史淵源實脈絡一貫。」³⁴ 其歷史教育自然會以中國的發展為脈絡，以特定群體的集體記憶，塑造以中國為主體的國家認同。³⁵

³¹ 施正鋒，〈歷史教育、轉型教育及民族認同〉，收錄於施正鋒主編，《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各國歷史教育》（臺北市：臺灣國際研究學會，2014年7月初版），頁18-19。

³² 李國祁，〈歷史教育的目的與使命〉，《近代中國》第3期（臺北市：近代中國雜誌社），頁44。

³³ 王汎森，〈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思想》第9期（臺北市：聯經出版，2008年5月），頁129-132。

³⁴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主編，《三民主義建設成果專輯——總論：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市：正中書局，1984年出版），頁1。

³⁵ 周亞慧，〈國（初）中歷史教科書中晚清（1840-1911）救亡運動教材之編寫〉（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頁2。

抗戰勝利，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之初，教育政策是去除臺灣人皇民化的思想及語言，除了有說話教材教導國小學童學習「國語」，又以中國歷史、國文、地理與三民主義等科，加強反共抗俄、民族精神與三民主義教育。³⁶配合 1948（民國 37）年 9 月訂定的「小學國語課程標準」，國民學校的「說話範本」很快地出現〈八百壯士的故事〉一文，簡述淞滬會戰並介紹八百壯士與楊惠敏：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全面對日抗戰開始。英勇的國軍，在上海跟日本軍隊打了三個月，到了十二月二十日以後，大場失守，浦東陷落，整個上海幾乎完全被日軍包圍了。同時，我軍的「消耗戰」目的已經達到，就決定轉移陣地，退出淞滬。由八十八師的團附謝晉元，率領了八百壯士，堅守要地，掩護我軍向西撤退。他們完成了任務以後，在十二月二十八日的半夜裡，開進了四行倉庫。他們在倉庫四週建築了防禦工事；……忙了半夜，才弄停當。二十九日正午，敵軍開始搜索前進。……經過三小時的激戰，消滅了七八十個敵人。從此敵軍就不敢隨便來攻了。敵軍雖然無法攻破四行倉庫，可是我們的八百壯士被敵軍四面包圍，也不能跟外邊通消息，取得接濟，那時候有一個女童軍楊惠敏，願意冒險擔任交通工作。她在槍林彈雨中游水過去，帶去了電話機根電線，並且給壯士們傳遞物品

³⁶ 許南號，《臺灣教育史》（臺北市：師大書苑，1992 年 1 月初版），頁 145。〈國民學校說話範本編輯要旨〉，張希文等編著，《國民學校說話範本》第九冊（臺北市：中心出版社，1958 年 7 月六版）。

和書信。有一天，天才亮，四行倉庫的七層樓頂上，升起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迎著剛出來的太陽，隨風飄展。這面國旗是從哪裏來的呢？就是由那位女童軍獻給八百壯士的。³⁷

此時的國語教材，因是奉教育部規定，再配合臺灣省教育改革方案而推行，因此雖然教科書閱讀對象為臺灣的小學生，但對於戰事的描述仍相當仔細。不過也可以發現史實的謬誤，如大場失守及四行倉庫保衛戰開打皆在 1937 年 10 月發生，課文則誤植為 12 月。其他細節的潤飾，包含日軍被殲滅數十人後不敢來犯，以及楊惠敏渡水獻物資等，則是刻意將保衛戰的英勇形象更為提升。

1949 年政府播遷來臺後，臺灣正式成為反共復國的重要基地。1952 年，臺灣省分別公布「國民學校各科教材調整說明」與「修訂中學公民、國文、歷史、地理科課程標準」。一方面是因應當時教材是 1942（民國 31）年所公布之課程標準，內容主要以中國大陸為中心。再者，為依照「臺灣省各級學校加強民族精神教育實施綱要」以及「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以達成反共建國之目的，³⁸於是重訂針對臺灣地區的課程大綱。當時的國民學校社會課本編列方式，是建立中國與臺灣本為一體的史觀，故將鄭成功治臺、日治時期臺灣的抗日活動以

³⁷ 張希文等編著，《國民學校說話範本》第九冊，頁 18-20。

³⁸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主編，《國民學校各科教材調整說明》（臺北市：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2 年 11 月出版），頁 1。教育部修訂課程標準委員會修訂，《修訂中學公民、國文、歷史、地理科課程標準》（臺北市：教育部，1952 年出版），頁 1。

及臺灣光復作為教材。³⁹淞滬會戰則在歷史課文裡出現：

日軍在北戰場上，沿著北方各主要鐵路發動攻擊，雙方展開激戰，我軍為分散敵人兵力，在八月十三日又和敵軍展開淞滬之戰。日軍猛攻上海，先後多次增援，有次增援，我軍守住陣地，寸土寸血，有死無退。敵人有優越的武器，我軍有堅強的鬥志，血戰達三個月，粉碎了敵人想以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幻夢。⁴⁰

另外附上一張圖及說明：「『八一三』戰役中，我守軍堅守蘇州河邊的四行倉庫，國旗飄揚屋頂，八百壯士鬥志高昂，英勇的精神感動全國和全世界。」⁴¹國語課本也在二年級上學期的第十課以〈國旗的故事〉介紹：「……那時候，有八百國軍守著一個陣地。敵人攻過來，國軍就把敵人打退。國內國外的人，都佩服國軍的勇敢。有一天，一個小學生跑到陣地裡，送給國軍一面國旗，對他們說：『勇敢的國軍，你們打退了敵人，全國同胞都佩服你們。』八百國軍都很受感動，就把這面國旗掛起來。」⁴²綜合戰後臺灣由中華民國政府頒布的第一次課程標準，顯見當時的國民學校主要在培養學童愛國的思想與抗戰時國軍英

³⁹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學校社會課本》第四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7年修訂暫用本）。

⁴⁰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學校歷史課本》高級第四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8年1月暫用版），頁42。

⁴¹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學校歷史課本》高級第四冊，頁42。

⁴²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學校國語課本》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6年8月修訂暫用本），頁25。

勇的形象。

初中以上的淞滬會戰相關描述，則集中於歷史課本。對上海一仗，強調當時發佈〈自衛抗戰聲明書〉，抗戰是在維護中國的主權，「更為世界和平與正義而奮鬥」。⁴³又對於會戰後期國軍撤退之因有所交代，亦敘述三個月的堅守足以大挫日本的銳氣。⁴⁴高中歷史略增敘述，教育學生淞滬會戰是全面抗戰的開始，「全國軍民，聞義赴難，萬眾一心，有死無退。陣地化為灰燼，軍心仍如鐵石。海軍封鎖長江，空軍猛炸敵陣敵艦，痛擊來襲敵機，造成輝煌戰果。」⁴⁵初中與高中，皆未將八百壯士等淞滬會戰的英雄形象編於課文當中，主要在於根據史實與部分刪修的感性文字建立抗戰的記憶，而非透過英雄角色塑造。

1968（民國 57）年九年國民教育正式啟動後，原先國民學校對八百壯士的課文改置於四年級上學期的國語課本，並略為修改：「那時候，有八百名國軍守住四行倉庫，不讓敵人過來。敵人就用大砲向國軍轟擊。許多國軍被敵人的砲彈炸死了，還有許多國軍被砲火打傷了。倉庫上的國旗，也被敵人打掉了。這時候，有一個女學生，帶了一面國旗，冒著生命危險跑進倉庫，把這面國旗送給國軍。當這面國旗在倉庫上面飄揚的時候，整個上海市想起了一片歡呼的聲音。」⁴⁶此版本的課文不但直接說出四行倉庫，亦用「女學生」取代「小學生」送國

⁴³ 中學標準教科書歷史科編輯委員會，《中學標準教科書初中歷史》第四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4年12月初版），頁55-56。

⁴⁴ 中學標準教科書歷史科編輯委員會，《中學標準教科書初中歷史》第四冊，頁56。

⁴⁵ 中學標準教科書歷史科編輯委員會，《中學標準教科書高中歷史》第二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9年12月七版），頁160。

⁴⁶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學校國語課本》第五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0年8月初版），頁29-30。

旗，已較接近史實。同時，可以發現課文中仍是以四行倉庫保衛戰為配角，將主角「國旗」襯托出來，以便培養小學生的愛國心。國中的課文未有太多變化，高中同樣也維持論述直到 1970 年代初。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是臺灣眾多劇變的年代。先有各國陸續與我斷交，而後國內又有「回歸鄉土」的文化潮流，促使民眾對中華民國認同的遲疑，並興起對臺灣本土的認同。為了重振中國意識，於是出現「中國史觀的臺灣史研究」，也藉由「尋根」的風潮，推動「愛鄉更愛國」的宣傳口號。⁴⁷此年代所編纂的教科書，高中課本為了配合國民中學首屆畢業生，於是修訂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對淞滬會戰有所增減之部分為「敵人海陸增援達二十餘萬，我軍仍能奮戰三月之久」。⁴⁸國小社會課本依據 1975 年修訂的課程大綱，為延續中國與臺灣的一體性並塑造學童對中華民族的認同及愛國情操，⁴⁹促使抗戰史篇幅大增，將抗戰各分期詳盡列表，淞滬會戰的部分則強調貢獻在於粉碎日本人「三月亡華」的美夢。⁵⁰另也有私人編纂，針對童軍的教材，將四行倉庫保衛戰與高志航的故事列入其中，雖詳述八百壯士戰鬥與深陷上海孤島的經過，以及高志航從 1937 年 8 月 14 日率領空軍首開殲敵紀錄至其殉職，然細節有日期上的錯誤與史料證據不確實之弊。⁵¹而

⁴⁷ 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市：聯經出版，2012 年 12 月初版），頁 281-282。

⁴⁸ 國立編譯館主編，《高級中學歷史》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77 年 8 月六版），頁 94。

⁴⁹ 戴寶村，〈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收錄於李鴻禧等著，《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 年 5 月初版），頁 119。

⁵⁰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小學社會》第十一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82 年 8 月試用本），頁 75-77。

⁵¹ 日期錯誤如將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時間錯植為八月底。空軍及八百壯士各自

國中歷史課綱修於 1972 年，淞滬會戰篇幅略有減少，不過八百壯士的形象首次現於中學課文：

日寇以攻占了北平和天津，又於同年八月十三日侵略上海，我守軍浴血抗戰，固守三個多月，擊斃十萬多人。尤其以八百孤軍死守「四行倉庫」凜冽千古，可歌可泣。我們不僅是為民族的自衛而抗戰，更為世界和平與正義而奮鬥。⁵²

綜觀 1970 年代與淞滬會戰有關之課文，算得上戰史最為詳盡的一批課程大綱，然蔣中正將整編的各師級單位陸續投入淞滬會戰，軍力未必比日軍差的史實卻未說明，而是繼續呈現國軍初期勢雖弱，意志力卻堅強的精神。

1980 年代以降，此時代對於淞滬會戰英雄形象的提及，已從國小、國中，提升至高中階段。國小對抗戰史的敘述不再強烈，僅以蘆溝橋事變為抗戰起頭，接著很快地描寫抗戰勝利的過程。國中歷史課本開始圖文並茂，不但多了對空軍、海軍分別對日機、日艦作戰有功的敘述，亦有一張國旗飄揚的四行倉庫建築正面照。另外，又將臺灣

的作戰經過亦有擅自潤飾修改之處，如日軍登四行倉庫，謝晉元反應機警而殺敵；八一四空戰之細節則將擊落日機之功勞全歸功於高志航一人身上。參閱〈八百壯士死守四行(謝晉元孤軍抗敵)〉、〈空軍戰神(高志航百戰百勝)〉，收錄於潘精華編著，劉麗娟繕寫，《民族正氣——中國幼童軍民族精神教育教材》(臺中市：臺中市忠明國民小學幼童軍第四十九團幼女童軍第三團，1975 年)，無頁碼。

⁵²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歷史科教科書》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78 年 8 月五版)，頁 96-97。

的抗日與光復過程併入同一章，呈現強烈的中國史觀。⁵³高中課本至此時也有「十四日，我空軍出動，戰果輝煌，是為空軍節的由來」，以及「十一月九日，我軍撤出上海，留團長謝晉元率八百孤軍堅守四行倉庫。旋撤往公共租界，與敵周旋三年餘」共兩段增述。⁵⁴其中對空軍的敘述為第一次，卻也是高中課本的最後一次。

1979 年美麗島事件促使國內有重大的政治改變，政治反對運動更為激進，「臺灣意識」遂大為興起。⁵⁵1986 年民主進步黨成立，翌年臺灣解嚴，政治自由化的結果更使臺灣民族主義快速發展。雖然中國史觀為主體的論述仍存在於教育體制當中，然而日後臺灣直接將八百壯士、空軍高志航等淞滬會戰英雄故事單獨敘述者，偏向幼教讀物，⁵⁶且為了迎合讀者的心智年齡，多非依據史實，而是以電影、電視等媒體與政府形塑的戲劇化故事為敘述主體。1990 年代臺灣經濟繁榮、社會穩固，國際與兩岸局勢也有所轉變，歷史或社會教科書大抵維持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各項建設，並將臺灣視為反共復興基地。⁵⁷雖然仍是希望建立人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進一步保有對「大中國」的想像，但

⁵³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89 年 8 月三版），頁 102-115。

⁵⁴ 國立編譯館主編，《高級中學歷史教科書》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1 年 8 月七版），頁 140-141。

⁵⁵ 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市：聯經出版，2012 年 12 月初版），頁 292。王甫昌，〈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第 8 卷第 2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12 月），頁 166。

⁵⁶ 如〈八百壯士〉，收錄於《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有聲書）》（臺北市：小魯出版社，1993 年 3 月出版）。

⁵⁷ 何思暉、何怡君，〈高中歷史教科書統編本的「臺灣書寫」（1953-1998）〉，《教育研究月刊》第 217 期（臺北市：高等教育文化事業，2012 年 5 月 1 日出版），頁 47-48。

過往強調民族精神的英雄事蹟卻因此被沖淡，尤其臺灣本土化運動更使課綱、課程注重臺灣本身的鄉土知識。⁵⁸高中當時已無「國編版」課本，各家出版社進入數家爭鳴的局面，對於抗戰的陳述分析方式及其內容多寡皆有不同，如三民書局版本僅說明淞滬會戰毀滅日本三月亡華的構想；⁵⁹南一書局版本更是直接捨棄淞滬會戰等初期抗戰的部分，僅說明抗戰前因與抗戰後期的內外局勢。⁶⁰國中方面，由國立編譯館最後一次主編的課本，乃依據 1994（民國 83）年 10 月修訂、發布，並於 1998（民國 87）年實施的「國民中學歷史課程標準」，當中仍持續敘述四行倉庫保衛戰：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日軍在淞滬發動戰爭，國軍堅守三個多月，打破了日軍一週之內攻佔上海、三個月亡華的迷夢。旺盛的抗戰意志，更締造了四行倉庫「八百壯士」可歌可泣的故事。⁶¹

經社會與政治變遷之衝擊，國立編譯館版本的歷史教科書，對於 1990 年代臺灣青年、青少年的歷史記憶與認同，已有了微妙的變化。

⁵⁸ 王明珂，〈臺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5 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1997 年 6 月），頁 151。

⁵⁹ 許雪姬、劉妮玲著，《高級中學歷史》下冊（臺北市：三民書局，2000 年 2 月），頁 152。

⁶⁰ 林能士主編，《高級中學歷史》下冊（臺南市：南一書局，2005 年 2 月修訂版），頁 142-148。

⁶¹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歷史》第二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2 年 1 月正式本三版），頁 113、115。

王明珂曾針對國中一年級與高中二年級學生進行抽樣「社會記憶測驗」，其中「請寫出十個本國歷史上曾發生的重要事件」一題，列舉當中與對日抗戰有關之統計項目，國中一年級學生共 1292 人，選擇「七七事變」有 746 次，排名第一，佔 57.7%；「八年抗戰」為 185 次，排名第九，佔 14.3%；「南京大屠殺」則有 86 次，排名第十三，佔 6.7%。而高中二年級學生共 1124 人，選擇「七七事變」有 404 次，排名第四，佔 35.9%；「八年抗戰」為 279 次，排名第七，佔 24.8%；「南京大屠殺」則有 227 次，排名第十一，佔 20.2%。可以發現其中七七蘆溝橋事變，從國一到高二認定為重要事件的比例大幅降低；即使以省籍區分統計，外省籍國一學生對上述三個事件的選擇次數比例分別為排名第一 60.8%、排名第六 17.7%、排名第九 13.7%，高二外省籍學生的結果為排名第八 25.9%、排名第十 24.1%，南京大屠殺的選項則未排名在前二十。（下頁表 4-2-1）王明珂認為這是反映臺灣社會因本土化風氣所導致對於某些歷史事件的失憶。⁶²

⁶² 王明珂，〈臺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5 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1997 年 6 月），頁 157-159、168。

表 4-2-1：國、高中學生認定對日抗戰相關事件於本國史重要性之比例⁶³

	國	高	中
淞滬會戰	57.7%	14.3%	6.7%
南京大屠殺	35.9%	24.8%	20.2%
廬山會議	60.8%	17.7%	13.7%
抗戰勝利	25.9%	24.1%	2

一般通俗歷史文本對淞滬會戰的編纂也呈現 1990 年代以前較多的趨勢，並以圖錄或回憶錄為主要素材。1947 年，曹聚仁與舒宗僑便出版《中國抗戰畫史》，係民間出版較早，亦較具系統的一部著作，不但試圖分析中日關係與戰爭過程，並在當時已將八路軍等中共部隊作戰之內容編列入內。由於舒宗僑在重慶曾編《聯合畫報》，蒐羅不少抗戰相關照片，而曹聚仁則從淞滬會戰開始便採訪多場戰役，新聞史料充備，使全書圖文並茂、廣受推崇。⁶⁴全書將淞滬會戰以 10 月份為界，分為前後兩期，詳述會戰過程，並在四行倉庫保衛戰部分，作結道：「這種不屈的精神，也是抗戰終於勝利的好註解。」⁶⁵而下一波抗戰文本

⁶³ 參閱王明珂，〈臺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5 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1997 年 6 月），頁 157、168 製表。

⁶⁴ 舒似茵，〈《中國抗戰畫史》再版回想〉，收錄於曹聚仁、舒宗僑編著，《中國抗戰畫史》（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 年 1 月 1 版 1 刷），頁 1-3，

⁶⁵ 曹聚仁、舒宗僑編著，《中國抗戰畫史》（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 年 1

的出版潮，則是 1970 年代因應愛國宣傳策略，英雄化的書籍出版不少，光是八百壯士有關之出版物，便至少有《八百壯士與謝晉元日記》⁶⁶、《八百壯士與我》⁶⁷兩本回憶性質之書籍，以及透過訪問楊惠敏或由八百壯士後裔提供史料而寫成的兩本《八百壯士》同名書籍，⁶⁸另也有一本圖錄《八百壯士畫史》⁶⁹。這些書籍的共通點，都是從八百壯士死守的過程，論及在公共租界孤軍營的生活。

1980 年代以後，則開始有較多更具史實參考價值的圖錄或專書出現。民間出版物有楊德鈞的《中國抗日戰爭大畫史》，不過內容與《中國抗戰畫史》幾無二異，可說全為抄襲而來。⁷⁰另外隸屬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簡稱「黨史會」）的近代中國出版社，亦先後有三本圖錄出版。第一本為有感於「日本當局又在愚弄他們的國民，要把那些不僅荼毒人類，而且也禍害了日本人的一段歷史塗抹竄改，甚至企圖勾銷」⁷¹，於是用「鐵證如山」為書名，蒐集大量影像進行編纂，但有關淞滬會戰之內容，僅有一張上海遭到空襲的照片，⁷²其餘主要

月 1 版 1 刷），頁 187。

⁶⁶ 上官百成編撰，《八百壯士與謝晉元日記》（臺北市：華新文化，1976 年 7 月出版）。

⁶⁷ 楊惠敏，《八百壯士與我》（臺北市：博愛出版社，1979 年 7 月出版）。

⁶⁸ 呂漢魂、盧克彰，《八百壯士》（臺北市：皇冠出版社，1976 年 12 月再版）。盧瑞海，《八百壯士》（臺北市：金川出版社，1976 年 7 月初版）。

⁶⁹ 虞任遠編，《八百壯士畫史》（臺北市：惠文出版社，1976 年 7 月出版）。

⁷⁰ 楊德鈞編著，《中國抗日戰爭大畫史》（臺北市：北開文化事業，1989 年 3 月 3 日）。

⁷¹ 秦孝儀，〈前言〉，收錄於近代中國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鐵證如山——日本軍閥侵華罪惡及匪偽破壞抗戰實錄》（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87 年 7 月增訂版），無頁碼。

⁷² 秦孝儀，〈前言〉，收錄於近代中國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鐵證如山——日本軍閥侵華罪惡及匪偽破壞抗戰實錄》（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87 年 7 月增訂版），頁 19。

針對日本在東北、臺灣等地的高壓統治與「漢奸」議題，最後再將中共於抗戰大後方「破壞」抗戰方針與成果的內附。另一本圖錄則較為緩和，主要是以蔣中正與國軍為中心，以蔣的手稿與各類國軍照片編纂，對淞滬會戰延續「長期抗戰」的宗旨，並以八百壯士的相關信函、照片收尾。⁷³第三本的讀者對象為日本人，旨在介紹孫中山在日本策畫革命，至蔣中正逝世後日本方面的紀念儀式，以圖錄形式講述中日雙方的淵源，故選材上較前一本更多保留：淞滬會戰的篇幅有中日兩方之將領，以及中國陸、空軍作戰畫面與四行倉庫保衛戰，對於上海市鎮的破壞已一張幾成廢墟的市景為代表。⁷⁴

1990 年代抗戰勝利五十週年之際，黨史會再編圖錄，一方面陳述「國軍擔當了正面主戰場的全部作戰任務，蒙受眾的犧牲」，以批評中共長期對國民政府建國工作與抗戰的貢獻；二方面述及中國人藉由抗戰「爭得了自信自尊」，並「使血肉相連的臺灣同胞，解除了日本人五十年的殖民統治，回到了中華民族的大家庭裡」。⁷⁵該本圖錄為國民黨抗戰出版圖錄之集大成，不但蒐羅大量照片，又不偏廢任何一場戰役與敵後工作；敘述上僅有照片的人、時、地、物，而避免主觀成見之論述，較具形塑與宣傳意義的詞彙僅有「堅守」、「奮勇」等。淞滬會戰與南京保衛戰、台兒莊戰役、崑崙關戰役等共同被編入「為民族

⁷³ 近代中國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苦心孤詣堅苦卓絕——先總統蔣公領導全民抗戰建國五十週年紀念特展圖錄》（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87年7月初版），頁62-69。

⁷⁴ 近代中國出版社編，《近百年來の中日關係図録》（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年份不詳），頁171-172。

⁷⁵ 李雲漢，〈中華民國戰爭圖錄序〉，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華民國戰爭圖錄》（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8月初版），頁8-13。

存亡而奮戰」主題內，且仍舊少不了四行倉庫保衛戰的部分，顯見民主改革以後的社會，依然冀求當年國軍的正面形象能傳於世。⁷⁶

相較於此，史學界對淞滬會戰的論文闡述，已有脫離民族與國家大義之勢，論述上也從作戰過程本身，延伸至軍、民的口述記錄，走向更多元的發展。尤以新文化史的興起，使學者不僅要深入軍事、政治以外的歷史，更要脫離文化上某一主流群體的思想，而透過庶民文化瞭解歷史。⁷⁷抗戰時的生活史、心態史便在 1990 年代後期獲得中國現代史學界的注意。⁷⁸然而同時，另一種以臺灣認同為主體的意識形態也大張旗鼓，中國戰場上的國軍形象顯然不是這派學者重視之焦點，而是挖掘過往在歷史文本被埋沒的「日籍臺灣兵」之史料，使之成為對抗中國認同的另一種歷史記憶；⁷⁹或是以文學視野，不歌頌英雄主義，而是對戰爭殘暴、荒誕的反思。⁸⁰無論何種表現，皆顯示臺灣族群、意識與文化的抬頭，並形成臺灣主體性與自主性。⁸¹

當時，淞滬會戰等單一會戰或戰役，在國家面臨政治與社會轉型時，已經大致轉而以「抗戰」的統一架構下進行論述，多半注意抗戰

⁷⁶ 李雲漢，〈中華民國戰爭圖錄序〉，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華民國戰爭圖錄》，頁 64-77。

⁷⁷ Roger Chartier 著，楊尹瑄譯，〈「新文化史」存在嗎？〉，《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 5 卷第 1 期，總第 9 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08 年 6 月），頁 201-211。

⁷⁸ 例如張瑞德，〈抗戰時期大後方工商業者的心態與行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7 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1999 年 6 月），頁 121-146。

⁷⁹ 例如李展平等著，《烽火歲月——臺灣人的戰時經驗》（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年 8 月 8 日）。

⁸⁰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臺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 期（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05 年 4 月），頁 82。

⁸¹ 劉阿榮，〈族群記憶與國家認同〉，「多元文化與族群和諧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父紀念館，2007 年 11 月 23-24 日。

前因後果、國民政府之建設與戰時的國共關係，撇除了對戰史的論述。對於過往塑造出的英雄、英雄形象，也開始備受檢視，透過官方的往來文電，以及報紙的記載，都可以證明四行倉庫保衛戰經過精心設計⁸²；上官志標之子上官百成、謝晉元次子謝繼民，與中國學者孫玉芹亦陸續對於楊惠敏獻旗事蹟進行解構，⁸³試圖擺脫時代造就的事蹟，而重新建構「真」的戰役經過。加上新的口碑史料或影片仍不斷推陳出新，如近年受訪自稱是八百壯士之一的厲鼎新，自白在倉庫內不能吃黃豆，於是將黃豆撒在地面，待日軍滑倒再對之射擊，又強調自己掩護楊惠敏進入倉庫，且為了避免日本以火力打下國旗，他率領該班弟兄不斷將國旗扶正，「屍體愈堆愈高，國旗才得以升起飄揚。」⁸⁴灑黃豆、掩護楊惠敏一事在過去所有口述資料及回憶錄未有人提及，而國軍士兵為了將國旗扶正而受日軍火力威脅一事，反倒與 1975 年的電影《八百壯士》的橋段雷同，⁸⁵但真實性究竟為何，只能透過當時報章雜誌與既有日記、回憶錄的紀載互為佐證。此現狀也無疑證明了戰爭集體記憶已隨時間而漸趨式微。

在既有的記憶斷裂以後，便由另一種記憶填補這塊空缺，於是擴大了臺灣與中國意識兩大論述，面對「中日戰爭」與「大東亞戰爭」，

⁸²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臺北市：麥田出版，1997年初版），頁 118-125。

⁸³ 〈歷史翻案：四行倉庫楊惠敏冒死送國旗，走小路非渡河〉，《NOW news 今日新聞》：<http://www.nownews.com/2009/04/06/327-2433091.htm>（2012年12月22日點閱）；謝繼民，《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北京市：團結出版社，2010年7月1版1刷），頁 81-94；孫玉芹，〈楊惠敏向「四行孤軍」獻旗事件考〉，《蘭台世界》第 19 期（瀋陽市：蘭台世界雜誌社，2010年10月），頁 61-62。

⁸⁴ 〈「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在臺僅剩厲鼎新一人〉，《NOW news 今日新聞》：<http://www.nownews.com/2006/08/21/329-1980670.htm>（2013年1月2日點閱）。

⁸⁵ 中央電影公司：《八百壯士》，1976年，第 1 時 26 分 50 秒至 1 時 28 分 48 秒。

或「抗戰勝利」與「終戰」之別充滿歧見而難以對話。2000（民國 89）年臺灣首次政黨輪替後，國家認同對象之問題更是甚囂塵上，國旗、國號與八百壯士等愛國故事，已然成為歷史記憶與認同的核心議題。⁸⁶且經 2008（民國 97）年國家第二次政黨輪替，此種無法，或不願對話的意識形態仍舊持續著。一派以政府機關為首的論述，強調「沒有抗戰勝利，就沒有臺灣光復，臺灣就無法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也不可能重回中華民國版圖。」藉以強調「對日抗戰是由中華民國政府領導的歷史事實。」⁸⁷另一派則堅持不得使用「光復」一詞，主張抗戰勝利非多數國人共同的歷史記憶，要求政府應審視歷史事實，重構以臺灣為政治共同體的新國家史。⁸⁸綜觀臺灣民主化後的戰爭記憶，抗戰本身固然成為「中國人」的國族認同，而「臺灣人」則藉由抗戰提供「反作用力」，瓦解同質性（homogeneous），建立屬於自己的國族論述。⁸⁹

歷史、政治學界及民間臺灣認同意識的抬頭，對 1937 至 1945 年的戰爭史有新的詮釋，或多或少影響了基層教育。在世紀之交，教育部推動「九年一貫課程」，國中的歷史科與地理、公民合併為「社會領域」，主要培養學生以「臺灣為立足點，放眼中國、亞洲和世界，才能

⁸⁶ 江蓋世，〈認同臺灣不必太悲觀〉，《中國時報》，臺北，2003 年 5 月 28 日，版 A15。

⁸⁷ 馬英九，〈總統序〉，邵銘煌撰文，廖登枝總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周年特展專輯》（南投市：臺灣省政府，2011 年 9 月初版），頁 4。

⁸⁸ 臺左維新，〈「光復」不是多數臺灣人的共同記憶〉，《蘋果日報》，臺北市：2014 年 9 月 4 日，引自「蘋果日報——即時論壇」：

http://m.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904/463865/?utm_source=FB&utm_medium=MWeb_Share&utm_campaign=http%253A%252F%252F（2014 年 9 月 5 日點閱）。

⁸⁹ 藍適齊，〈可悲傷性，「戰爭之框」與臺籍戰犯〉，收錄於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頁 420-421。

啟發「全球化思維、在地化實踐」的行動力。因此，「基本內容的設計，係依區域（area）為課程組織的核心，探討在臺灣、中國和世界等不同區域，在古代、近代和現代等不同時間脈絡中的人群所形成的政治體制、社會制度和風貌，並以人類社會及全球環境的永續發展為學習主軸。」⁹⁰雖然在單元學習目標當中，仍強調國民政府在北伐後到抗戰爆發之間的「十年建設」，以及對日抗戰的發展，不過由於教科書的編纂工作正式脫離國立編譯館，於是也同 1990 年代以降的高中課本一樣，對抗戰敘述之多寡依版本而有不同。有的在正文僅說淞滬會戰壞了日方侵略中國的大計，並補充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以及國民政府利用淞滬會暫遷物資到內陸，奠定持久抗戰的基礎。⁹¹另有正文僅陳述日本耗費三個月攻下上海，但補充八一四空軍節的由來。⁹²高中課本方面，2005 年修訂之大綱，有版本將對日抗戰歸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於蘆溝橋事件以後的各場會戰或捷報皆未提及；⁹³另有版本持續編排對日抗戰之內容，⁹⁴儘管整體篇幅已銳減，但仍能體會意識形態的抗衡。

2008 年中華民國二度政黨輪替，歷史教科書之編纂有些微妙的變

⁹⁰ 〈社會學習領域七至九年級基本內容〉，收錄於「國民教育社群網——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http://teach.eje.edu.tw/data/files/20150120/social-1.doc>（2014 年 10 月 14 日點閱）。

⁹¹ 仁林文化編，《國中社會》第三冊（臺中市：仁林文化，2003 年 6 月出版），頁 5。

⁹² 王秋原、吳圳義、林有土主編，《國民中學社會》第四冊（臺南市：南一書局，2005 年 2 月初版），頁 119。

⁹³ 金仕起、李明仁、劉季倫、李福鐘編著，《歷史》第二冊（臺北市：三民書局，2007 年 2 月初版一刷），頁 188。

⁹⁴ 黃春木主編，《歷史》第二冊（臺北縣：龍騰文化，2007 年 1 月一版一刷），頁 210-211。

化。國中變化不算大，對抗戰的論述還是採取九年一貫的課程模式，避免戰役過程壓縮文化與建設層面之篇幅，其中「康軒文教」是唯一採用四行倉庫之照片，而說明「上海國軍堅守四行倉庫」。⁹⁵看得出當時八百壯士之英雄形象，已不再是主流。2011 年高中再修訂之課綱課文，對日抗戰的敘述則顯然增量，尤其詳載抗戰的分期，有 1980 至 1990 年代高中同單元課文之勢。⁹⁶顯然當本土化運動形成對臺灣青少年形成「歷史記憶」與社會認同之際，政府仍有意透過教育，意圖在「臺灣認同」與「中國認同」⁹⁷的矛盾衝突上，尋求中國認同的立足機會。然而淞滬會戰的敘述至此已大致定調為「破壞日本三月亡華之夢」，及使國民政府得「以空間換取時間」，不再有國軍英勇戰鬥。

英雄形象退出課本，除了有助於讓文化史層面的史實有發展空間，也顯見透過英雄角色塑造戰爭記憶已不再是受重視的方向。不過集體記憶可能被壓抑，卻很難完全被消滅，因此臺灣史觀的流行，只能說是對「大中國霸權思想的顛覆」，卻並非意味中國史觀的消逝。⁹⁸既有的中國史觀，當前仍於某處醞釀等待時機，或正在轉型為其他模式。尤其「臺灣正處於在一個澎湃激盪的國族建構過程中，各方勢力對於

⁹⁵ 江筱婷等編，《國中社會課本》第四冊（新北市：康軒文化，2013 年 2 月初版），頁 128。

⁹⁶ 劉景輝、高明士主編，《歷史》第三冊（新北市：翰林出版，2013 年 8 月初版），頁 34-41。王仲孚、孫若怡主編，《歷史》第三冊（新北市：康熹文化，2013 年 8 月初版），頁 26-31。

⁹⁷ 王明珂，〈臺灣與中國的歷史記憶與失憶〉，《歷史月刊》第 105 期（臺北市：歷史智庫出版，1996 年 10 月），頁 34-40。

⁹⁸ 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頁 321。李廣均，〈社群、民族國家和集體記憶——一九九五年臺北市「終戰事件」的初步思考〉，《社會文化學報》第 4 期（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1997 年 5 月），頁 267。

國族、國家認同各有迥異的期待，因此歷史記憶和歷史詮釋，自然成為必爭的戰場。」⁹⁹原有的中國認同，自然不可能會欣然地退出。如報章雜誌仍偶爾出現來自民間的投稿，希望喚起人民對八百壯士等抗日英雄的記憶。¹⁰⁰

中共方面，由於政治環境因素，及抗日紀念論述一向以官方為主，尤其「平型關大捷」幾乎是他們對抗戰唯一的集體記憶，¹⁰¹並強調日本侵華史實與日軍暴行。¹⁰²直至改革開放後，才陸續出現對於淞滬會戰，乃至八百壯士與四行倉庫的記載，同時大量地對參與保衛戰的官兵進行口述訪談，¹⁰³甚至在近期還將謝晉元編入抗日英烈之列。¹⁰⁴基礎教育上，中共原先對於國民政府領導的「國軍抗日史」不多加論述，僅強調在共軍在抗戰中的貢獻及南京大屠殺當中日本人的殘暴。不過為了配合「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擴大訴諸愛國主義之精神，¹⁰⁵於是課本教材對抗戰的安排，強調中國是反法西斯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論述國共兩黨之合作及其分別在正面與敵後戰場的貢獻，¹⁰⁶內

⁹⁹ 周婉筠，〈對當前歷史研究與歷史教學的幾點看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7 期（臺北市：世新大學臺灣社會研究國際中心，2005 年 3 月），頁 252。

¹⁰⁰ 丘秀芷，〈誰歌八百壯士〉，《聯合報》，臺北，2005 年 4 月 24 日，版 E7。

¹⁰¹ 翟志成，〈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1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年 3 月），頁 133。

¹⁰² 張瑞德，〈紀念與政治——臺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收錄於張玉法主編，《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119。

¹⁰³ 章世鴻，〈謝晉元與八百抗日壯士〉，《人民日報》，北京，1985 年 8 月 15 日，版 4；〈淞滬戰役：八百壯士浴血奮戰〉，《人民日報》，北京，2005 年 9 月 3 日，版 7。

¹⁰⁴ 〈國民革命軍陸抗日英烈，死守四行倉庫謝晉元入冊〉，《聯合報》，臺北，2014 年 9 月 2 日，版 A12。

¹⁰⁵ 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組織編，《義務教育歷史與社會課程標準解讀：2011 年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 2 月 1 版 1 刷），頁 98。

¹⁰⁶ 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組織編，《義務教育歷史與社會課程標

容雖仍以中共八路軍的立場說明，因此並未有部隊投入參戰的淞滬會戰敘述便較少，僅說明會戰促使全面抗戰的開展，並影響民族團結，但對國軍在蘆溝橋事變與台兒莊戰役之經歷卻已有所增述。¹⁰⁷必須注意的是，中共的目的仍希望從抗戰激發愛國意識，甚至訴諸民眾應「認識當前實現國共兩黨的三次合作，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必要性與緊迫性」¹⁰⁸。

中共對抗日戰爭的文本闡述，除了因應世界局勢的變動與兩岸關係的進程外，國內數十年來的「反日」思潮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1972 年中共與日本建交，又於 1978 年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此後日本不但實施對中共政府的貸款，雙邊政府高層亦頻繁往來，甚至有 1992 年明仁天皇訪問中共之例。1995 年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明確地對發起戰爭表達歉意，並認為日中關係應該持續和平進展。未幾，日本政府針對中共進行核試驗而凍結對中共的貸款援助；翌年，日本右翼團體登釣魚台（尖閣諸島），¹⁰⁹開始激化中共的反日情緒，也讓雙邊的蜜月期畫下句點。接著，當日本於 2005 年公開一部由扶桑社出版的《新歷史教科書》（新しい歴史教科書），內容對中日戰爭的態度顯得曖昧不明，中國各地出現大規模的反日遊行；2012 年，再因為日本推動釣

準解讀：2011 年版》，頁 157。

¹⁰⁷ 朱漢國主編，《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八年級上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5 月 2 版 3 刷），頁 91-98。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必修）中國現代史》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年 11 月 2 版 8 刷），頁 26-29。

¹⁰⁸ 全國政協文學和學習委員會編，《八一三淞滬抗戰親歷記》（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 年 1 月 1 版 1 刷），頁 2。

¹⁰⁹ 〈中日雙邊關係〉，刊登於「中國共產黨新聞」：

<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5567233.html>（2015 年 3 月 28 日點閱）。

魚台國有化，¹¹⁰導致中共民間示威再起。在反日思潮下，民間也出版了一些對日抗戰相關書籍，當中一本《罪證——日軍鏡頭裡的侵華紀錄》為了強調證據，於是編採日本戰時《支那事變畫報》、《支那事變寫真集》與《大東亞聖戰海軍作戰寫真集》刊登之照片，¹¹¹重新建構讀者對抗日戰爭的記憶。

從上述可知，對於淞滬會戰等抗日戰爭記憶再形塑，依據國家各時期政治、社會、經濟、外交情勢，其動機會有所不同。中華民國政府主要在灌輸人民臺灣、中國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及後來面臨外交困境之局勢下，展開以對日抗戰塑造愛國意識之論述，當中更以八百壯士等英雄形象的顯例強化意識。對照兩岸，中華人民共和國則是針對日本政府在處理領土與歷史論述上的歧異，才將抗日戰爭作為事例之一，大舉反日旗幟。相同的是，雙方政府都在歷史文本或紀念儀式中，將「中華民族」之精神與國家認同置於核心。可以說，戰爭的文化記憶形塑過程，仍舊依賴著民族大義，藉以弭平各種迥異的國家認同觀點。不過當非官方的論述愈獲得支持之際，以舊有官方為主的民族與國家認同架構，便會面臨嚴峻的挑戰，此現象在臺灣已然成形，而中共則大體維持在反對日本軍國主義與強調日軍暴行的官方論述。下一節，將再從影視作品分析戰後對淞滬會戰的詮釋與記憶形塑。

¹¹⁰ 童倩，〈石原稱與中國開戰促使野田購島〉，刊登於「BBC 中文網——國際新聞」：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10/121013_japan_china_diaoyu.shtml（2015年3月28日點閱）。

¹¹¹ 李榮惠編，《罪證——日軍鏡頭裡的侵華紀錄》（北京：中央文獻社，2002年7月1版1刷）。

第三節 影視作品與紀念標誌中的淞滬會戰

日本投降之初，中國各地因國軍受降、接收的時間有別，慶祝、紀念活動因地而異，臺灣亦有民眾自發性地在街上慶賀。國民黨為凝聚社會力量，藉此主導或擴大慶祝活動，¹¹²例如 1946 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宣傳處曾合辦「第二次世界大戰新聞照片展覽」，然而內容針對的是歐亞各戰場，以及日本與臺灣遭轟炸與受降等事件，¹¹³淞滬會戰並未很明確地出現在戰後的影視作品及紀念展覽當中。而臺灣後來有關淞滬會戰英雄事蹟之紀念物，除謝晉元在戰時便已入首都及各地忠烈祠，¹¹⁴高志航亦於臺灣受人祀禮遇。另尚有桃園中壢的晉元路、臺東空軍志航基地與嘉義志航國民小學等建設被賦予紀念性。

而交通部郵政總局（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自大陸時期便常因應時事或重要人物發行紀念郵票；即使隨中央政府播遷來臺，配合各中樞機構發行郵票之情形仍相當常見，如 1955 年明訂 9 月 3 日的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改為軍人節後，郵政總局在該年以及 1964 年的第十屆與 1974 年的第二十屆軍人節發行紀念郵票。¹¹⁵1970 年代以後的國內外局勢變化，加上紀念抗戰勝利暨臺灣光復三十週年，郵政總局遂

¹¹² 林桶法，〈抗戰勝利紀念的活動與詮釋——九三軍人節的觀察〉，《近代中國》第 163 期（臺北市：近代中國雜誌社，2005 年 12 月），頁 120-122。

¹¹³ 廖文碩，〈寓教於覽——戰後臺灣展覽活動與「臺灣省博覽會」（1945-1948）〉，《臺大文史哲學報》（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編輯委員會，2011 年 5 月），頁 186。

¹¹⁴ 〈殉難將領入祀忠烈祠〉（1942 年 12 月 21 日），《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1-036130-0001。

¹¹⁵ 「紀 043 軍人節紀念郵票」（1955）、「紀 098 第 10 屆軍人節紀念郵票」（1964）、「紀 153 第 20 屆軍人節紀念郵票」（1974），臺北市：郵政博物館藏。

發行一套六張的「抗日英烈像郵票」，其中與淞滬會戰相關的英雄人物，便有謝晉元、高志航與閻海文，¹¹⁶或多或少也能呼應淞滬會戰的幾位烈士形象，對於國家形象及認同的重要性。

但整體而言，對於抗戰英雄烈士事蹟的紀念，在兩岸對峙之情形下，一直被埋沒，郵政總局雖曾於 1985 年抗戰勝利四十週年、1987 年七七抗戰五十週年及 1995 年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又分別發行郵票，但已轉為強調全民共同抵禦外侮以及臺灣光復之重要性，個別人物的介紹僅止於蔣中正。¹¹⁷中國也因長期以來，對抗日戰史之敘述偏向否定國軍與國民政府在「正面戰場」之作為，使紀念淞滬會戰英雄的標誌物，如四行倉庫建築直到近年才被上海市列為抗日紀念地，規劃為文化園區，並進行翻修，擴建為抗日紀念館。¹¹⁸而上海市金山區則規劃金山衛的日軍登陸地修建金山衛歷史文化公園及抗日史料館。¹¹⁹另對外開放較早的「淞滬抗戰紀念館」，則是陳列一二八與八一三淞滬會戰的諸多影像、美術作品，受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為「上海市青少年教

¹¹⁶ 除謝晉元、高志航與閻海文之外，另三張郵票則分別是張自忠、薩師俊及戴安瀾。「特 116 抗日英烈像郵票」(1975)，臺北市：郵政博物館藏。

¹¹⁷ 「紀 210 慶祝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四十週年紀念郵票」(1985)、「紀 221 七七抗戰 50 週年紀念郵票」(1987)、「紀 255 慶祝抗戰勝利臺灣光復 50 週年紀念郵票」，臺北市：郵政博物館藏。

¹¹⁸ 連雋偉，〈抗戰紀念地四行倉庫將變身文化園區〉，《中國時報》，臺北，2011 年 5 月 15 日，版 A12。連雋偉，〈迎接抗戰 70 周年，上海四行倉庫擴建抗日紀念館〉，《中國時報》，臺北，2014 年 7 月 15 日，版 A15。〈上海紀念抗戰 70 周年，四行倉庫翻修 9 月開放〉，《經濟日報》，新北市，2015 年 3 月 14 日，版 A11。

¹¹⁹ 王霖，〈上海抗戰紀念場館集中整修，多角度呈現抗戰歷史〉，收錄於「東風網／歷史」：

<http://big5.eastday.com:82/gate/big5/history.eastday.com/h/20140918/u1a8347680.html>
(2015 年 6 月 12 日點閱)。

育基地」與「上海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¹²⁰這些負有紀念意義的「象徵符號」，即是將原本屬於精神狀態性的集體記憶，提升至有空間、物質意涵的文化記憶，用來喚醒與提示人民，被認為「符合人類傳播溝通訊息意涵簡潔的特性」。¹²¹至於影視作品中的淞滬會戰與英雄故事，則是另一種具體的傳播方式。

電影或電視劇等影視作品，是結合「看與聽」的藝術，觀眾最先感受到的是透過畫面與音響傳達具象化的視聽語言型態。¹²²也有學者提到，至今不會有人否認電影從生產過程到集體消費，乃至於後續的研究與批評，都涉及了政治、經濟、法律、教育、歷史等領域，是一個強大的「社會機構」，其維繫有賴機構與外在的社會保持穩定的關係。¹²³可以看到 1905 年歐美電影建立電影產業之後，電影便是藝術、娛樂、教育與宣傳的媒介之一，¹²⁴既與社會當代集體價值與政治權力體系保持一定的張力，其電影產業便能持續發展至今。若再從功能層面探究，電影與文字都具有宣傳、喚醒記憶，乃至於促成國家、民族認同的功能；影視作品的仿真性及其對感官知覺帶來的刺激，更能讓人們快速接受某種意識形態。

在戰爭時期，電影與紀錄片一類的動態影像，已然發揮宣傳與認

¹²⁰ 〈紀念館簡介〉，「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http://www.china813.com/jianjie1.htm>（2015 年 6 月 12 日點閱）。

¹²¹ 夏春祥，〈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從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談起〉，收錄於盧建榮主編，《文化與權力：臺灣新文化史》（臺北市：麥田出版，2001 年 11 月初版一刷），頁 123。

¹²² 賈磊磊，《影像的傳播》（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1 版 1 刷），頁 65-67。

¹²³ 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頁 12-14。

¹²⁴ 魏時煜，《東西方電影》，頁 34。

同的功用，例如美國尚未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際，英國喜劇演員卓別林（Charles Spencer Chaplin, 1889-1977）執導並主演的《大獨裁者》（*The Great Dictator*）便已於 1940 年上映，電影內容諷刺納粹主義（又稱國家社會主義。德語 Nationalsozialismus，英譯 Nazism）與希特勒，並主張要積極對抗法西斯主義（義語 Fascismo；英譯 Fascism）。¹²⁵日本在中國展開全面戰爭之後，1939 年由熊谷久虎導演的戰爭電影《上海陸戰隊》，描述虹橋機場事件後，上海特別陸戰隊其中一個中隊與上海派遣軍於 8 月中旬的佈防與作戰經過，並在援軍登岸增援之後逐漸獲得淞滬會戰之勝利，電影亦在上海復甦建設的畫面作結。¹²⁶是為日本對淞滬會戰較具代表性的劇情片。

相較於日本將「淞滬會戰」作為主題拍攝電影，中國則是聚焦於四行倉庫保衛戰。抗戰期間，中國電影製片廠約拍攝十七部劇情片，¹²⁷其中與淞滬會戰相關的是 1938 年的《八百壯士》。根據史實，劇情從 10 月 27 日的戰情開始描述，並以楊惠敏獻旗為終，並未敘述守軍撤退的事蹟。¹²⁸該電影在當時造成極大的回響，甚至還重新翻譯為法語，意圖將電影傳到法國。¹²⁹

國民黨在 1945 年抗戰勝利之初，成立「農業教育電影公司」（簡稱「農教公司」），其宗旨是農村歷經戰亂殘破不堪，建國當務之急便

¹²⁵ Charles Chaplin Film Corporation, *The Great Dictator* (Beverly Hills: Charles Chaplin Film Corporation), 1940.

¹²⁶ 東寶株式會社，《上海陸戰隊》（東京：東寶株式會社），1939 年。

¹²⁷ 陳佑慎，〈抗戰時期的國軍電影事業〉，《國史館館刊》第 34 期（臺北市：國史館，2012 年 12 月），頁 86-87。

¹²⁸ 陽翰笙，〈八百壯士（電影劇本）〉，《中蘇文化》第 1 卷抗戰特刊第 5 期，頁 45-46。

¹²⁹ 〈「八百壯士」影片將在法國放映〉，《中央日報》，重慶，1939 年 2 月 4 日，版 2。

是復興農村，尤其著重農村教育，而電影新穎簡便、寓教於樂，得以成為重要的宣傳利器。翌年農教公司成立董事會，陳果夫為首任董事長，並在南京中山陵租借麓地，參考好萊塢片廠進行建廠工作。然建廠工作未完，便隨政府搬遷，並於 1949 年 4 月將器材設備分運來臺。

130

對於電影對國策的宣傳及教育意義也落實於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負責政令宣導、電影戲劇、圖書出版與新聞廣播等四類業務，¹³¹在電影方面接收臺灣總督府的臺灣映畫協會、臺灣報導寫真協會，合併為「臺灣電影攝製場」，是第一個屬於官方性質的製片機構。不過 1947（民國 36）二二八事件後因宣傳委員會裁撤，臺灣電影攝製場先改由行政長官公署教育廳接管，1949 年以後再由臺灣省政府新聞處負責，改名「臺灣省政府新聞處電影製片廠」。¹³²然而整體上，日本在 1931 年以後對於放映業較為重視，導致戰後臺灣電影放映較為普遍，製片則較少的態勢。但因電影放映可以帶來龐大的娛樂稅收，因此對於進口到臺灣放映的各類電影採取放任措施，其結果使得電影院與新

¹³⁰ 至於原先背負抗戰電影宣傳重要角色的中國電影製片廠，在美方建議下，進行軍政改組，軍事委員會成為行政院國防部，旗下的政治部業務分至國防部新聞局、民事局與監察局，中國電影製片廠在戰後大多時間隸屬國軍新單位——聯勤總部，目的是成為具有政治、軍事教育意義的電影機構，主要拍攝反共相關劇情類電影。1949 年亦開始將器材送至臺灣，並在 1950 年改隸國防部政治部，在臺北北投復興崗設廠，亦恢復拍片業務，直到 1990 年代才停止運作。參閱黨營文化事業編纂編輯委員會，《中央電影股份有限公司》（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2 年 10 月初版），頁 1-2。陳佑慎，〈遷臺前的國軍電影事業（1926-1949）〉，《國史館館刊》第 34 期（臺北市：國史館，2012 年 12 月），頁 102-106。

¹³¹ 廖文碩，〈寓教於覽——戰後臺灣展覽活動與「臺灣省博覽會」（1945-1948）〉，《臺大文史哲學報》（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編輯委員會，2011 年 5 月），頁 185。

¹³² 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頁 67。

興電影公司林立，當中也包含國民黨臺灣省黨部的「臺灣電影戲劇股份有限公司」，並代理黨營的中央電影攝製場之放映工作。¹³³同時，原有的戲院接收業務經常出現財務糾紛，1947年以後戲院一併移交到中國國民黨財務委員會手中，為此成立「臺灣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臺影），由臺灣省黨部負責經營管理。¹³⁴至此，原屬於日本國有的電影事業，皆納入黨國體制之下。

1950年蔣中正在臺復行視事，由於認識到過去中國電影文化界多由左翼勢力引導，導致知識分子、青年學生與文化業者紛紛倒向共產主義，於是相當重視在臺的文藝政策。1954（民國43）年，為了使黨內集中力量，促進電影製片與戲院經營，遂將遷臺的農業教育電影公司與在臺成立的臺灣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併為「中央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影」）隸屬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以下稱「第四組」），及其延續的文化工作會（簡稱「文工會」）。於是，中影、臺影與隸屬於國防部的中國電影製片廠，分別代表黨、政、軍三個體系。

1950年代可謂臺灣電影製片初試啼聲之時期，當時受限於反共抗俄的政策宣導，拍攝出的電影難以估計盈虧，且因成本過高，因此無法大量生產電影。¹³⁵1955年，蔣中正號召「戰鬥文藝」，凡是可以提高戰鬥精神與反共意志者，皆在界定範圍內。於是文化界開始「文化

¹³³ 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頁62-64。

¹³⁴ 黨營文化事業編纂編輯委員會，《中央電影股份有限公司》，頁5。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頁68-69。

¹³⁵ 盧非易，《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頁63-64。

清潔運動」，以反共抗俄為基準的國策下，張道藩策劃成立「中國文藝協會」，底下設有「電影委員會」，為民間反共戰鬥文藝的重要組織。¹³⁶同時公營片廠也紛紛拍攝戰鬥文藝的相關電影，配合《電影檢查法》與「行政院新聞局電影檢查處」，使得當時電影片皆必須符合反共抗俄的國策，凡是挑撥國內外團結、侮辱元首、扭曲本國情事或顯示我國落後的片段都會被刪減。¹³⁷政黨力量層面，當時最足以塑造文化記憶的單位即是第四組。它負責指導國內的新聞、文化政策及其發佈等業務，¹³⁸發揮了政治宣傳(Political persuasion)與政策辭辯(Policy rhetoric)兩大功能，亦即藉由計畫性的組織，傳播意識形態影響群眾認知與心理，進而控制社會，並且有目的地以互動關係影響被說服者的觀點，使之共同塑造某種信念與價值。¹³⁹總而言之，1950 至 1960 年代，都是圍繞著反共意識，電影與新聞等影視文化方針，由第四組研擬，再交予民間主要文化組織推動，中央政府相關機構則負責執行。

1960 年以後，國內社會、經濟與國防趨於穩定，政令宣導性質的電影減少，並以「國產電影事業輔導方案」等，扶植本土的電影產業。

¹³⁶ 劉現成，《臺灣電影、社會與國家》(臺北縣：視覺傳播藝術學會，1997 年 10 月初版)，頁 38-39。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頁 81-82。

¹³⁷ 盧非易，《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頁 70-71。

¹³⁸ 1947 年中華民國政府以國民黨中宣部國際宣傳處為底，擴大組織編制而成立「行政院新聞局」，業務重點仍放在國際宣傳，國內宣傳則仍是中宣部新聞事業處負責。因而在臺灣施行黨內改造之後，將原先中宣部新聞事業處以及戰時軍事委員會新聞檢查組的業務，併入中央改造委員會第四組，其職權設定即為對內宣傳。參閱袁公瑜，〈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1951 年至 2002 年〉(宜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 年)，頁 35-36。

¹³⁹ 袁公瑜，〈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1951 年至 2002 年〉(宜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2 年)，頁 30。

¹⁴⁰1966年中共爆發文化大革命，黨、政單位再以「中華文化復興運動」，認定優良的教育影片必須能夠匡正社會風氣、鞏固中華固有倫理道德，並激發民族精神與國家意識等，於是出現諸多教育短片，且融入學校教育當中。¹⁴¹不過最初電影產業並未呼應這項號召，而是以市場為最大考量，民間大致以武俠片、愛情片與臺語片為主流，中影也對時局妥協，以愛情片及既有的健康寫實類為兩大路線。¹⁴²

1960年代末以後，中華民國的外交局勢漸顯劣勢，愛國影片於是扶搖直上。中影先在1972年籌拍抗日電影《英烈千秋》，開愛國電影之先河，在臺灣與香港等地獲得廣大迴響，¹⁴³促使中影繼續製作多部與抗戰有關的電影（下頁表4-3-1）。此後包含中製與民間片廠紛紛效尤，使1970年代的電影呈現「失意國家自勉與自況的國族寓意（national allegory）」。¹⁴⁴其中與淞滬會戰密切相關的電影，為《八百壯士》與《笕橋英烈傳》兩部。

¹⁴⁰ 劉現成，《臺灣電影、社會與國家》，頁128-129。

¹⁴¹ 劉現成，《臺灣電影、社會與國家》，頁133-134。

¹⁴² 盧非易，《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頁130-131。

¹⁴³ 育良敬，〈評論「忠烈千秋」影片，看它「好」在那裏？〉，《自立晚報》，臺北，1974年7月30日。李勇，〈「英烈千秋」轟動港九〉，《聯合報》，臺北，1974年10月12日。

¹⁴⁴ 盧非易，《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頁222。

表 4-3-1：1970 年代以後中央電影公司攝製之抗日相關電影¹⁴⁵

片名	年份	主要戰役或人物	導演
英烈千秋	1973	張自忠	丁善璽
戰地英豪	1975	長沙會戰前夕	劉藝
八百壯士	1975	四行倉庫保衛戰	丁善璽
笕橋英烈傳	1975	高志航及中國空軍	張曾澤
梅花	1975	戰時臺灣抗日活動	劉家昌
強渡關山	1977	空軍敵後任務	張蜀生
大湖英烈	1980	羅福星抗日起義	張佩成

1975 年《八百壯士》電影，由丁善璽執導，柯俊雄、林青霞、秦漢與張艾嘉等飾演，在當時引起不小的轟動，開拍時曾直接請到楊惠敏與林青霞共同主持（下頁圖 4-3-1），電影拍攝地點不僅遍佈臺北片廠、新竹湖口、南投中興新村與高雄愛河等地，所耗費的財力與人力也相當龐大，國防部甚至還出動官兵與軍事設備予以支援。¹⁴⁶

¹⁴⁵ 根據「中央電影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movie.com.tw/home>（2015 年 3 月 30 日點閱）整理製表。

¹⁴⁶ 〈拍攝八百壯士所需人力械彈協調軍方支援〉，《中央日報》，臺北，1975 年 8 月 26 日，版 6；〈軍方支援中影拍攝八百壯士〉，《中央日報》，臺北，1975 年 9 月 26 日，版 6。



圖 4-3-1：楊惠敏與林青霞共同主持電影《八百壯士》開鏡儀式。

資料來源：馮國鏗攝，〈中影「八百壯士」開鏡〉（1975年8月13日），引自「中央社影像空間」：

http://photo.cna.com.tw/Query/PhotoDetails.aspx?IMG_ID=20040701025100&IMG_SUB_ID=200407010251000000&page=1（2014年5月10日點閱）。

片中對於死守四行倉庫的人數，直接敘述為四百二十三人，¹⁴⁷乃較為詳盡、有史實根據的紀錄。這部電影對史實最大的改編為楊惠敏獻旗過程：電影內容拍攝她於夜色掩護下游泳渡河，再行小路赴倉庫，翌日早上再從蘇州河游回租界。¹⁴⁸不過根據1937年的《戰時畫報》

¹⁴⁷ 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八百壯士》，1976年，第53分25秒。

¹⁴⁸ 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八百壯士》，1976年，第1時16分33秒至1時21

的敘述，楊惠敏於 10 月 27 日清晨便至蘇州河畔觀望四行倉庫之情形，正巧碰上從倉庫潛出的便衣士兵告知她需要糧食，於是楊惠敏透過救濟會與寧波同鄉會向外界徵求慰勞品。隨後在八十八師師部受張柏亭之請將國旗送至倉庫，然市政府人員擔心楊之安全，因此第一時間未能成行，但下午仍替八十八師的書記官送信予謝晉元。28 日早上楊惠敏向張柏亭會報前日之事，張再度將國旗交付楊惠敏，於是下午三時冒險進入倉庫，四時左右國旗已飄揚於倉庫樓頂。¹⁴⁹再者，楊惠敏也非渡河獻旗，而是從橋上爬進倉庫。¹⁵⁰

實際上，1938 年的《八百壯士》，便已將女童軍獻旗的橋段，設定為渡河進入倉庫，並影響往後的歷史、國文課本內文之編纂，以及影視作品的闡述。1975 年再拍的《八百壯士》，便是為了戲劇張力而沿用舊有電影作品的構想，刻意將獻旗過程「戲劇化」。不過無論如何，該部影片依舊相當成功，後八百壯士之一的上官志標之子——上官百成，雖曾建議無線電視三台拍攝八百壯士的電視劇而未果，¹⁵¹往後也不再有同名的作品。這部影片成為中華民國面臨外交困頓之際，國人重要的強心針，亦在此後的愛國議題中備受討論，例如 1989(民國 78)年群眾聚集臺北中正紀念堂要求全面改選國會，卻疑似有人擅自降旗並改掛民進黨黨旗，¹⁵²使中國電視公司於數日後的深夜時段「改播深

分 55 秒。

¹⁴⁹ 《戰時畫報》第 18、19 期合刊(上海市：中華圖書雜誌社，1937 年 11 月 15 日)，頁 16。

¹⁵⁰ 楊惠敏，《八百壯士與我》(臺北市：博愛出版社，1979 年 7 月出版)，頁 42-43。

¹⁵¹ 〈攝製「八百壯士」連續劇之議，三台表示暫不做考慮〉，《中央日報》，臺北，1985 年 4 月 24 日，版 9。

¹⁵² 〈扯國旗、毀銅像、打記者、罵民眾，民進黨搞街頭運動，社會受害〉，《中央日

具護旗愛國意義的電影『八百壯士』」。¹⁵³

另一部開拍時間稍晚於《八百壯士》的《笕橋英烈傳》，則是將幾被遺忘的空軍將士高志航之形象，塑造進觀眾之認知內。承第三章所述，高志航在戰爭期間的個人受關注度並不高，即使明訂 8 月 14 日為空軍節，亦是以全體空軍在八一四空戰中的行動為紀念主軸。高志航之名下一次出現在報紙上，已是 1953 年報導蔣中正向高志航的母親祝壽了。¹⁵⁴此後直到 1966 年，高志航的紀念儀式，都是以高志航的母親為中心，¹⁵⁵並稱高志航為烈士，詳述其戰死過程。期間，國防部在臺東興建的空軍基地完工，命名為「志航基地」，¹⁵⁶使高志航代表的空軍形象浮上檯面；嘉義縣也將原空軍總司令部附設嘉義空軍子弟小學，易名「志航國民小學」。¹⁵⁷隨後，1975 年中影公司奉指示籌拍高志航為主題的電影，定為《笕橋英烈傳》。¹⁵⁸該片再度向國防部尋求支援，

報》，臺北，1989 年 1 月 30 日。

¹⁵³ 〈表達護旗心聲，中視今播「八百壯士」〉，《中央日報》，臺北市：1989 年 2 月 3 日。

¹⁵⁴ 〈總統親書壽字賀高志航母壽，派王總司令送往嘉義並垂詢遺屬生活情形〉，《中央日報》，1953 年 5 月 30 日，版 1。

¹⁵⁵ 〈高志航烈士太夫人高李春英女士，今慶八秩壽誕，空軍部隊將熱烈祝嘏〉，《中央日報》，臺北，1961 年 10 月 15 日。〈高志航母喪定廿八日公祭，空總撥兩萬元治喪〉，《中央日報》，臺北，1966 年 3 月 24 日，版 3。〈蔣部長赴嘉義祭高志航之母，空總今舉行公祭〉，《中央日報》，臺北，1966 年 3 月 28 日，版 3。

¹⁵⁶ 夢翔，〈志航基地專訪〉，《尖端科技》第 52 期（臺北市：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社，1988 年 12 月），頁 85-86。

¹⁵⁷ 〈學校沿革〉，收錄於「嘉義市志航國民小學」：

<http://main.ches.cy.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45>（2015 年 2 月 26 日點閱）。

¹⁵⁸ 《笕橋英烈傳》籌拍之時，原劇本名為《碧血長空》，後又一度改為《一飛沖天》，並定調為高志航傳。參閱《碧血長空（電影劇本）》，出版項不詳。〈中影新片笕橋英烈傳明在士林開鏡，演職員今將赴空軍公墓致敬〉，《中央日報》，臺北，1975 年 12 月 2 日，版 6。

除物資與人力以外，亦參考國軍戰史資料。上映後，不但獲得 1977（民國 66）年的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獎，並在香港上映、臺灣重映。¹⁵⁹不過與八百壯士的命運相同，往後臺灣不再拍攝與高志航相關的劇情電影，倒是中共曾於近年曾改編高志航的故事，拍攝三十集的電視劇《遠去的飛鷹》，¹⁶⁰製作經費高達三千多萬人民幣，亦曾邀請高志航的子女出席發表會，¹⁶¹多少也可見兩岸重視過往戰爭英雄的消長。

1980 年代以後，政治及社會逐步開放，紀念儀式與歷史文本相同，有明顯的轉變，國家對「七七」蘆溝橋事變、「八一三」淞滬會戰、「八一四」空軍節等抗戰相關的大型紀念日活動，從逐年，變為五年、十年累加的週年紀念法則，紀念週期不再頻繁，甚至由官方舉辦的抗戰紀念活動，還被糾正淞滬會戰「淞」字之誤用，以及謝晉元所屬部隊編號之錯誤。¹⁶²同時，抗戰愛國電影亦逐漸式微，使得紀錄片的攝製環境相對友善，因此淞滬會戰也主要以紀錄片的形式重新搬上螢幕。如 1990 年代後期，蔣緯國邀請電視製作人陳君天籌拍《一寸山河一寸血》，雖然當時未曾在臺灣的無線電視臺公開播映，使該部紀錄片真正廣為流傳要待電腦網路普及以後，因此對於世紀之交的民眾而言影響

¹⁵⁹ 〈優良國語片金馬獎得獎名單全部揭曉，最佳劇情片笕橋英烈傳，最佳導演張曾澤，最佳編劇何曉鐘，最佳男主角秦祥林，最佳女主角陳秋霞，最佳男配角白鷹，最佳女配角胡茵夢，最佳童星鄔裕康〉，《中央日報》，臺北，1977 年 9 月 30 日，版 6。〈笕橋英烈傳重映〉，《中央日報》，臺北，1977 年 10 月 1 日，版 6。〈笕橋英烈傳在港九上映〉，《中央日報》，臺北，1977 年 10 月 7 日，版 6。

¹⁶⁰ 華誼天意影視有限公司：《遠去的飛鷹》，2011 年。

¹⁶¹ 〈《遠去的飛鷹》16 日開播，3000 萬造真實空戰效果〉，收錄於「騰訊娛樂」（2011 年 9 月 15 日）：<http://ent.qq.com/a/20110915/000061.htm>（2015 年 2 月 27 日點閱）。

¹⁶² 丘智賢，〈遺忘或錯誤，如何紀念抗戰〉，《聯合報》，新北市，2014 年 7 月 9 日，版 A14。

不大。不過紀錄片劇組在兩岸各地訪問曾經歷抗戰的官兵，並隨時予以擴編出新，陸續製成六個版本，約有七百人受訪，¹⁶³不但呈現許多淞滬會戰的戰爭影像，老兵訪談之片段更是彌足珍貴。當中孫元良以及士兵李錦堂闡明八百壯士是由「第五二四團第一營」組成的「四行孤軍」，¹⁶⁴同時片中亦強調撤退原因與孤軍歲月，其敘述與官兵的回憶錄和當時的報導並無差異，但已經脫離過去劇情片的杜撰形式，尋求真正的史實。全集另有值得討論之處，為剪輯一段楊惠敏老年時的受訪影片，當中楊自述十幾歲時冒險獻旗。¹⁶⁵不過，根據 1937 年報刊之記載，楊惠敏已是一名二十四歲的女童軍；楊惠敏的回憶錄《八百壯士與我》內，楊亦自稱當時的童子軍服務隊並不接受十六歲以下的青少年，¹⁶⁶故楊惠敏受訪時的說法，很可能是口誤或因年邁而導致記憶混淆。然整體而言，《一寸山河一寸血》瑕不掩瑜，至今仍被認定為華人圈最詳實的紀錄片，導演陳君天甚至被譽為「抗日紀錄片第一人」。由於擁有抗戰集體記憶的世代日漸凋零，即使文化部近年推動「國民記憶庫」，試圖讓經歷過戰爭的長者訴說自己的故事，目前為止公開之影音口述資料，卻多在陳述國共內戰以後的過往。¹⁶⁷《一寸山河一寸

¹⁶³劉項，〈抗戰紀錄片第一人陳君天傳奇〉，收錄於「亞洲週刊——新思維及其他專欄」：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29156439024&docissue=2015-16（2015 年 5 月 6 日點閱）。

¹⁶⁴ 臺灣卓越文化傳播公司，《一寸山河一寸血：第 8 集——淞滬會戰（下）》，1995 年，第 15 分 16 秒至 15 分 38 秒、第 16 分 17 秒至 16 分 43 秒。

¹⁶⁵ 臺灣卓越文化傳播公司：《一寸山河一寸血：第 8 集——淞滬會戰（下）》，1995 年，第 17 分 08 秒至 17 分 21 秒。

¹⁶⁶ 楊惠敏，《八百壯士與我》，頁 8。

¹⁶⁷ 「臺灣故事島——戰爭」：

http://storytaiwan.tw/Story_Wall1.aspx?n=7D4DCAAB8887E4FD&t=0C4F3E988AC32E69&tn=620F23379DF07C83D63C854481C6BA1E（2015 年 5 月 6 日點閱）。

血》正好彌補了抗戰記憶，即使紀錄片製成迄今已逾二十年，但正因為龐大的口述訪談紀錄，故直至今日仍備受關注與推崇，並獲得中共的重視、肯定，將於抗戰七十週年之際，首度於中國中央電視台播映。¹⁶⁸。

中共方面，隨著兩岸關係的進展，影視作品亦開始出現對國民革命軍的敘述。2011（民國 100）年為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上海上德文化傳媒公司製作一百集的《國軍抗戰全紀實》，每集十餘分鐘，介紹重要會戰及戰役、國軍重要人物或部隊。當中與淞滬會戰有關的專輯便佔十集，包含第二至第十集的淞滬會戰內容，及第五十二集的「八一四空軍大捷」。該紀錄片除了偶引用臺灣《一寸山河一寸血》的訪問內容，以及《笕橋英烈傳》等劇情電影片段，亦有許多中日雙方戰場或後方影像畫面。其中四行倉庫保衛戰的專集詳加敘述戰役內容以及孤軍被軟禁在租界區的官兵心境，¹⁶⁹雖然對於謝晉元撤出倉庫時的順序與一般回憶錄有異，而是與電影《八百壯士》相同，也曾錯述謝晉元一團為「四〇二團」，¹⁷⁰但該片仍是長期以來少數詳盡描述國軍各場戰役經過的紀錄片。另一部紀錄片《我的抗戰》，特別以八百壯士取代淞滬會戰，透過八路軍與國軍官兵的回憶，交織八百壯士與謝晉元的

¹⁶⁸ 劉項，〈抗戰紀錄片第一人陳君天傳奇〉，收錄於「亞洲週刊——新思維及其他專欄」：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29156439024&docissue=2015-16
（2015年5月6日點閱）。

¹⁶⁹ 上海上德文化傳媒，《國軍抗戰全紀實：第9集——淞滬會戰之四行倉庫》，2011年。

¹⁷⁰ 上海上德文化傳媒，《國軍抗戰全紀實：第10集——淞滬會戰之同仇敵愾》，2011年，第1分8秒。

作戰與在孤軍營的歲月，並將影片內容集結成冊。¹⁷¹

值得一提的是，與淞滬會戰同為抗日戰爭前期的「台兒莊大捷」被中國兩大黨派——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相當重視，中共史學界視之為對日抗戰第一場勝利，甚至是太平洋戰爭開打前，中國受新帝國主義無數次侵擾當中，最乾淨俐落的一次勝利。¹⁷²國民黨方面認為該役有助於國民自信心的增強，過去悲觀的心態可完全掃蕩；對國軍也是有助於提升戰鬥的心理素質；對外則能宣傳我國抗日之精神。¹⁷³又塑造主要軍官為「抗日英雄」之形象，如白崇禧便登上《良友畫報》的封面。¹⁷⁴該場戰役中在戰後卻反而沒有被中央電影公司等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國國民黨轄下的電視、電影事業製作相關之作品，而是由中共把握詮釋權。¹⁷⁵其因與國民黨的地方派系鬥爭脫不了關係。

台兒莊戰役指揮官中的李宗仁、白崇禧為「新桂系」¹⁷⁶代表，北

¹⁷¹ 中國傳奇 2010 之我的抗戰節目組，《我的抗戰》（新北市：人類智庫，2011 年 5 月初版），頁 29-48。其他抗戰紀錄片尚有 1990 年代的《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全紀錄》，其引用諸多戰爭前後方的影像，並整理拍攝臺灣、中國的抗日紀念碑與老兵重訪戰事故地之畫面，不過可惜的是均以旁白敘述，未有老兵現身說法。

¹⁷² 唐德剛，〈台兒莊大捷的歷史意義——一九九三年四月八日「紀念台兒莊大捷五十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兒莊現場開幕式中發言稿〉，收錄於唐德剛，《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臺北市：遠流出版，2014 年 7 月 1 日初版一刷），頁 93。

¹⁷³ 〈陳誠言論集〉（1938 年日期不詳），《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館藏，典藏號：008-010301-00019-061。

¹⁷⁴ 《良友畫報》第 137 期，上海市：良友出版社，1937 年 5 月。

¹⁷⁵ 中共拍攝台兒莊之相關電影如廣西電影製片廠：《血戰台兒莊》，1986 年；紀錄片有鳳凰衛視：《決勝台兒莊戰役——70 週年祭》，2008 年。

¹⁷⁶ 桂系原為辛亥革命後，清朝廣西提督陸榮廷在廣西宣布獨立，因排斥同盟會成員而漸在地方走向軍閥統治，並陸續控制兩廣地區。期間一度與孫中山合作，並發動護法戰爭，然因歧見日深，孫中山離粵後，1920（民國 9）年指揮粵軍陳炯明等部隊發動第一次粵桂戰爭；翌年桂軍失敗，並投靠北洋軍閥，發動第二次粵桂戰爭又敗，使陳炯明部隊進入廣西，瓦解桂系勢力。而李宗仁在戰後為隨陸榮廷等前往廣東，而是與其廣西路軍小學堂同窗白崇禧、黃紹紘在廣西自立為「廣西自製軍第二路總司令」，控制七個縣市，兵力逐漸擴展至六千餘人，在史學界被稱為「新桂系」。

伐後即因裁軍議題等矛盾，與蔣中正爆發蔣桂戰爭（1929）而戰敗，又在 1930（民國 19）年中原大戰以失敗坐收，使新桂系的力量無法再往北方延伸。1936 年新桂系與粵系聯合發動兩廣事變（又稱六一事變），險些演變為另一場內戰。在各方斡旋下，蔣中正保證新桂系在廣西的地位，而新桂系則擁戴蔣中正為全國領袖。¹⁷⁷抗戰爆發後，白崇禧擔任副參謀長，李宗仁則為第五戰區司令，新桂系部隊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一、第十六與第二十一集團軍，其中第二十一集團軍共六個師在 1937 年 10 月以後，陸續投入淞滬會戰蘆蕩濱防線，¹⁷⁸遭到嚴重損傷。翌年日軍進攻台兒莊，圖斷國軍之退路，李宗仁、白崇禧指揮得當，命令湯恩伯第二十集團軍派部隊南進攻擊日軍，並與孫仲連的第二集團軍將日軍逐出台兒莊，蔣中正對此致電白、李二人：「台兒莊奏捷，寇敵就殲，造成抗戰以來第一次光榮戰績，此皆我將士忠勇用命，亦由兄等昕夕勤劬，督率有方之所致。捷報傳來，至深欣慰，自茲最後勝利，益堅自信，我軍民一心一德，被矢勤甚，成功之期，必不在遠。望對各將士代致慰勞，並加策勉；所有死傷官兵，並飭查明造報，以備撫卹為盼。」¹⁷⁹然而當時由荷蘭籍 Joris Ivens（1898-1989）執導、美國今日歷史電影公司（History Today Inc.）贊助的《四萬萬人民》（*The*

以區分陸榮廷一系。1924（民國 13）年李宗仁開始以武力統一廣西，翌年正式將舊桂系消滅。參閱 Diana Lary 著，陳仲丹譯，《中國政壇上的桂系》（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 月 1 版 1 刷）。

¹⁷⁷ Diana Lary 著，陳仲丹譯，《中國政壇上的桂系》（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 月 1 版 1 刷），頁 34-241。

¹⁷⁸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頁 88。

¹⁷⁹ 〈事略稿本——民國二十七年四月〉（1938 年 4 月 8 日），《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60100-00127-008。

400 Million)，內容雖以武漢會戰為主，並得以拍下台兒莊戰役尾聲的鏡頭，卻沒有任何一個李宗仁的畫面，幾已顯見蔣李之間的嫌隙。¹⁸⁰

此後新桂系又陸續在豫湘桂戰役與桂難會戰等役與日軍對抗，並在抗戰結束後投入國共內戰。1948年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同時白崇禧就任華中剿匪總司令，直接控制三十萬人的部隊，使新桂系勢力再膨脹。是年底，新桂系逼蔣中正下野，李宗仁在1949年以代總統身分與共產黨展開和談失利，與蔣之間又有剿共策略之矛盾，甚至在中央政府掀起府院之爭，改組行政院撤換孫科。¹⁸¹10月中旬，李宗仁下令中央政府開始在重慶辦公，卻在11月飛赴昆明轉往桂林後便不再返重慶。中樞虛空，蔣中正雖然寄望李宗仁能負起代總統身分，但眼見西南局勢大為不利，於是先隨中央政府遷成都，12月轉往臺灣，白崇禧亦在來臺名單當中。期間，李宗仁在11月20日以胃疾為由，從南寧飛抵香港，準備赴美就醫，¹⁸²從此與桂系白崇禧及蔣中正等政要分道揚鑣。新桂系雖在1949年瓦解，蔣中正亦於1950年復行視事，然而蔣李心結從軍政時期延續到憲政時期，長達二十餘年。政府遷臺後，在以蔣為首的政治體制下自然容不下李宗仁。當年以第五戰區司令之姿，率領部隊獲得國軍在抗戰中第一場勝利的風光事蹟，便一直不會是對內

¹⁸⁰ 邵銘煌，〈《四萬萬人民》紀實片之產製與抗戰意義〉，收錄於劉維開主編，《影像近代中國》（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3年12月初版一刷），頁92-94、111-114。

¹⁸¹ 劉維開、蔣永敬著，《蔣介石與國共和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1月修訂初版），頁237-238。

¹⁸² 參閱劉維開、蔣永敬著，《蔣介石與國共和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頁243-249。劉維開，〈1940年代中國國民黨領導階層之分析〉，收錄於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菁英》（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年12月出版），頁310-312。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臺北市：遠流出版，2010年7月出版。

外宣傳的重點項目。即使中小學教科書敘述台兒莊一役，也刻意淡化指揮官的色彩，僅以「國軍」代之。¹⁸³當抗戰愛國電影式微後，台兒莊戰役與李宗仁等桂系將領的功績，才在紀錄片中獲得一席之地。

比較台兒莊戰役與淞滬會戰下的八百壯士形象，顯見政治意識形態對於歷史記憶的形構有巨大的影響。另外，從戰後電影及回憶錄中，能發現真實經歷與回憶所呈現的差異，然電影配合劇情所需，真實性為何似乎並非追求的焦點，而是要塑造英雄、英雌。如此，無論對內還是對外，都可宣示中國人民全面抗戰之雄心。即使抗戰勝利，國軍所欲對抗的角色，從日本轉變為中國共產黨，但仍能以高志航、八百壯士與女童軍的英勇事蹟，強化國內的凝聚力與向心力。有很長一段時間，臺灣所出版的淞滬會戰相關文本與視聽作品，皆鮮少聚焦於淞滬會戰的過程，而是透過特地人物的形象，乘著官兵或當事人的回憶錄，以及教科書、報刊的記載運行，強化「青天白日滿地紅」之象徵。

直到 1980 年代以降，無論紀念標誌，或影視作品、文本敘述都大幅減少對抗戰英雄烈士的敘述，儘管以「中國認同」為首的兩岸學者一直以來都強調對日抗戰之於中華民族的重要性，並陸續有紀錄片回歸抗戰史實本身來敘事。然而，對不曾經歷過戰時的後世民眾而言，戰時記憶仍舊斷裂、分裂，「只是一個光榮卻空洞的符號」。¹⁸⁴

¹⁸³ 如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歷史科教科書》第三冊，頁 82。

¹⁸⁴ 張世瑛，〈國民政府對抗戰忠烈事蹟的調查與紀念〉，《國史館館刊》第 26 期（臺北市：國史館，2010 年 12 月），頁 42。

第五章 結論

戰爭記憶作為歷史記憶架構下的一種表現，所呈現的內容依舊是社會群體所形成的「集體記憶」，以及戰爭後各種對戰事本身的紀念象徵物、功能物的「文化記憶」。自從 Halbwachs 的研究受到注意後，歷史記憶研究者都不會否定社會與記憶之間必須相互依賴、密切聯繫。自古以來，國家當權者為了塑造或是改變民眾的集體記憶，使之統治更具正當性、合理性，於是會透過制度、媒體與教育等方式來完成控制思想與記憶的工作。近現代由於科技的進步，國家機器塑造國民的歷史記憶更為突出，塑造記憶的媒介，不再侷限於文本或儀式，而是訂定制度，經教育、新聞媒體與影像等多元方式。

國民黨及其前身同盟會，作為民國創立的關鍵政黨，自然地希望能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保有政治上的一席之地。在歷經與袁世凱、北洋及各地軍閥的挑戰前後，國民黨走向了黨國一致的體系，塑造國家發展的藍圖，並藉以謀求國家認同。同一時間，國民黨改造的「導師」蘇聯，以及歐陸的德國也都在黨國體制下運行。當時這些國家透過黨營、國營甚至軍方體系的媒介，達到宣傳的效果。儘管國民黨在西安事變以前的主要打擊對象皆是中國共產黨，但透過國家與政黨經營的報刊與通訊社，很快地便能修正路線，往抗日意識邁進；加以 1930 年代以降，左翼為首的報刊業，早已紛紛倒向抗日言論。因此在戰前，言論已然統一。抗戰後，民間與官方報刊更是集中砲火，發表抗戰的決心，尤其淞滬會戰開打之後，歷來報刊業相當發達的上海地區，更

是言論的重心。

然而，淞滬會戰在抗戰前期，對中國而言屬於失敗的一次作戰，且國民黨因此損失配備現代化軍備的精銳部隊。從當時的記載與戰史來看，僅有空軍之作戰較為有效，當時的報刊則多半呈現報喜不報憂，即使國軍撤守，也盡可能地避免負面論述。這場會戰被後世所頻頻傳頌者，如四行倉庫保衛戰，僅是淞滬會戰國軍撤退行動當中，一場精心安排後的掩護作戰。蔣中正以一團留守的策劃，雖然經過第一線軍官的磋商而改留一營，但引起國際注意的策略卻依舊達成。更成功的是，經過黨營報紙與民間報刊的推波助瀾，孤軍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的威名不脛而走，女童軍楊惠敏冒死獻旗的事蹟亦廣為流傳。男女英雄的形象在戰時成為愛國的象徵，電影與歌曲對此的歌功頌德，更顯露在抗戰前期國軍態勢不利的情形下，中國上下亟需以他們的經歷，讓內心尋求慰藉。淞滬會戰的失利，似乎也顯得較為較為淡化。相較之下，屢屢建功的空軍，個人抗戰的英雄形象卻不明顯，在戰時唯有訂定「八一四空軍節」，並予以殉職飛行員如高志航優渥的後事補償。

同一時間，影像經過將近一世紀的醞釀，在此時也躍升為宣傳的利器。中國、日本與其他紛紛在 1939 年以後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國家，都有戰爭紀錄片的發展，使動態影像之一的紀錄片進入戰爭宣傳片時期。不過淞滬會戰當下，中國的影像紀錄多由外國記者或受雇於外商報刊的中國記者所攝，動態影像並不顯著，反而是藉由畫報、畫刊上的照片，彌補文字宣傳的不足。無論如何，這些影像所代表的是拍攝者意圖帶給觀眾的想法，並因此使民眾建立與拍攝者同樣的認同

感，亦成為戰後各項出版物與影視作品的重要素材。換言之，戰爭影像不僅建構時人的集體記憶，也塑造了戰後世代的文化記憶。另一方面，儘管 1937 至 1945 年間所流傳的戰爭影像，通常是攝影師安排將士或民眾成為演員而重建場景。然而亟需宣傳的當下，不會特別在乎影像的真實性，也並非要讓民眾喚起回憶，而是綜合眾人認同的重要意念，能夠挑起思想與情感。

戰後，國民政府接收臺灣，並於 1949 年將中央政府遷往臺灣。國家所面對的敵人從日軍轉變為共軍，臺灣則成為反共抗俄、反攻復國的重要基地。為了泯除臺灣五十年來的日本文化與思維，並建立臺灣與中國在歷史與文化傳承上的一體性，於是講述對日抗戰，便成為同時達到兩個目的之顯例。中共爆發文化大革命以後，中華民國政府更以中國文化的唯一繼承者之姿，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然而同時，外交局勢陷入困境，尤以 1970 年代以後更顯困頓。這些時局的發展，迫使執政當局必須強化愛國意識，致使教育以外，電影業界也投入拍攝愛國宣傳片的行列，並以對日抗戰的影視成果最為豐碩。其中，淞滬會戰的八百壯士與楊惠敏之故事仍持續內化、根植於人民當中；之後，電影《笕橋英烈傳》也讓高志航乘上了這波風潮。這些愛國故事，透過歷史文本，也藉由影視、回憶錄等，對故事再造與強化，尤常以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貫穿於故事之間，使會戰的愛國象徵更加明顯。

1980 年代以後，隨著兩岸政治局勢與社會環境的演變，淞滬會戰整體被論述的程度逐漸降低，教育上不但離開國小的課本，國、高中課文內的相關敘述也有減少之趨勢。過去塑造的英雄、英雌形象則因

新史料的出土與開放而備受檢視，以史學界為首，意圖重新建構「真」的戰役經過。是以，對於淞滬會戰乃至於戰爭的歷史記憶，還是會因時代的變化，以及可用史料的出現，而有所增減、刪修。

可以斷言，戰爭記憶不僅是親歷者的記憶，還是經過數十年的象徵化、符號化，在主政者、參與者（民眾）與時代環境的互動下，成為國家由上至下所需的記憶，其目的無疑是要建構國家人民「共同的敵人」。必須注意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因敵人的差異，建構戰爭記憶的最終目的自然不同。另外還有形構方式的差別：戰時的集體記憶，是由新聞、照片與紀錄片加以塑造；戰後的文化記憶，則是以教育與影視形式為主要方式。換言之，戰爭記憶的塑造，必然有「選擇性」，選擇面對何種敵人，選擇那些戰爭事蹟，又選擇何種宣傳、塑造的形式。

然而，既然戰爭記憶是國家、人民與社會選擇與互動的產物，當執政者更迭、社會某種論述之興起，抑或民眾群體的意識，凡三者之一有了變化，戰爭記憶便會被挑戰。戰時的集體記憶，在民族大義、國家存亡的戰爭當下，多半不會受到太大的挑戰，也能在各個群體之間，找到各自集體記憶的相似處與身分認同。然而文化記憶卻是對集體記憶的重整與表象化，因此當群體回顧過往，卻無法產生認同時，原有的戰爭記憶便會受到挑戰。如同 1980 年代以後臺灣認同意識的高漲，便幾乎翻轉人民的既有記憶。不過這僅是對於國家所塑造的戰爭記憶之挑戰，非意味原有的記憶被完全取代。

這項挑戰與史觀衝突的具體化，大致始於 2000 年民主進步黨執政的時期。原先戰爭書寫與戰爭記憶是建立在「國族性」的戰爭框架下，

唯有值得悼念的戰史，才能突顯親歷戰爭者的生命價值與意義。當執政者不同後，仍舊透過官方機構，突顯日籍臺灣兵的被遺忘與重要性，進一步塑造「臺灣人」的歷史記憶；民間也興起對國民黨治下教育與文化等措施的反思與質疑。2008年執政者再度翻轉，官方與民間對戰爭記憶的論述又隨之改變。

2015年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顯然從民間的「終戰」與官方為主的「抗戰勝利」便能體會箇中對立之處。相較之下，中國透過官方集權式的國族論述，對日抗戰依舊是反日思潮下的歷史記憶，但在形塑的過程，也將當年國民政府的抗戰方針與事蹟融入歷史文本與影視作品當中，其目的仍希望從抗戰激發愛國意識，並兩岸統一的迫切性及必要性。中華民國政府當前對抗戰與其間各戰役論述之多寡已然不是焦點，而是逐漸探究底層民眾或將士對於抗戰的反應，或多或少也是在呼應、對抗另一種以下層士兵為主所架構出來的臺灣兵意識。於是，歷史記憶和歷史詮釋成為國族建構過程中，各黨各派互為攻防的主戰場。對於戰爭記憶的不同論述，儘管一時半刻不會有太多的對話與共識，卻證明了當前臺灣社會的民主與自由價值。

徵引資料

(一) 檔案史料與史料彙編

1. 《會議記錄》(臺北市：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507/208.2，〈六全大會中央宣傳部工作報告〉。
2.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藏)
001-012071-0028，〈新聞檢查局(所)組織法令案〉。
3.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藏)
001-012146-0012，〈新聞記者法案〉。
4.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藏)
001-012340-0003，〈國民總動員法令(一)〉。
5.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藏)
001-014000-0018，〈抗戰建國綱領〉。
6.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藏)
001-014130-0002，〈中國國民黨宣傳工作案(一)〉。
7.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藏)
001-016144-0001，〈謝晉元被刺與撫卹〉。
8.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藏)
001-035100-0071，〈抗日有功人員勛獎(九)〉。
9.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藏)
001-036000-0132，〈抗戰有功人員褒卹案(四)〉。
10.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館藏)
001-036130-0001，〈殉難將領入祀忠烈祠〉。
11.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藏)
001-036190-0002，〈空軍官位追贈追晉案(二)〉。
12.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藏)
001-051616-0025，〈八一四空軍節〉。
13. 《國民政府》(臺北市：國史館藏)
001-072200-0002，〈戰區軍事部署及人員派充(一)〉。
14. 《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8-010202-00021-008，〈往來函電(二十一)〉。
15. 《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 008-010301-00019-061，〈陳誠言論集〉。
16. 《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8-010701-00018-003，〈抗戰叢刊（一）〉。
17. 《陳誠副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8-010701-00018-020，〈抗戰叢刊（一）〉。
18.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10200-00084-015，〈籌筆——統一時期（八十四）〉。
19.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10200-00084-049，〈籌筆——統一時期（八十四）〉。
20.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10200-00094-013，〈籌筆——統一時期（九十四）〉。
21.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10200-00095-058，〈籌筆——統一時期（九十五）〉。
22.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10200-00125-013，〈籌筆——統一時期（一二五）〉。
23.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10200-00125-021，〈籌筆——統一時期（一二五）〉。
24.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10200-00149-040，〈籌筆——統一時期（一四九）〉。
25.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10300-00043-017，〈籌筆——抗戰時期（四十三）〉。
26.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20300-00009-138，〈革命文獻——淞滬會戰與南京撤守〉。
27.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60100-00127-008，〈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年四月〉。
28.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60100-00151-025，〈事略稿本——民國三十年四月〉。
29.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80102-00027-003，〈中央軍事機關人士（十一）〉。
30.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80102-00087-002，〈空軍編訓（二）〉。

31.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80103-00055-002，〈全面抗戰(二十二)〉。
32.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80200-00135-067，〈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六十五)〉。
33.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80200-00491-001，〈一般資料——呈報彙集(六十四)〉。
34.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80200-00491-004，〈一般資料——呈報彙集(六十四)〉。
33.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90102-00002-183，〈鞏固國防(二)〉。
34.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90103-00014-255，〈對英法德義關係(四)〉。
35.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90105-00002-368，〈盧溝禦侮(二)〉。
36.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90200-00025-127，〈八年血債(一)〉。
37.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市：國史館藏)
002-090200-00026-012，〈八年血債(二)〉。
38. 「紀 043 軍人節紀念郵票」(1955)，臺北市：郵政博物館藏。
39. 「紀 098 第 10 屆軍人節紀念郵票」(1964)，臺北市：郵政博物館藏。
40. 「紀 116 抗日英烈像郵票」(1975)，臺北市：郵政博物館藏。
41. 「紀 153 第 20 屆軍人節紀念郵票」(1974)，臺北市：郵政博物館藏。
42. 「紀 210 慶祝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四十週年紀念郵票」(1985)，臺北市：郵政博物館藏。
43. 「紀 221 七七抗戰 50 週年紀念郵票」(1987)，臺北市：郵政博物館藏。
44. 「紀 255 慶祝抗戰勝利臺灣光復 50 週年紀念郵票」(1995)，臺北市：郵政博物館藏。
4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第二編——軍事》。南京市：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年出版。
46.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南京市：鳳凰出版傳媒，2005 年一版。
47. 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七輯：一週國內外大事述要——國聞

週報輯》，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85年12月影印出版。

48.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七十六輯：中國國民黨歷次全國代表大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上）》，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9月出版。
49. 秦孝儀主編，《革命文獻·第七十九輯：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9年6月出版。
50.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9月初版。
51. 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二，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10月出版。
52. 秦孝儀總編，《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卷四，臺北市：中正文教基金會，2002年出版。
53.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日軍對華作戰記要叢書（1）：初期陸軍作戰（一）——從蘆溝橋事變到南京戰役》，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年6月出版。
54.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13）·淞滬會戰（一）》，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年再版。
55. 張國奎、雷聲宏主編，《國民革命軍戰役史第四部——抗日》，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4年6月30日。
56. 黃自進、潘光哲編，《蔣中正總統五記·困勉記》，臺北市：國史館，2011年12月初版一刷。
57. 萬仁元、方慶秋主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整編，《中華民國史史料長編——民國二十六年》（第四冊），南京市：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8月。
58. 溫在弘、黃清琦、葉高華編著，《臺灣戰後人口普查地圖集（1956-2010）》，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人口與性別研究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2012年12月初版。

（二）日記與回憶錄

1. 上官百成編撰，《八百壯士與謝晉元日記》，臺北市：華新文化，1976年7月出版。
2.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編，《口述淞滬會戰》（第一、二冊），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8月一版一刷。

3. 中國人民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八一三淞滬抗戰編審組編，《八一三淞滬抗戰》，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年一版。
4.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臺北市：遠流出版，2010 年 7 月出版。
5. 孫元良，《億萬光年中的一瞬——孫元良回憶錄》，高雄市：景昌文具，1974 年再版。
6. 黃杰，《淞滬及豫東作戰日記》。臺北市：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4 年 6 月 16 日出版。
7. 楊惠敏，《八百壯士與我》。臺北市：博愛出版社，1979 年 7 月出版。

(三) 報刊雜誌

1. 《人民日報》，北京市，1985、2005 年。
《大公報》，漢口市，1937 年。
2. 《中央日報》，南京市，1934、1937 年。
3. 《中央日報》，重慶市，1939 年。
4. 《中央日報》，臺北市，1953、1961-1962、1966、1975、1977、1985、1989 年。
《中國時報》，臺北市，1995、2003、2011、2014 年。
5. 《申報》，上海市，1937 年。
6. 《立報》，上海市，1937 年。
7. 《自立晚報》，臺北市，1974 年。
8. 《抗戰三日刊》，上海市，1937 年。
9. 《經濟日報》，新北市，2015 年。
10. 《聯合報》，臺北市，1974、2005 年。
11. 《聯合報》，新北市，2014 年。
12. 《支那事變寫真全輯》，東京市：朝日新聞社，1937 年。
13. 《支那事變戰跡の刊》，東京市：陸軍畫報社，1939 年。
14. 《世界畫報——日支大事變號》第 2 輯，東京：國際情報社，1937 年 10 月 1 日。
15. 《良友畫報》第 137 期，上海市：良友出版社，1937 年 5 月。
16. 《辛報戰情畫刊》第 1 期，上海市：辛報編輯部，1937 年 10 月 10 日。
17. 《辛報戰情畫刊》第 3 期，上海市：辛報編輯部，1937 年 10 月 24 日。
18. 《辛報戰情畫刊》第 4 期，上海市：辛報編輯部，1937 年 11 月 1 日。

19. 《戰時畫報》第1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年9月19日。
20. 《戰時畫報》第2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年9月23日。
21. 《戰時畫報》第3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年9月27日。
22. 《戰時畫報》第4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年10月1日。
23. 《戰時畫報》第11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年10月28日。
24. 《戰時畫報》第12、13期合刊，晉戰專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年10月30日。
25. 《戰時畫報》第15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年11月7日。
26. 《戰時畫報》第16、17期合刊，綏遠專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年11月11日。
27. 《戰時畫報》第18、19期合刊，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年11月15日。
28. 《戰時畫報》第20期，上海市：中華圖畫雜誌社，1937年11月19日。

(四) 教科書與教育資源

1. 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室編，《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教科書（必修）中國現代史》下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11月2版8刷。
2. 小魯出版社，《說給兒童的中國歷史（有聲書）》。臺北市：小魯出版社，1993年3月出版。
3. 中學標準教科書歷史科編輯委員會，《中學標準教科書初中歷史》第四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4年12月初版。
4. 中學標準教科書歷史科編輯委員會，《中學標準教科書高中歷史》第二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9年12月七版。
5. 仁林文化編，《國中社會》第三冊，臺中市：仁林文化，2003年6月出版。
6. 王仲孚、孫若怡主編，《歷史》第三冊，新北市：康熹文化，2013年8月初版。
7. 王秋原、吳圳義、林有土主編，《國民中學社會》第四冊，臺南市：南一書局，2005年2月初版。
8. 江筱婷等編，《國中社會課本》第四冊，新北市：康軒文化，2013年2月初版。
9. 朱漢國主編，《義務教育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八年級上冊，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5月2版3刷。
10. 林能士主編，《高級中學歷史》下冊，臺南市：南一書局，2005年2月修訂版。
11. 金仕起、李明仁、劉季倫、李福鐘編著，《歷史》第二冊，臺北市：三民書局，2007年2月初版一刷。

12.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學校國語課本》第五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0年8月初版。
13.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學校國語課本》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6年8月修訂暫用本。
14.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學校歷史課本》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6年8月修訂暫用版。
15.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學校歷史課本》高級第四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8年1月暫用版。
16.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學校社會課本》第四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67年修訂暫用本。
17.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小學社會》第十一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82年8月試用本。
18.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歷史科教科書》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78年8月五版。
19.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歷史教科書》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89年8月三版。
20. 國立編譯館主編，《國民中學歷史》第二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2002年1月正式本三版。
21. 國立編譯館主編，《高級中學歷史》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77年8月六版。
22. 國立編譯館主編，《高級中學歷史教科書》第三冊，臺北市：國立編譯館，1991年8月七版。
23. 教育部修訂課程標準委員會修訂，《修訂中學公民、國文、歷史、地理科課程標準》，臺北市：教育部，1952年出版。
24. 教育部基礎教育課程教材專家工作委員會組織編，《義務教育歷史與社會課程標準解讀：2011年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2月1版1刷。
25. 許雪姬、劉妮玲著，《高級中學歷史》下冊，臺北市：三民書局，2000年2月。
26. 黃春木主編，《歷史》第二冊，臺北縣：龍騰文化，2007年1月一版一刷。
27.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主編，《國民學校各科教材調整說明》，臺北市：臺灣省政府教育廳，1952年11月出版。
28. 潘精華編著，劉麗娟繕寫，《民族正氣——中國幼童軍民族精神教育教材》，臺中市：臺中市忠明國民小學幼童軍第四十九團幼女童軍第三團，1975年。

劉景輝、高明士主編，《歷史》第三冊，新北市：翰林出版，2013年8月初版。

（五）影視史料

1. Charles Chaplin Film Corporation, *The Great Dictator* (1940) .
2. The War Department Army Pictorial Service, “The Battle of China”, *Why We Fight* (1944) . 收於《二次大戰的真相》第7集，臺北市：輝洪開發，1995年。
3. 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英烈千秋》，1974年。
4. 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八百壯士》，1976年。
5. 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笕橋英烈傳》，1976年。
6. 東寶株式會社：《上海陸戰隊》，1939年。
7. 海軍省：《支那事變海軍作戰記錄》，1939年。
8. 廣西電影製片廠：《血戰台兒莊》，1986年。
9. 臺灣卓越文化傳播公司：《一寸河山一寸血》，1995年。
10. 鳳凰衛視：《決勝台兒莊戰役——70週年祭》，2008年。
11. 上海上德文化傳媒：《國軍抗戰全紀實》，2011年。
12. 華誼天意影視有限公司：《遠去的飛鷹》，2011年。
13. 五泰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全紀錄》，2012年。

（六）中文專書

1. Badger, Gerry 著，施昀佑、黃一凱譯，《攝影的精神：攝影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新北市：大家出版社，2011年12月初版。
2. Bate, David 著，林潔盈譯，《攝影的關鍵思維》，臺北市：城邦文化，2012年8月初版。
3. Buruma, Ian 著，林錚顛譯，《罪惡的代價：德國與日本的戰爭記憶》，臺北市：博雅書屋，2010年4月初版。
4. Capa, Robert 著，鄭郁欣譯，《失焦：羅伯·卡帕二戰回憶錄》，新北市：木馬文化，2010年5月初版。
5. Cohen, Paul 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南京市：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一版一刷。
6. Connerton, Paul 著，納日碧力戈譯，《社會如何記憶》，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一版一刷。
7. Golden, Reuel 著，鍾聖雄·莊璧綺譯，《目擊的力量：新聞攝影150年》，臺北市：城邦文化，2012年9月初版。

8. Eastman, Lloyd E. 著，王建朗等譯，《毀滅的種子：戰爭與革命中的國民黨中國（1937-1949）》，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年一版。
9. Erll, Astrid、馮亞琳主編，余傳玲等譯，《文化記憶裡論讀本》，北京市：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年 1 月一版一刷。
10. Halbwachs, Maurice 著，華然·郭金華等譯，《論集體記憶》，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0 月一版一刷。
11. Hobsbawn, Eric 等著，陳思仁等譯，《被發明的傳統》，臺北市：貓頭鷹出版社，2002 年 10 月初版一刷。
12. Lary, Diana 著，陳仲丹譯，《中國政壇上的桂系》，南京市：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 年 1 月 1 版 1 刷。
13. Marien, Mary Warner 著，郝紅尉·倪洋譯，《攝影與攝影批評家——1939 至 1900 年間的文化史》，濟南市：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 年 10 月一版一刷。
14. Nora, Pierre 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一～三冊），臺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年 9 月初版一刷。
15. Rothstein, Arthur 著，李文吉譯，《紀實攝影》，臺北市：遠流出版，2012 年 4 月三版。
16. Sontag, Susan 著，陳耀成譯，《旁觀他人之痛苦》，臺北市：麥田出版，2011 年 12 月二版四刷。
17. Sontag, Susan 著，黃燦然譯，《論攝影》，臺北市：麥田出版，2012 年 1 月初版六刷。
18. Spence, Jonathan D. 著，溫洽溢譯，《追尋現代中國（中）》，臺北市：時報出版，2006 年 9 月 15 日初版 11 刷。
19. Williams, Val 著，洪人傑譯，《這才是攝影：跨越百年歷史的不朽影像剖析》，臺北市：城邦文化，2012 年 9 月初版。
20. 山西文獻社編，《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週年紀念》，臺北市：山西文獻社，1979 年初版。
21. 方漢奇主編，《中國新聞傳播史》，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年二版。
22. 方鵬程，《戰爭傳播：一個「傳播者」取向的研究》，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07 年 5 月一版。
23. 王良卿，《三民主義青年團與中國國民黨關係研究（1938-1949）》，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98 年初版。

24. 王凌霄，《中國國民黨新聞政策之研究（1928-1945）》，臺北市：國民黨黨史會出版，1996年初版。
25. 中央出版事業管理委員會編，《出版法規彙編》，出版地不詳：正中書局，1944年4月出版。
26.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南京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藍天碧血揚國威——中國空軍抗戰史料》，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9月1版1刷。
27. 中國文化基金會編，《掃蕩二十年》，臺北市：中國文化基金會，1978年出版。
28. 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編，《抗日戰爭時期的中國新聞界》，重慶市：重慶出版社，1987年出版。
29.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主編，《三民主義建設成果專輯——總論：三民主義的理論與實踐》，臺北市：正中書局，1984年出版。
30. 中國傳奇2010之我的抗戰節目組，《我的抗戰》，新北市：人類智庫，2011年5月初版。
31. 甘險峰，《中國新聞攝影史》，北京市：中國攝影出版社，2008年7月1日一版。
32. 庄福祥編，《抗戰救亡歌曲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
33. 羊汝德主編，《採訪與報導》，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4年4月初版。
34. 全國政協文學和學習委員會編，《八一三淞滬抗戰親歷記》，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2015年1月1版1刷。
35. 阮義忠，《當代攝影大師：二十位人性見證者》，臺北市：雄獅出版社，1985年初版。
36. 阮義忠，《當代攝影新銳：十七位影像新生代》，臺北市：雄獅出版社，1989年初版。
37. 李子遲，《穿越火線——戰地記者用生命寫下的真相》，新北市：大喜文化，2013年4月初版。
38. 李文方，《世界攝影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一版一刷。
39. 李天鐸，《臺灣電影、社會與歷史》，臺北縣：視覺傳播藝術學會，1997年10月初版。
40. 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臺北市：麥田出版，1997年9月初版一刷。
41. 李坤城，《再見！禁忌的年代》，高雄市：高雄市政府新聞處，2007年。
42. 李紀祥編，《圖像、電影與歷史》，宜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2006年7月31日一版一刷。

43. 李昱宏,《灰色的隱喻：時間、機會、攝影與決定性瞬間》，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11 年初版三刷。
44. 李展平等著,《烽火歲月——臺灣人的戰時經驗》，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5 年 8 月 8 日。
45. 李國祁,〈歷史教育的目的與使命〉,《近代中國》第 3 期(臺北市：近代中國雜誌社),頁 41-46。
46. 李雲漢主編,劉維開編輯,《中華民國戰爭圖錄》，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95 年 8 月初版。
47. 李道明,《紀錄片：歷史、美學、製作、倫理》，臺北市：三民書局，2013 年 9 月初版一刷。
48. 李榮惠編,《罪證——日軍鏡頭裡的侵華紀錄》，北京：中央文獻社，2002 年 7 月 1 版 1 刷。
49. 李瞻主編,《中國新聞史》，臺北市：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 9 月初版。
50. 李瞻,《世界新聞史》，臺北市：三民書局，1983 年 2 月增訂七版。
51. 李龍牧,《中國新聞事業史稿》，上海市：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 版 1 刷。
52. 汪宏倫主編,《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臺北市：聯經出版，2014 年 7 月初版。
53. 呂芳上主編,《論民國時期領導菁英》，香港：香港商務印書館，2009 年 12 月出版。
54. 呂芳上,《民國史論》上、中冊，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 年 12 月初版一刷。
55. 呂漢魂、盧克彰,《八百壯士》，臺北市：皇冠出版社，1976 年 12 月再版。
56. 吳志偉,《上海租界研究》，上海市：上海世紀出版，2012 年 9 月 1 版 1 刷。
57.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市：黎明文化，2011 年 4 月修訂一版二刷。
58. 近代中國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苦心孤詣堅苦卓絕——先總統蔣公領導全民抗戰建國五十週年紀念特展圖錄》，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87 年 7 月初版。
59. 近代中國出版社編輯委員會編,《鐵證如山——日本軍閥侵華罪惡及匪偽破壞抗戰實錄》，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87 年 7 月增訂版。
60. 邵銘煌撰文,廖登枝總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臺灣光復 65 周年特展專輯》，南投市：臺灣省政府，2011 年 9 月初版。

61. 若林正丈著，洪郁如、陳培豐等譯，《戰後臺灣政治史》，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年5月初版二刷。
62. 施正鋒主編，《歷史記憶與國家認同——各國歷史教育》，臺北市：臺灣國際研究學會，2014年7月初版。
63. 姚瑞中，《臺灣當代攝影新潮流》，臺北市：遠流，2003年6月初版一刷。
64. 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2005年12月初版。
65. 高維進，《中國新聞紀錄電影史》，北京市：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6月1版1刷。
66. 高耀漢，《高志航傳——空軍戰神》，臺北市：黎明文化，2011年12月初版。
67. 秦孝儀總編，《中國現代史辭典——人物部分》，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
68. 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文化發展史》第三、四冊，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1981年。
69. 秦風老照片館編，《抗戰中國國際通訊照片》（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10月1版1刷）。
70. 唐德剛，《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臺北市：遠流出版，2014年7月1日初版一刷。
71. 夏春祥，《在傳播的迷霧中：二二八事件的媒體印象與社會記憶》，臺北市：韋伯文化，2007年12月初版。
72. 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市：明文書局，1993年出版。
73. 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上海市：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4月2版1刷。
74. 陳申等著，《中國攝影史》，臺北市：攝影家出版社，1990年2月初版。
75. 陳存仁，《烽火下的上海》，臺北市：時英出版社，2005年7月初版。
76. 曹聚仁、舒宗僑編著，《中國抗戰畫史》，北京市：中國文史出版社，2011年1月1版1刷。
77. 張光明，《中華民國空軍老兵——張光明抗日空戰拾粹》，臺北市：財團法人大鵬文教基金會，2012年11月出版。
78. 張作錦、王力行主編，《我們生命裡的七七：從蘆溝橋到中日八年抗戰》，臺北市：遠見天下文化，2014年6月一版一刷。

79. 張其昀主編，《抗日戰史》，臺北市：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出版，1966 年 6 月出版。
80. 張其昀，《黨史概要》，臺北市：中央文物供應社，1979 年 3 月再版。
81. 張純如著，蕭富元譯，《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 南京浩劫》，臺北市：天下文化，2007 年 11 月出版。
82. 張連紅·經盛鴻·陳虹等著，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究中心主編，《創傷的歷史——南京大屠殺與戰時中國社會》，南京市：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8 月 1 版 1 刷。
83. 郭力昕，《書寫攝影：相片的文本與文化》，臺北市：元尊文化，1998 年初版。
84. 郭力昕，《再寫攝影》，臺北市：田園城市文化，2013 年 10 月初版。
85. 郭傑偉 (Jeffrey W. Cody)、范德珍 (Frances Terpak) 編著，葉娃譯，《丹青和影像：早期中國攝影》，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2012 年 6 月 1 日出版。
86. 章東磐、晏歡、戈叔亞主編，《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 (貳)》，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 年 5 月 1 版 1 刷。
許南號，《臺灣教育史》，臺北市：師大書苑，1992 年 1 月初版。
87. 曾恩波編，《世界攝影史》，臺北市：藝術出版，1973 年出版。
88. 馮克力，《老照片裡的家國記憶》，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3 年 9 月 1 版 1 刷。
89. 程其恆編著，馬星野校訂，《戰時中國報業》，桂林：銘真出版社，1944 年 3 月初版；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5 年 8 月影印再版。
90. 飯澤耕太郎著，黃耀進譯，《寫真的思考：攝影的存在意義》，臺北市：城邦文化，2013 年 2 月初版。
91. 葉文心等著，《上海百年風華》，臺北市：躍昇文化，2001 年 6 月初版。
92. 葉蓁，《想望臺灣：文化想像中的小說、電影和國家》，書林出版，2011 年 8 月初版。
93. 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第 2 冊，北京市：華文出版社，2010 年 6 月 1 版 1 刷。
94. 楊燕、徐成兵著，《民國時期官營電影發展史》，北京市：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 年 2 月 1 版 1 刷。
95. 楊德鈞編著，《中國抗日戰爭大畫史》，臺北市：北開文化事業，1989 年 3 月 3 日。
96. 虞任遠編，《八百壯士畫史》，臺北市：惠文出版社，1976 年 7 月出版。

97. 賈磊磊，《影像的傳播》，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1版1刷。
98. 趙怡，《美國新聞界對中國戡亂戰爭報導之研究》，臺北市：黎明文化，1985年出版。
99. 趙雪波，《戰地記者述論》，北京市：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7年4月1版1刷。
100. 蔡曉濱，《中國報人》，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0年12月一版。
101. 劉現成，《臺灣電影、社會與國家》，臺北縣：視覺傳播藝術學會，1997年10月初版。
102. 劉維開、蔣永敬著，《蔣介石與國共和戰（一九四五～一九四九）》，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2013年1月修訂初版。
103. 蔣齊生等編，《中國攝影史：1937-1949》，北京市：中國攝影出版社，1998年一版。
104. 樊婉貞，《非關真相——九〇年代至今華人觀念攝影》，臺北市：典藏藝術家庭，2008年7月初版。
105. 鄭意萱，《攝影藝術簡史》，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10年3月再版。
106. 鄭意萱，《紀實攝影的故事》，臺北市：藝術家出版社，2013年1月初版。
107. 盧非易，《臺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臺北市：遠流出版，2000年11月1日初版二刷。
108. 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臺北市：麥田出版，1999年初版。
109. 盧瑞海，《八百壯士》，臺北市：金川出版社，1976年7月初版。
110. 穆欣，《抗日烽火中的中國報業》，重慶市：重慶出版社，1992年8月1版1刷。
111. 賴光臨，《七十年中國報業史》，臺北市：中央日報社，1981年3月初版。
112. 薛光前編，《八年對日抗戰中之國民政府》，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出版。
113. 謝繼民，《我的父親謝晉元將軍》，北京市：團結出版社，2010年7月1版1刷）。
114. 蕭阿勤，《重構臺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聯經出版社，2012年12月初版。
115. 戴峰、周明，《淞滬會戰——1937年中日813戰役始末》，臺北市：知兵堂出版，2013年5月初版一刷。
116. 魏時煜，《東西方電影》，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

117.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一：中央通訊社》，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2 年 10 月初版。
118. 黨營文化事業專輯編纂委員會，《黨營文化事業專輯之二：中央日報》，臺北市：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工作會，1972 年 10 月初版。
119. 顧隸、方偉，《中國解放區攝影史略》，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 7 月 1 版 1 刷。

(七) 外文專著

1. 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 Crawford, Keith A. and Foster, Stuart J., “*War, Nation, Memor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World War II in School History Textbooks*”, Charlotte, NC: Information Age Pub, 2007.
3. Eastman, Lloyd E. ed. “*The Nationalist Era in China, 1927-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1991.
4. Erll, Astrid, “*Memory in Cul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5. Glatzer, Richard、Raeburn, John, “*Frank Capra: The Man and His Film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5.
6. Kallgren, Joyce K. ed., “*Building a Nation-State: China after Forty Yea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7. Li Fei Fei、Sabella, Robert、Liu David、Link Perry.” *Nanking 1937: Memory and Healing*”,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February 2002.
8. Mackinnon, Stephen、Friesen, Oris, “*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9. Mann, Michael, “*States, War and Capitalism: Studies in Political Sociology*”, Oxford;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8.
10. Newhall, Beaumont. “*The History of Photography: From 1839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2(1997 printing).
11. Porter, Bruce D., “*War and The Rise of The State: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4.
12. Robinson, David, *From Peepshow to Palace: The Birth of American Fil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29-31.

13. Stott, William. *“Documentary expression and thirties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4. Strauss, Julia C., *Strong Institution in Weak Politics: State Building in Republican China, 1924-194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pp.184.
15. Szarkowski, John. *“Photography Until Now”*. 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89.
16. Tagg, John.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London: Macmillan, 1988.
17. Till, Karen, *“Companion to Political Geography”*, Oxford: Blackwell, 2003.
18. Waldner, David, *“State-Building and Late Developm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 Warburg, Aby; translation by Britt, David; introduction by Forster, Kurt W., *“The Renewal of Pagan Antiquity: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Los Angeles, CA: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rt and the Humanities, 1999.
20. Wakeman, Frederic JR and Edmonds, Richard Louis, *Reappraising Republican China* ,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21. Weaver, Mike. *“British Photograph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22. Winter, Jay. *“Remembering War: The Great War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 Young, Arthur N., *China’s Nation- Building Effort , 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Record*,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1.
24. 近代中國出版社編，《近百年來の中日關係図録》，臺北市：近代中國出版社，年份不詳。

(八) 期刊論文

1. Assmann, Jan, translated by John Czaplicka, “Colletive Memory and Cultural Ident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65 (New York: The Department of German Studies Cornell University, Spring-Summer, 1995) ,pp. 125-133.
2. Bian, Morris L., “Building State Structure: Guomindang Institutional Rationalization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Modern China*, Vol. 31, No. 1 (2005), pp. 35-71.
3. Chartier, Roger 著，楊尹瑄譯，〈「新文化史」存在嗎？〉，《臺灣東亞文明研究

- 學刊》第 5 卷第 1 期，總第 9 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08 年 6 月），頁 199-214。
4. Coser, Lewis 著，邱澎生譯，〈阿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與集體記憶〉，《當代》第 91 期（臺北市：合志文化事業，1992 年 11 月），頁 20-39。
 5. Olick, Jeffrey K.、Robbins, Joyce 著，周雲水譯，〈社會記憶研究：從「集體記憶」到記憶實踐的歷史社會學〉，《思想戰線》第 37 卷第 3 期（昆明市：雲南大學思想戰線雜誌社，2011 年 5 月），頁 9-16。
 6. 王汎森，〈歷史記憶與歷史：以中國近世史事為例〉，《當代》第 91 期（臺北市：合志文化，1993 年 11 月），頁 40-49。
 7. 王汎森，〈歷史教科書與歷史記憶〉，《思想》第 9 期（臺北市：聯經出版社，2008 年），頁 123-139。
 8. 王明珂，〈過去、集體記憶與族群認同：臺灣的族群經驗〉，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臺北市：編者印行，1994 年），頁 249-274。
 9.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第 34 卷第 3 期（臺北市：思與言雜誌社，1996 年 9 月），頁 147-184。
 10. 王明珂，〈臺灣與中國的歷史記憶與失意〉，《歷史月刊》第 105 期（臺北市：歷史智庫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6 年），頁 34-40。
 11. 王明珂，〈臺灣青少年的社會歷史記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 25 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1997 年 6 月），頁 149-182。
 12. 王甫昌，〈光復後臺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76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3 年），頁 43-96。
 13. 王府昌，〈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臺灣》教科書的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臺灣史研究》第 8 卷第 2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 年 12 月），頁 145-208。
 14. 王甫昌，〈由中國省籍到臺灣族群：戶口普查籍別類屬轉變之分析〉，《臺灣社會學》第 9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05 年 6 月），頁 59-117。
 15. 王笛，〈新文化史、微觀史和大眾文化史——西方有關成果及其對中國史研究的影響〉，《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1 期（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 年 2 月），頁 126-140。
 16. 尹章義，〈「臺灣意識」的形成與發展——歷史的觀點〉，收錄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臺北市：中央研究院

- 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頁363-387。
17. 石婉舜，〈高松豐次郎與臺灣現代劇場的揭幕〉，《戲劇研究》第10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戲劇學系戲劇研究編輯委員會，2012年7月），頁35-41。
 18. 任育德，〈中國國民黨宣傳決策與媒體的互動（1951-196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9年11月），頁221-262。
 19. 江宜樺，〈臺灣戰後政治思想與民主運動〉，《臺灣社會研究》第65期，2007年3月，頁191-199。
 20. 李廣均，〈社群、民族國家與集體記憶〉，《社會文化學報》第4期（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1997年），頁247-278。
 21. 汪榮祖，〈民國史研究若干議題的探討〉，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1055-1066。
 22. 宋佩芬，〈歷史教學與國家認同〉，《教育研究月刊》第177期（臺北市：高等教育文化，2009年1月），頁90-98。
 23. 宋德和，〈戰地記者的戰鬥〉，《報學》第5卷第3期（臺北市：中華民國新聞編輯人協會，1974年12月），頁156-159。
 24. 呂芳上，〈抗戰前的中央與地方——以蔣介石先生與廣東陳濟棠關係為例（1929-1936）〉，《近代中國》第144期，2001年8月，頁170-198。
 25. 杜正勝，〈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臺灣歷史教科書風波的分析〉，收錄於《臺灣心臺灣魂》（高雄市：河畔出版社，1998年），頁149-161。
 26. 吳乃德，〈書寫「民族」創傷：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記憶〉，《思想》第8期（臺北市：聯經出版，2008年1月），頁39-70。
 27. 林桶法，〈抗戰勝利紀念的活動與詮釋——九三軍人節的觀察〉，《近代中國》第163期（臺北市：近代中國雜誌社，2005年12月），頁116-131。
 28. 林勝偉，〈「戶籍」與「兵籍」：戰後臺灣人口統計二元之成因及其影響〉，發表於「臺灣人口學會2004年年會暨人口、家庭與國民健康政策回顧及展望研討會」，臺北市：臺灣人口學會，2004年4月23至24日。
 29. 何思暉、何怡君，〈高中歷史教科書統編本的「臺灣書寫」（1953-1998）〉，《教育研究月刊》第217期（臺北市：高等教育文化事業，2012年5月1日出版），頁38-51。
 30. 邱坤良，〈重現臺灣文化史的集體記憶——拱樂社劇本的整理與出版〉，《表演

- 藝術》第 84 期（臺北市：國立中正文化中心，1999 年 12 月），頁 95-98。
31. 柯喬文，〈殖民化與集體記憶——以「三六九小報」(1930-35) 古典小說為考察〉，《島語》第 3 期（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3 年），頁 66-73。
 32. 周俊雄，〈新聞攝影與歷史圖像——以戰爭影像傳播為例〉，《宜蘭文獻雜誌》第 85/86 期（宜蘭縣：宜蘭縣文化局，2010 年 6 月），頁 95-111。
 33. 周婉窈，〈歷史的統合與建構——日本帝國圈內臺灣、朝鮮和滿州的「國史」教育〉，《臺灣史研究》第 10 卷第 1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3 年 6 月），頁 33-83。
 34. 周婉窈，〈對當前歷史研究與歷史教育的幾點看法〉，《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57 期（臺北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社，2005 年 3 月），頁 247-254。
 35. 邵銘煌，〈《四萬萬人民》紀實片之產製與抗戰意義〉，收錄於劉維開主編，《影像近代中國》（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出版社，2013 年 12 月初版一刷），頁 91-121。
 36. 胡正光，〈從柏格森到阿布瓦希：論集體記憶的本質〉，《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 21 期（臺北市：巨流圖書，2007 年 6 月），頁 147-201。
 37. 胡光夏，〈媒體與軍隊關係的演進：戰時新聞媒體管制與運用的發展〉，《復興崗學報》第 89 期（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7 年），頁 77-106。
 38. 胡光夏、陳竹梅，〈數位時代下的軍事傳播學研究〉，《復興崗學報》，第 98 期（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7 年），頁 1-26。
 39. 胡滌生，〈中日戰爭戰略（術）得失之探討〉，《空軍學術月刊》第 488 期（臺北市：空軍學術月刊社，1997 年 7 月），頁 17-32。
 40. 夏春祥，〈媒介效果與集體記憶：評 The Rehabilitation of Richard Nixon: The Media's Effect on Collective Memory by Johnson, T. J〉，《新聞學研究》第 58 期（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1999 年 1 月），頁 295-298。
 41. 夏春祥，〈文化象徵與集體記憶競逐：從臺北市的凱達格蘭大道談起〉，收錄於盧建榮主編，《文化與權力：臺灣新文化史》（臺北市：麥田出版，2001 年 12 月初版），頁 107-148。
 42. 夏春祥，〈新聞與記憶：傳播史研究的文化取徑〉，《國際新聞界》第 172 期（北京市：中國人民大學，2009 年），頁 12-17。
 43. 高郁雅，〈抗日戰爭時期上海《申報》之研究〉，《輔仁歷史學報》第 24 期（臺北縣：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學系，2009 年 12 月），頁 117-158。
 44. 孫玉芹，〈楊惠敏向「四行孤軍」獻旗事件考〉，《蘭台世界》第 19 期（瀋陽

- 市：蘭台世界雜誌社，2010年10月），頁61-62。
45. 唐與羣，〈從事攝影工作的回憶〉，《傳記文學》第19卷第3期，總113號（臺北市：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年9月），頁68-70。
 46. 桑兵，〈民國開國的歧見、新說與本相〉，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83-104。
 47. 翁安雄，〈傳說、歷史與集體記憶：文化史的側寫——從澎湖七美故事及地名談起〉，《西瀛風物》第8期，（2001年5月），頁38-59。
 48. 旅遊綜覽，〈漫談紀實攝影與藝術攝影的區別〉，《旅遊縱覽》第32期（秦皇島市：秦皇島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委員會，2010年5月），頁58-61。
 49. 亞洲週刊，〈戰地記者筆桿子對抗槍桿子〉，《亞洲週刊》第5卷第45期（香港：亞洲週刊公司，1991年11月17日），頁34。
 50. 莊嘉玲，〈戰後臺灣作家小說中的戰爭經驗〉，《臺灣人文》第6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文教育研究中心，2001年12月），頁73-94。
 51. 陳立文，〈對軍隊動員之我見〉，《國防雜誌》第10卷第2期（桃園縣：國防大學，1994年12月），頁87-96。
 52. 陳佑慎，〈抗戰時期的國軍電影事業〉，《國史館館刊》第34期（臺北市：國史館，2012年12月），頁69-114。
 53. 陳明宏，〈復興崗五十年「音的風景」之回顧〉，《復興崗學報》第73期（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1年12月），頁309-358。
 54. 陳謙平，〈辛亥革命後中國的國際化與多民族國民國家的整合（1912-1946）〉，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139-175。
 55. 張力，〈足食與足兵：戰時陝西省的軍事動員〉，收錄於《慶祝抗戰勝利五十週年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中國近代史學會、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6年9月），頁497-518。
 56. 張玉法，〈近代中國早期的國家建制（1500-1840）〉，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1057-1058。
 57. 張世瑛，〈國民政府對抗戰忠烈事蹟的調查與紀念〉，《國史館館刊》第26期（臺北市：國史館，2010年6月），頁1-46。
 58. 張美陵，〈攝影領域的擴展〉，發表於「刺點：博物館影像典藏之管理與賦權

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臺灣博物館，2013 年 5 月 10 日。

59. 張瑞德，〈抗戰時期陸軍的人事管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1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年 6 月），頁 641-686。
60. 張瑞德，〈紀念與政治——臺海兩岸抗戰勝利五十週年紀念活動的比較〉，收錄於《紀念七七抗戰六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臺北縣：國史館，1998 年），頁 1075-1138。
61. 張瑞德，〈戰爭與工人文化——抗戰時期大後方工人的認同問題〉，收錄於黃克武編，《軍事組織與戰爭：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歷史組》（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年），頁 243-273。
62. 張瑞德，〈無聲的號角——侍從室的幕僚人員（1936-1945）〉，《近代中國》第 156 期（臺北市：近代中國雜誌社，2004 年 3 月），頁 141-166。
63. 張瑞德，〈在轟炸的陰影下——抗戰時期重慶民眾對空襲的心理反應〉，收錄於李國祈教授八秩壽慶論文及編輯小組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臺北市：唐山出版社，2006 年），頁 261-278。
64. 張慧瑜，〈抗戰影像中歷史記憶的改寫〉，《二十一世紀》第 123 期（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1 年 2 月），頁 106-114。
65. 許育銘，〈日本人的戰爭記憶與戰後歷史教育：以家永三郎為例〉，收錄於《集體暴力及其記述：1000-2000 年間東亞的戰爭記憶、頌讚和創傷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5 年 7 月）。
66. 許俊雅，〈記憶與認同——臺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2 期（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05 年 4 月），頁 59-93。
67. 陽翰笙，〈八百壯士（電影劇本）〉，《中蘇文化》第 1 卷抗戰特刊第 5 期，頁 45-46。
68. 康力平，〈戰爭時期新聞處理與運用——美軍與媒體關係演進歷程對國軍之啟示〉，《復興崗學報》第 83 期（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2005 年 6 月），頁 117-142。
69. 賀寶善，〈從戰地記者到立法委員的曾波恩〉，《傳記文學》第 80 卷第 5 期（臺北市：傳記文學雜誌社，2002 年 5 月），頁 70-73。
70. 景軍，〈社會記憶理論與中國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第 12 期（香港：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 年），頁 41-51。
71. 馮爾康（Feng Erkang），〈關於建設中國社會史史料學的思考〉，《漢學研究通訊》第 21 卷第 4 期（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2002

年 11 月)，頁 5-15。

72. 黃若惠，〈國民中學歷史課程之探討——以目前本國歷史為例〉，《歷史教育》第 6 期（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2000 年 6 月），頁 1-32。
73. 楊維真，〈戰爭與國家塑造——以戰時中國（1931-1945）為中心的探討〉，《漢學研究通訊》第 28 卷第 2 期（臺北市：漢學研究中心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2009 年 5 月），頁 5-14。
74. 溫采婕，〈從集體記憶看北投公園文化地景的變遷〉，《北市教大社教學報》（臺北市：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歷史與地理學系，2012 年 12 月），頁 75-95。
75. 翟志成，〈集體記憶與歷史真實：「平型關大捷」的建構與解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51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6 年 3 月），頁 131-186。
76. 廖文碩，〈寓教於覽——戰後臺灣展覽活動與「臺灣省博覽會」（1945-1948）〉，《臺大文史哲學報》（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編輯委員會，2011 年 5 月），頁 181-222。
77. 管中祥，〈「國民黨國機器」操控媒介形式的轉變(1924-1999)〉，《傳播文化》第 9 期（臺北縣：天主教輔仁大學傳播學院，2002 年 4 月），頁 164-201。
78. 夢翔，〈志航基地專訪〉，《尖端科技》第 52 期（臺北市：尖端科技軍事雜誌社，1988 年 12 月），頁 84-91。
79. 劉存善整理，〈「太原五百完人」調查報告〉，《山西文史資料》第 60 輯（太原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1988 年 11 月），頁 120-159。
80. 劉阿榮，〈全球在地化與文化認同：臺灣文化認同的轉化〉，收錄於《中山文化暨古典文獻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臺灣學生，2007 年）。
81. 劉阿榮，〈族群記憶與國家認同〉，「多元文化與族群和諧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父紀念館，2007 年 11 月 23-24 日。
82. 劉維開，〈訓政時期「國民政府組織法」制訂與修正之探討〉，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臺北市：國史館，2013 年 6 月初版一刷），頁 489-518。
83. 劉曉原，〈從「五族共和」到五域統合——辛亥革命和中國國家型態近代轉型〉，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頁 107-138。
84. 蔡佩均，〈老作家與戰後臺灣文學研究的建構——從個人記憶、集體記憶到歷

- 史記憶》，《臺北文獻》第 190 期（臺北市：臺北市文獻委員會，2014 年 12 月），頁 63-86。
85. 蔣竹山，〈「文化轉向」的轉向或超越？——日本論著歐美新文化史著作的介紹〉，《新史學》第 12 卷第 1 期（臺北市：新史學雜誌社，2001 年 3 月），頁 233-246。
 86. 賴光臨，〈抗戰時期軍事記者的角色與地位〉，收錄於《抗戰建國史研討會論文集（1937-1945）》（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年 12 月），頁 963-988。
 87. 戴寶村，〈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收錄於李鴻禧等著，《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市：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1993 年 5 月初版），頁 115-138。
 88. 薛化元，〈從民國建立到民國憲政——中國憲政發展的考察（1912-1949）〉，收錄於吳淑鳳、薛月順、張世瑛執行編輯，《近代國家的型塑：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頁 589-609。
 89. 羅志平，〈民族主義、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第 7 卷第 1 期（臺中縣：朝陽科技大學朝陽人文社會學刊編輯委員會，2009 年 6 月），頁 229-254。
 90. 蕭阿勤，〈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解剖者、拯救者與一種民主觀點〉，《思與言》第 35 卷第 1 期（臺北市：思與言雜誌社，1997 年 3 月），頁 247-296。
 91. 蕭阿勤，〈民族主義與臺灣一九七〇年代的「鄉土文學」：一個文化（集體）記憶變遷的探討〉，《臺灣史研究》第 6 卷第 2 期（臺北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00 年 10 月），頁 77-138。

（九）學位論文

1. 石佳音，〈中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與組織特質〉，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08 年 1 月。
2. 吳怡萍，〈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其運作〉，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9 年。
3. 林平，〈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4. 朱宜琪，〈戰後初期臺灣知識青年文藝活動研究——以省立師院及臺大為範圍〉，臺南市：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年。

5. 周世文，〈國軍一九五〇年後音樂發展史概述〉，臺北市：東吳大學音樂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6. 周亞慧，〈國（初）中歷史教科書中晚清（1840-1911）救亡運動教材之編寫〉，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7. 高仲恆，〈國家、市場與音樂——戒嚴時期臺灣愛國歌曲的流變（1949-1987）〉，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在職進修碩士班碩士論文，2011年。
8. 高郁雅，〈國民黨的新聞宣傳與戰後中國政局變動（1945-1949）〉，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01年。
9. 秦穗齡，〈童子軍與現代中國的青少年訓練（1911-1949）〉，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5年。
10. 徐秀慧，〈戰後初期臺灣的文化場域與文學思潮的考察（1945~1949）〉，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
11. 夏春祥，〈媒介記憶與新聞儀式——二二八事件新聞的文本分析（1947-2000）〉，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博士論文，2000年。
12. 夏鑄九，〈國族建構、歷史記憶與紀念空間：二二八紀念碑的建構〉，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
13. 袁公瑜，〈國民黨文工會職能轉變之研究〉，宜蘭縣：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14. 陳弘岱，〈《人間》雜誌紀實攝影對臺灣紀實攝影的影響〉，臺北市：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06年。
15. 陳順枝，〈抗戰時期宣傳政策之研究〉，臺北市：政治作戰學院政治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年。
16. 陳靜瑜，〈臺僑在美國的生根與發展〉，發表於「2008年僑務發展之外交意涵學術研討會」，臺北市：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2008年5月15日。
17. 郭達鴻，〈中國國民黨公眾關係政策與執行：民國39年-民國78年〉，臺中市：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18. 張宏維，〈由文建會預算結構變化看臺灣文化政策演變〉，高雄市：國立中山大學藝術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
19. 張瑀，〈軍事新聞記者的角色、功能與報導策略變遷研究〉，臺北市：國防大學政治作戰學院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20. 黃冠富，〈臺灣國族認同的確認〉，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學系

碩士論文，2007 年。

21. 黃脩涵，〈照片中的英雄：金門軍人沙龍攝影的人類學分析〉，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
22. 葉麗珠，〈新聞媒體對金門社會思潮之衝擊研究——以《金門日報》為例〉，臺北市：應用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2004 年。
23. 廖郁毓，〈臺灣報業的生產科技、勞動過程與性別分工〉，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碩士論文，2002 年。
24. 劉志祥，〈我國國家通訊社設置之探討——中央通訊社改制研究〉，臺北縣：淡江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 年。
25. 鄭士榮，〈抗戰前後中央文化宣傳方略之研究（1928-1945）——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功能之分析〉，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 年。
26. 鄭怡世，〈臺灣社會工作發展的歷史分析：1949-1982〉，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
27. 鄭玩香，〈戰後臺灣電影管理體系之研究（1950-1970）〉，桃園縣：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年。
28. 鄭炯兒，〈從「掃蕩」到「和平」：《掃蕩報》研究（1931-1950）〉，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1999 年。
29. 蔡佩如，〈中華民國中學歷史教科書的後殖民分析——以臺灣論述為核心〉，臺北市：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十）網路資料

1. "History of Kodak : 1878-1929", Kodak : http://www.kodak.com/ek/US/en/Our_Company/History_of_Kodak/Milestones_-_chronology/1878-1929.htm (2015 年 2 月 14 日點閱)。
2. "History of Kodak : George Eastman", Kodak : http://www.kodak.com/ek/US/en/George_Eastman.htm (2015 年 2 月 14 日點閱)。
3. Bemstein Adam. "The Acknowledged Master of the Mo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Washington, 5 August 2004, Sec. A, pp.4. 見於「The Washington Post」：<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39981-2004Aug4.html> (2013 年 1 月 4 日點閱)。
4. Louis Althsser, translated by Ben Brewst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assays* (Lodon: New Left Book, 1971), transcribed in “Louis Althusser 1970 -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assays”: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althusser/1970/ideology.htm> (2015年4月6日點閱)。

5. 「LIFE」：<http://life.time.com>
6. 〈「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在臺僅剩厲鼎新一人〉，《NOW news 今日新聞》：<http://www.nownews.com/2006/08/21/329-1980670.htm>(2013年1月2日點閱)。
7. 〈《遠去的飛鷹》16日開播，3000萬造真實空戰效果〉，收錄於「騰訊娛樂」(2011年9月15日)：<http://ent.qq.com/a/20110915/000061.htm> (2015年2月27日點閱)。
8. 〈35釐米底片(35mm)〉，收錄於「藝術與建築索引典」：<http://aat.teldap.tw/AATFullDisplay/300263816> (2015年3月1日點閱)
9. 「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photo.cna.com.tw/Query/DefaultBrowse.aspx>
10. 「中央電影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movie.com.tw/home> (2015年3月30日點閱)。
11. 〈中日雙邊關係〉，刊登於「中國共產黨新聞」：<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5567233.html>(2015年3月28日點閱)
12. 〈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紀事〉，收錄於「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臺灣碑碣拓片」：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document_ink_detail.hpg&xml_id=0000000390 (2015年1月27日點閱)。
13. 〈世界報系人物——程滄波(1903-1984)〉，「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http://192.192.155.229/PUBLIC/view_01.php3?main=people%20of%20world%20news&id=346 (2015年2月23日點閱)。
14. 〈生態攝影學數位典藏計畫介紹〉，收錄於「元智電子報——產學焦點」：http://web2.yzu.edu.tw/e_news/674/10_new01.html (2015年3月1日點閱)。
15. 〈在歷史、文化、政治、倫理中的中國紀實攝影〉，載於「中國紀實攝影網——紀實宣言」：<http://www.docph.com/detailed.php?id=175>(2013年1月2日點閱)。
16. 〈系所歷史〉，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認識新聞系」：<http://www.jschool.nccu.edu.tw/index.asp?id=12> (2015年2月23日點閱)；
17. 〈系所簡介〉收錄於「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新聞學系——認識新聞系」：

- <http://www.jschool.nccu.edu.tw/index.asp?id=11> (2015 年 2 月 23 日點閱)。
18. 〈社會學習領域七至九年級基本內容〉, 收錄於「國民教育社群網——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http://teach.eje.edu.tw/data/files/20150120/social-1.doc> (2014 年 10 月 14 日點閱)。
 19. 〈紀念館簡介〉, 「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 <http://www.china813.com/jianjie1.htm> (2015 年 6 月 12 日點閱)。
 20. 〈愛恨交織抗日片: 臺灣電影中的抗日記憶〉, 載於「鳳凰網娛樂」: http://ent.ifeng.com/tv/news/mainland/detail_2013_05/09/25120904_0.shtml (2013 年 5 月 13 日點閱)。
 21. 〈臺灣人物小傳——高松豐次郎 (1872-1952)〉, 收錄於「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 臺灣人物誌 (1895-1945)」: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toolbox_figure_detail.hpg&project_id=twpeop&dtd_id=15&subject_name=%E8%87%BA%E7%81%A3%E4%BA%BA%E7%89%A9%E8%AA%8C%281895-1945%29&subject_url=toolbox_figure.hpg&xml_id=0000294319&who=%E9%AB%98%E6%9D%BE%E8%B1%90%E6%AC%A1%E9%83%8E (2015 年 3 月 2 日點閱)。
 22. 〈臺灣電影 50 年 (三)〉, 收錄於「中國網」: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archive/392904.htm> (2014 年 12 月 30 日點閱)。
 23. 「臺灣故事島——戰爭」: http://storytaiwan.tw/Story_Wall1.aspx?n=7D4DCAAB8887E4FD&t=0C4F3E988AC32E69&tn=620F23379DF07C83D63C854481C6BA1E (2015 年 5 月 6 日點閱)。
 24. 〈歷史翻案: 四行倉庫楊惠敏冒死送國旗, 走小路非渡河〉, 《NOW news 今日新聞》: <http://www.nownews.com/2009/04/06/327-2433091.htm> (2012 年 12 月 22 日點閱)。
 25. 〈歷年全省戶口 (人口)〉, 收錄於「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 (1894-1945): 臺灣五十年來統計戶口調查」: <http://twstudy.iis.sinica.edu.tw/twstatistic50/POP/Mt49-2.xls> (2014 年 12 月 20 日點閱)。
 26. 〈學校沿革〉, 收錄於「嘉義市志航國民小學」: <http://main.ches.cy.edu.tw/releaseRedirect.do?unitID=183&pageID=3045> (2015 年 2 月 26 日點閱)。

27. 王霖，〈上海抗戰紀念場館集中整修，多角度呈現抗戰歷史〉，收錄於「東風網／歷史」：
<http://big5.eastday.com:82/gate/big5/history.eastday.com/h/20140918/u1a8347680.html> (2015年6月12日點閱)。
28. 朱則剛，〈照相機與攝影機的種類 (Camera Format)〉，收錄於「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2310> (2015年2月14日點閱)。
29. 吳嘉寶，〈臺灣攝影簡史〉，收錄於「視丘攝影藝術學院——視丘攝影圖書館：視丘文化評論」：<http://www.fotosoft.com.tw/book/papers/library-1-1005.htm> (2013年1月1日點閱)。
30. 唐明珠，〈中國電影製片廠〉，收錄於「文化部臺灣大百科全書」：
<http://nrch.cca.gov.tw/twpedia.php?id=20926> (2014年12月30日點閱)。
31. 陳輝編輯，〈大漢報〉，收錄於「新華網湖北頻道——紀念辛亥武昌首義100週年：辛亥文物」：
http://www.hb.xinhuanet.com/zhuanti/2011-03/07/content_22222757.htm (2014年07月11日點閱)。
32. 童倩，〈石原稱與中國開戰促使野田購島〉，刊登於「BBC 中文網——國際新聞」：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world/2012/10/121013_japan_china_diaoyu.shtml (2015年3月28日點閱)。
33. 楊天石，〈蔣介石與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刊登於「人民網」：
<http://www.people.com.cn/BIG5/198221/198974/199955/12501359.html> (2014年4月13日點閱)。
34. 管仁健，〈臺灣小學課本裡的「太原五百完人」〉，刊登於「你不知道的臺灣(管仁健／著)」(2005年12月31日)：
<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281895765> (2015年1月27日點閱)
35.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公告「太原五百完人紀念建築群」為本市歷史建築〉，《臺北市政府公報》98年夏字第7期：
http://twinfo.ncl.edu.tw/tiqry/hypage.cgi?HYPAGE=search/show_gaztext.hpg&syd=E0947175 (2015年1月27日點閱)。
36. 臺左維新，〈「光復」不是多數臺灣人的共同記憶〉，《蘋果日報》，臺北市：2014

年 9 月 4 日，引自「蘋果日報——即時論壇」：

http://m.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40904/463865/?utm_source=FB&utm_medium=MWeb_Share&utm_campaign=http%253A%252F%252F
(2014 年 9 月 5 日點閱)。

37. 劉項，〈抗戰紀錄片第一人陳君天傳奇〉，收錄於「亞洲週刊——新思維及其他專欄」：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429156439024&docissue=2015-16
(2015 年 5 月 6 日點閱)。